



甘肃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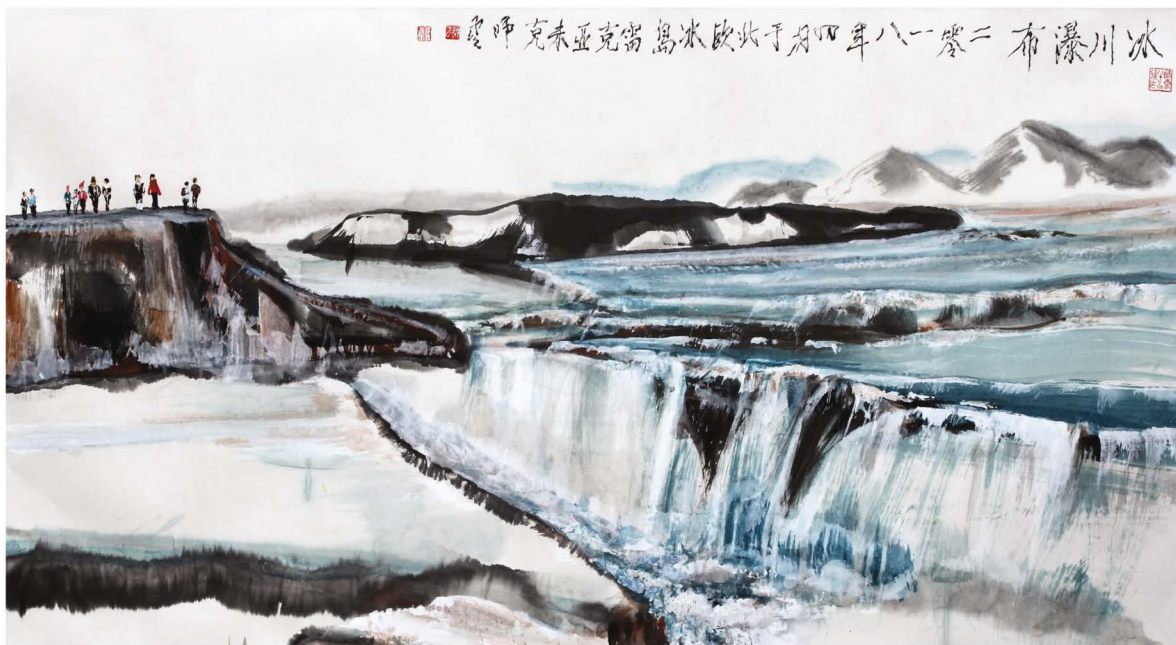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季刊 2019-3

- 栉风沐雨七十年 文物事业铸辉煌
- 甘州名『甘』考
- 『天下富庶无如陇右』新探
-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
- 《诗经》里的甘肃
- 艺术创作不能放弃生活的积累
- 序言二则
- 风雅撷珍·张文轩、张克复等

师云国画作品欣赏

师云,原名唐俊卿,1935年5月生,甘肃会宁人。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1957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并留校任教。师承吕斯百、刘文清、韩天眷和汪嶽云教授。擅长中国水墨写意画、书法、篆刻及诗词。出版有《师云画选》《中国画教学》等。多次应邀在美国达拉斯、兰辛和芒特普莱斯特等城市举办个人画展并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俄州玛斯金格姆学院等大学讲学。



卷首语：丰泉纪之柳如春瘦

文／谷 童

刺刺崖下冰水急美
地寒波凝紫泥长碍老
翁巧剥来一片绿嫩似碧玉
白额刀工挫屑美雕心
欲鹭世半圆黄膘浮枯荷
皎标赤霄染芙蓉野塘徐
水澄清波散漫秋蘼却
唐津暗芳出香想明月
池上仙娥若有思罗裾初
沾粟尖露长带袖绕云
边雨夜闻甘露洒清泉
裁缝凉风拂凝脂雪阵
万里归路还留我书稿
忆仙姿寒塘仙娥破歌
丙申初春月夜疏上丰泉
后青然忘廖集志

二月是一段青黄不接的树枝，斜搭在季节的脖子上。我是说村庄外面的田野，除了浅黄中夹带些许绿意的麦苗，看不到其他的绿色，而山坡上枯草的黄，也黄得不够彻底，它们的叶片耷拉在土上，似乎在召唤根部的草芽快点破土。

丰泉最常见的柳树榆树白杨树等一些高大的落叶乔木，也只把单调瘦弱的枝杈斜伸在天空，偶尔有几只鸟雀站上去呱噪一番，才会让它有片刻的热闹，尔后又陷入沉寂，等候风从远处吹来。

过不了多久，柳树就发出新芽。这个时候，嫩树皮很容易剥下来，做柳哨最好不过。拣长得笔直修长的柳枝砍下来，选定要使用的一段，从某个新芽的上部齐齐截断，然后在下一个新芽的尾部用小刀旋转着切一圈，要保持入刀的深度刚好把树皮割断。这个长度，也就是柳笛的长度，它的长短取决于柳枝上新芽间的距离。把截好的这一段夹在两掌中间，前后搓动几下，树皮和树杆就会脱离，轻轻地把那段树皮旋转着退出来，成了一截完整的圆筒，再从任意一端刮去外层一圈较为僵硬的皮，这个长度不能超过一厘米，露出里面淡黄的丝状皮质，捏扁之后，柳哨就做成了。咬在嘴里一吹，会发出嘟嘟的声响，没有旋律，也没有节奏，怎么吹也是单调的一种，如果双手握在一起，空着手心搭在柳哨的前面，吹的又是另一种声音，像陶埙发出的呜呜之声，沧桑而沉闷。

现在，柳树还没有发芽。

吃完爆米花，大人们下地点种苞谷，让闲不住的我们无所适从，棉袄脱了穿，穿了脱，总没个合适的温度，就连游戏，也没有能搭配在这个月份的。放了学，小伙伴们也不愿意急着回家，三五个相约去河边抓鱼。那时的水多清啊，能看见鱼漂在其间，它们似乎在挑衅我们不敢下去。常常一起脱了鞋袜，挽起裤子下河，双手构成勺状，猛然捞起——明明看见捧住了一条银亮的鱼，可直起腰时，发现手中只有冰凉的河水，连鱼的影子都不见。在河里待得久了，棉裤的裤腿会滑下去，浸泡在水中，不到水把腿脚冻得站不稳我们都不会出来，直到坐在岸边穿鞋，才发觉冻得通红的腿脚早就麻木了。

回到家，大人一看湿裤腿，就知道我们下河抓过鱼，心疼之余，免不了抓过笤帚疙瘩揍我们一顿，警告再不许去河里。揍完了，还得就着烧炕的柴火，给我们烘干裤子。睡一觉起来，我们就忘了挨揍的事，一有好天气，还是照样往河边跑。

河沿上曾经水草丰茂的地方，在二月里会有大片的青蛙卵漂浮不定，像一张破渔网上串着无数的珍珠，被风吹动着，在水面上荡来荡去。过不了多久，那些珍珠里会游出小小的蝌蚪，一大片一大片地游动在水中，仿佛河水的眼睛。老师说，我们都是蝌蚪变的，因此我们认定这是自己的同类，不敢去伤害它们，只是我们总有疑惑：为什么蝌蚪能在冰冷的水中游泳，而我们只能在地上行走？不过我们也庆幸自己在由蝌蚪变成人的时候，没有继续保留那条难看的尾巴。

此卷人主书家书海四幅，其十四人书幅
为意画心，三幅并方石后应瞻而书者
不得近此近相察之，皆不称柳，因不称是月
身骨瘦事，願自静心，且難，山，志，淡，书，人，家
有所悟，為金何，新，照，明，因，不，我，也，道，祈
甚幸

丰泉 谷童

2019年第3期
(总第96期)
2019年9月出版



启功题

主办单位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编辑发行
《甘肃文史》编辑部
准印证编号: NO13号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寇明春

编委会副主任

李佩芬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希隆 陈天铀 陈自仁

李正宇 李并成 张改琴

张崇琛 杨国光 林家英

赵逵夫 莫建成 漆子扬

(04) 杨惠福

(11) 汪受宽

(15) 陆庆夫

(20) 李并成

(24) 张振兴

(30) 刘启舒

(37) 赵逵夫

(41) 张崇琛

(46) 陈自仁

(51) 贺文宣 杨士宏

(57) 郝洪涛

(62) 陈新长

(65) 崔俊堂

(68) 韩甦毅

目 录

GAN SU WEN SHI MU LU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栉风沐雨七十年 文物事业铸辉煌

【丝路论坛】

甘州名“甘”考

“天下富庶无如陇右”新探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

明肃王与左宗棠对甘肃文化教育和

工业文明的贡献

清末民初碧口至重庆水路运输漫话

【文史论坛】

《诗经》里的甘肃

谈谈天水的三国古战场文化

略论老子修身思想的当代意义

【人文视野】

“吐蕃”一称语源新证

墨子的政治主张(下篇)

“澹”的审美意义

有关天河注水的短歌

【陇原文史】

吴佩孚在甘肃陇南

文化自信的先行者刘尔炘

漆子扬 (70)

张九畹其人、其文、其书

罗愚频 (73)

【文艺评谭】

艺术创作不能放弃生活的积累

杨立强 (77)

浑融于笔墨深处的西部情韵——我观国画家李伟

雒青之 (81)

评论二则

兰干武 马国俊 (86)

【序与跋】

序言二则

钱墨君 (88)

序跋四则

小 米 (91)

【风雅撷珍】

张文轩 张克复

(94)

张化麒 王得诚 王长顺

(95)

齐培礼 王仕海

(96)

【美术书法】

卷首插图 焦玉洁书法二幅

封 二 师云国画作品欣赏

彩插 1 阎仲雄国画作品欣赏

彩插 2 秦理斌书法作品欣赏

彩插 3 陶劲涛书法作品欣赏

彩插 4 萧喈国画作品欣赏

封 三 周玉兰国画作品欣赏

封 底 焦玉洁书法

《甘肃文史》编辑部

主 编 寇明春

副 主 编 李佩芬

责任编辑:

王处机 尚建荣

朱黎明 贺 芳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 239 号

邮 编: 730010

电 话: 0931-8581061

0931-8581065

e-mail:

www.gswws@163.com

《甘肃文史》博客: <http://>

bolg.sina.com.cn/u/2554760417

【作者简介】

杨惠福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栉风沐雨七十年 文物事业铸辉煌

——甘肃文物事业 70 年发展回眸

杨惠福

陇原大地,是一片神奇的热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奔流不息的黄河孕育了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汇聚而产生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农耕文明和丰沛的畜牧业文明;在这里,雪山冰川融化出数条涓涓河流,养育了片片绿洲,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绿洲文明;这里是跨越两千年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这里有无数绚烂夺目的文化瑰宝。

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和特色。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省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甘肃文物事业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回顾 70 年来,甘肃文物事业在风雨中砥砺前行,有低潮,有失误,有挫折,但更多地是成绩斐然,在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研究弘扬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一、查清家底,筑牢文物事业发展基础

我省文化遗产资源种类多、数量大,在全国文物领域排序靠前,值得称道。甘肃是彩陶之乡,甘肃彩陶文化享誉世界,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甘肃有新石器时代的命名文化和文化类型达 12 种之多。甘肃是秦人的发祥地,天水、陇南、陇东地区是早期秦人生存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早期秦文化遗址、墓地、陵园承载着中国一段辉煌历史。佛教石窟寺文化遗产特别丰富,全省有 330 余处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窟寺,早在 20 世纪之初就被保护、研究、利用。长城是甘肃的另一大优势,经过几十年来的调查并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利用。

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如何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价值,为社会进步而服务。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这一基础性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甘肃人民委员会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从 1958 年到 1960 年历时两年共发现各类文物 1000 余处,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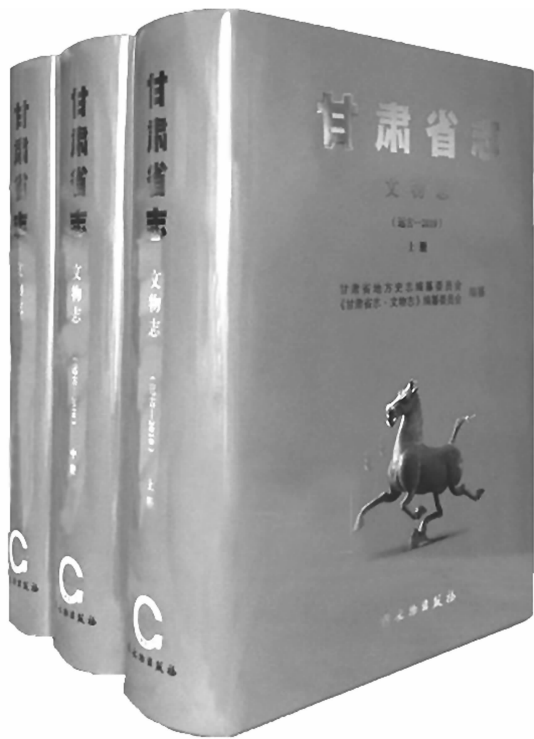
水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都是在这次普查中被发现并上报国务院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7年和1960年,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先后公布了两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465处。通过此次普查,初步建立了全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系。

“文革”中,我省文物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全省有2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其中有11处灭失,损失惨痛。“文革”中后期(1972-1978),国务院、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先后发出了《关于炳灵寺石窟防护的通知》(1967)、《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1971)、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甘肃省文化局在兰州召开全省文物工作会议,落实中央关于保护文物的方针政策,动员恢复全省文物工作。省文化局

组织开展了第二次全省文物普查,这次文物普查,主要是对已经普查登记过的文物点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现状、保护管理情况进行梳理,同时,培训文博干部。各县区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文物普查。组建了居延考古队,对居延地区城障、烽燧、塞垣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进行了重点发掘。省文化局组建长江上游文物考古普查队,对甘肃境内长江流域进行文物普查,在白龙江流域发现寺洼文化遗址15处。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庆阳、镇原、环县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河西各区县以武威为重点调查地区并举办了为期45天的“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在酒泉、张掖等地全面开展了文物普查活动。首次对红军长征在甘肃境内的文物遗迹开展调查,征集到一批革命文物,确认长征时期毛泽东在静宁界石铺、通渭榜罗镇、宕昌哈达铺等地的住址。

改革开放后,文物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级政府对文物工作普遍开始重视起来,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河西汉塞进行全面调查,历时多年,对敦煌、安西、高台、武威、金昌、民勤、永登、兰州、嘉峪关、酒泉、玉门、景泰等20多个县域内的长城进行了科学考察。发现了嘉峪关黑山岩画、肃北县大黑沟岩画。提出了对包括泾川南石窟寺、玉门昌马石窟群、玉门关遗址等重点文物的保护意见和建议。庆阳地区博物馆对秦长城进行调查,历时三年,查明辖区内秦长城全长242公里。定西地区博物馆也对辖区内的秦长城展开调查。嘉峪关市对嘉峪关关城及附近的明长城进行了调查。山丹县、武威县都进行了长城调查。2006年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我省组织13支专业队伍,历时五年,在全省11个市州、38个县区约25万平方公里的陇原大地上查清各个历史时期的长城遗存3560余千米,其中秦长城440余千米,汉代长城1400余千米,明代长城1738.8千米,其他时代长城19千米,长城烽燧、城障、关堡等附属建筑2398处(座),明代长城居全国各省长城之首。

1987年至1989年,我省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此次普查,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成



【图解】

《甘肃省志·文物志》

立了省级文物普查机构,省政府分管文物工作领导亲自挂帅,各市州、区县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和工作队伍。普查的中心任务是落实文物“四有”工作(有保护机构和人员,有专门保护经费,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历时3年,全省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13603处,普查中征集流散文物15473件,登记传世文物4593件。在各级文物点上树立了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了保护机构,有的区县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的价值,积极保护维修文物,开辟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旅游项目。

2007年国家统一部署开展第三次全国性文物普查,此次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组织最严密,投入财力、物力、人力最大、要求最高、采用技术路线和科技手段最完备的一次大普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重视程度自不待言。全省86个区县,都建立了普查队,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3700余人次参与了这次文物普查,全省资金投入超过了千万元。全省普查各类不可移动文物16895处,其中国保131处,省保556处。同时还进行了长城专题调查和馆藏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对全省328家国有博物馆、研究机构、行业博物馆等收藏单位可移动文物全面清查、登记、摄录像、存储建立了数据库。全省现有可移动文物423444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17470件(套),包括一级文物4532件(套),二级文物11830件(套),三级文物101108件(套)。摸清文物家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利用做到心中有数。为我省建设文化大省,文化遗产强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保护维修担大任,众多重点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前,战乱频仍,国运凋敝,许多文物受到自然和人为损坏,得不到有效保护。解放后,党和国家重视文物保护工作,1950年9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了《重视文物的保护与管理的通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人民解放军进驻并接管了莫高窟。随后组织专家对莫高窟全面勘察,提出保护维修方案,对石窟内壁画、唐、宋时期的木结构窟檐等进行抢救性保护加固,该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首次由国家拨款实施的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此后的60余年间,由中央财政、甘肃财政、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莫高窟、榆林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和一些重要古建筑进行全方位保护维修。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拨专款100万元对莫高窟进行加固维修,之后又多次全面加固维修,70年间对莫高窟维修资金投入超过5亿元之多。今天我们看到莫高窟优美的环境,整齐便捷的参观栈道,是各级政府对这一世界艺术宝库的保护维修的成果。1958年,朱德委员长视察观察嘉峪关后,拨款10万元对嘉峪关关城进行了全面维修,1984年起,在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下,嘉峪关市乃至全省齐聚力量维修嘉峪关关城及附近长城,甚至有农民亦加入长城维修之中,使甘肃长城在保护利用方面大放异彩。

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引下,70年来,国家,省里,当地政府对各级各类文物保护维修经费投入不计其数。重点维修工程项目有近百项。其主要有:炳灵寺淹没区防护堤坝加固、岩体加固及渗水治理、唐代大佛维修,麦积山石窟岩体加固、栈道修复、渗水治理、瑞应寺修缮,北石窟岩体加固,夏河拉卜楞寺宗喀巴大殿维修,武威白塔寺遗址保护,永登鲁土司衙门旧址维修,皋兰文庙移地保护修复工程,张掖高总兵府、山陕会馆、大佛寺维修等工程。经过保护维修的这些文化遗产,大多成为了旅游产业的重要载体。

三、考古研究,服务社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和保障

我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起步较早,上世纪20年代瑞典人安特生在洮河流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随后,我国考古学家夏鼐、向达、闫文儒等先生在兰州、临夏积石山、敦煌等地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对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简牍文化深入研究,建立起了新的古代文化序列。解放初期的重要考古发掘有:1953年配合兰新、天成铁路建设工程清理发掘工程涉及范围内的文化遗址、墓葬,在古浪、武威、永昌境内考古发掘,出土文物1073件。省文管会组织发掘兰州白道沟马家窑文化马厂期制陶窑场,该窑场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制陶场所。还发掘了兰州七里河区上西园明代兵部尚书彭泽夫妇合葬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配合刘家峡水电站建设,在永靖县秦魏家、大河庄发掘130余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和遗址。在庆阳合水发掘了黄河古象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骨器等文物。对莫高窟窟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清理发掘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葬,出土各类文物40余件,铜器有铭文。这批文物大部分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1968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武威雷台汉墓的发掘,出土随葬器物230余件,其中铜车马仪仗队被鉴定为一级文物,著名的“铜奔马”出自该墓中。

1971年至1978年,先后发掘了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墓,武威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白马作”毛笔。发掘灵台白草坡西周墓群及车马坑,漳县汪家坟元代墓群,居延地区重点发掘肩水金关、甲渠候官等遗址,出土汉代简牍23000余枚,其中《甘露二年御史书》、《塞上烽火品约》都是极为宝贵的一级文物,与之后在敦煌马圈湾、悬泉置发掘出土的汉简成为了20世纪影响世界史学界的显学。这一时期还发现了“泾川人”头骨化石,平凉庙庄战国秦墓,景泰县张家台新石器时代半山类型墓葬,发掘出土木棺、石棺等葬具,是西北地区首次重大发现,东乡县林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掘出铜范浇铸青铜刀,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这一时期另两项极为有影响的考古发掘,一是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四坝文化原始聚落和墓葬,共清理墓葬312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是省内发现早期铜器最多地点。二是开始发掘秦安大地湾遗址,到1984年底,共揭露面积13700余平方米,发掘出土文物8000余件,骨器及兽骨标本17000余件,发现房屋居址260余座,灰坑、窖穴342个,墓葬79座,窖址38个。时代为距今7800年至4500年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它的时代久远,宫殿式大房子遗迹,当时轰动了中国考古界。

改革开放40年来,甘肃文物考古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甘肃考古人不负使命,奋力拼搏,这一时期文物考古不仅仅是停留在配合基本建设的清理发掘,而是有方向、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了科研考古项目。在永登县河桥镇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王和迄今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一套7件。在水北道区放马滩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墓葬中发掘出中国时代最早的木板地图4块7幅,西汉时期的纸质地图残片,将中国造纸、使用纸张的历史提前200余年。甘肃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发现小麦、粟等农作物炭化籽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小麦的国家之一。煌研究院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批准清理发掘莫高窟北区,对270余个洞窟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认定这里是历代在莫高窟生活的僧人的居住僧房窟、禅窟、瘞骨窟,发现西夏时期泥活字等珍贵文物。与日本秋田县合作,在武威旱滩坡等地联合考古发掘,互派研修人员进行考古技术的学习交流。开展

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调查、挖掘研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规划出为期20年的早期秦文化调查与研究课题项目,在礼县大堡子山、西山坪、鸾亭山、六八图、甘谷县毛家坪、清水县李崖、张家川县马家塬、恭门镇、秦亭等地的重要秦文化墓地、遗址、城址等进行了10余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厘清了秦人早期在甘肃境内的活动和发展壮大脉络。礼县大堡子山早期陵园考古发掘和张家川马家塬战国秦人墓地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06年、2008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广河县齐家坪齐家文化遗址保护性发掘,秦安大地湾二次考古发掘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在有序进展。

改革开放时期配合国家建设工程开展的考古工作任务十分重要。上世纪80年代在敦煌为飞机场建设、青海石油基地建设,在佛爷庙湾、祁家湾发掘清理了近千座汉、唐墓葬。上世纪90年代为兰新铁路复线建设清理古墓葬、古遗址40余处。2003年至今,为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连霍高速公路、兰新高铁建设在河西走廊997公里长,230余公里宽的地域进行了数十项考古发掘任务。为九甸峡水电建设项目,在卓尼县、临潭县、岷县洮河两岸进行考古工作,对卓尼藏王坟、藏王庙进行了发掘与保护。在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出2000余座墓葬,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发现和科研墓地。

甘肃文物考古事业70年,历尽沧桑,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有为古墓葬被盗而跟着盗墓分子“走”、收拾残局的尴尬与辛酸;有为基本建设项目而完成重大考古任务而感到满足,更多的是科学考古发掘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喜悦与自豪,为甘肃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让文物活起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甘肃省博物馆建设较早,1953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将西北人民科学教育馆改组为甘肃省博物馆筹备处,开启了西北地区博物馆建设的先河。很快举办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甘肃历史文物》《甘肃自然富源》《甘肃革命文物》等展览,对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甘肃富源辽阔、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和美好新生活,向刚刚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进行了很好的宣传,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人民,鼓舞人心的重要场所的作用。但是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全省仅有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文物陈列室等少数几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也多以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为主,许多珍贵文物“藏在深闺人未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

改革开放后的40年,是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特别是近十年。我省的博物馆建设如雨后春笋,不断掀起新的高潮,博物馆数量持续增加,博物馆展览品类日渐丰富,博物馆藏品保管和研究水平、陈列展览条件显著提高。全省共有各级各类文物收藏单位350多个,其中国有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陈列馆210余家。企业博物馆、民营博物馆、乡村陈列馆、非遗博物馆等约有140余家,有些市县一座城市就有三四家博物馆,如兰州市就有各类博物馆近20家,嘉峪关市人口仅有20余万,拥有五家博物馆,阿克塞县仅有1万余人,拥有一座近3500㎡的现代化博物馆,办有国际水准的哈萨克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展览。民营阳关博物馆每年接待参观游人50万以上。金徽集团把大量与酒文化有关的文物保护陈列在专门的陈列馆中,借文物品牌,大力弘扬企业文化。天庆

集团博物馆、民乐金山博物馆等个体经营的博物馆都按照博物馆条例和办馆准则,收藏文物,举办展览,向社会大众传达正能量。最可贵的是金昌市永昌县双湾乡的村民在自己的家门口办起一个新石器时代沙井文化专题博物馆,来铭记历史,激励奋发进取的精神。

博物馆迅猛建设发展与中央实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英明决策相关。2008年起,中央财政拿出专款补助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我省每年可得到中央财政1亿9千万左右的免费开放资金,补助到117家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目前全省的所有国有博物馆、纪念馆都已实行免费开放。

几十年来,全省各博物馆举办各类陈列展览不计其数,展览内容丰富多彩,主题鲜明,形式灵活多样,注重艺术和高科技、新材料的合理利用,陈列的科学性、观赏性、趣味性都有极大的提高。甘肃省博物馆的《甘肃彩陶展》《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甘肃古生物化石展》等基本展览,先后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天水市博物馆、武威白塔寺陈列馆的展览亦获得各类奖项。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级各类博物馆年均举办展览两百余个,观众500万人次以上。博物馆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终身受教育的课堂。

我省各类珍贵文物展览渡海出洋、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展出,70年来,各类展览到近70个国家展出。莫高窟文物艺术大展已展出过50余国,并数次在香港,澳门,台湾展出。去年以来,以流动的博物馆形式走进高校、走进军营、走进社区,向社会广泛宣传、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瑰宝。近期在国家博物馆隆重推出的《丝路孔道——甘肃珍贵文物展》,受到国内外媒体和参观者热捧,再次向全世界宣传甘肃。

五、科技引领,探索创新,文物保护科研成绩卓著

文物科技保护之路走的曲折而艰辛,特别在甘肃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保护文物的艰难程度不言而喻。以莫高窟文物保护为例。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当时的保护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看好门,使洞窟壁画,塑像不被人为损坏。二是清沙防沙,每天要对洞窟内的沙子清扫拉运出去,塑像的起痂、酥碱、脱落等病害的处理,仅停留在初级检测观察阶段。近40年来,敦煌研究院以科技引领,开展多领域,多学科的文物保护技术、材料的试验和创新,在石窟寺和土遗址保护、壁画、塑像修复、馆藏文物修复保护方面形成明显的优势,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成为甘肃文物事业的亮点。据不完全统计,近40年来,甘肃文物系统承担国家和省级文物科研课题200余项,其中20余项研究成果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甘肃省文物系统专家学者,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物保护科技论文400余篇,出版文物科技保护专著20余部。“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科技研究中心”、“甘肃省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文物科研基地落户敦煌。省博物馆纸质、木质文物科技保护实验室,天水市博物馆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科技保护室相继建立,为我省乃至全国的馆藏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成就。

敦煌研究院充分发挥壁画保护、土遗址加固方面的技术优势,先后组织实施了中央援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中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的病害壁画的保护修复工

程,新疆交河故城土遗址抢险加固工程,宁夏银川西夏王陵试验性加固保护工程,内蒙古元上都古城土遗址保护工程等。

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对游人参观洞窟,造成洞窟内壁画受损的情况,进行游客承载量监测与研究。采用科技手段对每个洞窟进行游客数量、时段调控,较好地缓解了因人为因素影响洞窟壁画、塑像寿命的难题。游客中心、数字中心的建立,都是采取科技力量对莫高窟这一人类珍贵文化遗产最有效的保护。

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世界更加深入了解甘肃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文明标志和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专门负责各国的遗产申报、评审,最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现象,被世界认可和尊重、向往。可以使人们在较短的时间了解和认识这种文化现象,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我国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现在已有53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次会议审议同意我国五处文化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和长城其他关隘共同以“万里长城”名义)入选。2003年,丝绸之路申遗项目正式启动,最初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亚欧15国参与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被推选为委员会的双主席国。

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经贸往来的大动脉,也是探寻沿线国家文化的重要线路。对丝路申遗,党和国家极为重视,我省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丝路申遗绝不可或缺。2007年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甘肃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邀请文博专家组成申遗专家组,对省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遴选,初选出11处国保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开始按申报要求作申遗准备工作。经过五年时间的艰苦工作,对遗产本身价值评估、遗产保存现状、环境整治研究、利用成果分析等条件的考察,我省和陕西、河南、新疆、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33处遗产点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省有五处: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小方盘城)及附近汉代长城遗址。目前我省世界文化遗产共有七处,仅次于北京和陕西。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好诠释,它搭建起了与世界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更好地弘扬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甘肃文物事业走过的风雨历程,我们不无自豪的说,甘肃文物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广大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甘肃文物事业已融入到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文物作为重要旅游资源,对甘肃以旅游强省的战略奉献了应有的价值。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守护精神家园,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精神生活已深入人心。

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传承永远在路上,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加扎实工作,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甘州名“甘”考

汪受宽

汉武帝开河西,以原匈奴浑邪王地置张掖郡。张掖郡地在北魏末改名甘州,后代多所沿用,并有添加某通名为新名的,如西夏之甘州甘肃监军司,元之甘州路,明之甘州卫,清之甘州府,现张掖市城区之名甘州区,而今甘肃省之甘字亦来自甘州之名,可见甘州一名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甘州一名的来历史书中有多种说法,之前未见讨论,故撰此文予以考究。

甘州一名,始于西魏。唐《元和郡县图志》言:“后魏太武帝平凉,以为张掖军,废帝二年改军置甘州。”^①其中有两个错误,一是并非改张掖军置甘州,二是改甘州的时间有误。宋《太平寰宇记》订正了《元和志》的一个错误,言:“后魏太武平凉,以为张掖军,至太和十一年(487)改军为郡。大统十二年(546)分凉州,以居张掖郡之地为西凉州。废帝二年更名甘州,因东甘峻山之为名也。”^②唐贞观十年(635)撰成的《周书》记载,西魏废帝元钦三年改西凉州为甘州,云:废帝“三年(553)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又改置州郡及县:改东雍为华州,北雍为宜州,南雍为蔡州,华州为同州,……西凉为甘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县二百三十。”^③这是在权臣宇文泰控制下以西魏废帝名义做出的两个重大决定,其一是定九品职官之制,影响直达清末,另一个就是改州郡县名称,包括改西凉州为甘州。我们知道,《周书》撰成时间比《元和郡县图志》的撰成时间(813)早近200年,比《太平寰宇记》的撰成时间(990)早355年。《周书》领修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为宇文氏北周政权的骨干,参撰者岑文本、崔仁师等也与北周政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对北周及其开创者宇文泰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有西魏史官柳虬和隋代牛弘的北周史著述可供参考,其资料的可靠性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故而,西凉州(张掖)改名甘州的时间应该定为西魏废帝元钦三年(553)。

对甘州何以名“甘”,有三种说法。其一因州东甘峻山、其二因地多甘草,两种说法皆来自唐《元和郡县图志》,言:“废帝二年改军置甘州,因州东甘峻山为名,或言地多甘草,故名。”^④

先讨论地多甘草故名说。甘草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列于草部药物之首,其【集解】云:“《别录》曰:甘草生河西川谷积沙山及上郡,二月八月除日采根暴干,十日成。陶弘景

【作者简介】

汪受宽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兰州大学教授

①[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1页。

②[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0页。

③[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2《文帝纪下》,中华书局,1971年,第34页。

④[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1页。

⑤[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十,卷十二“草部”第81—82页,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

⑥[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7、40《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972、1042、1043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86.87《地理志》，第2152、2157、2158、2165页，卷186《食货志下八》，第4563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⑧〔唐〕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典第922页下栏。

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1页。

⑩〔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0页。

⑪〔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影印宋本，第二册第101—102页。

⑫〔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考第2536页中栏。

⑬〔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隆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6632页。

⑭〔丁酉重刊〕《甘镇志·地理》，“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册，第16页。

⑮〔乾隆〕《甘州府志》卷4“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册，第221页。

⑯〔民国〕《张掖县志》“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5册，

曰：河西、上郡今不复通市，今出蜀汉中，悉从汶山诸夷中来。赤皮断理，看之坚实者，是抱（枹）罕草，最佳。抱（枹）罕，乃西羌地名。^⑤”《别录》全名《名医别录》，一般认为系汉代医药学著作，是则汉代认为质量最好的甘草产于河西及上郡，但并未明言所谓河西就是张掖。南朝医学家、道士陶弘景注《别录》言，因南北分裂，当时南朝与河西、上郡诸地无商品交通往来，故其所用甘草多来自蜀汉诸地，而最好的甘草则是枹罕（今甘肃临夏）所产。唐、宋史《地理志》列有各州郡贡品。《新唐书·地理志》中，灵州灵武郡（即汉上郡）、洮州临洮郡、岷州和政郡都贡有甘草^⑥，独独河西诸郡没有以甘草为贡品的。《宋史·地理志》中，环州、原州、德顺军、岷州、兰州皆贡有甘草，河西时属西夏管辖，西夏在保安榷场与宋互市，交易物品有甘草，但未明系何地所产^⑦。可见，虽然河西各地产有甘草，张掖所产不一定是最优质的。张掖虽然“地多甘草”，因出产甘草而以名州的说法难以服人，后来此说未见有著述采用。

以甘峻山为州名说，几乎得到自唐以来的历代重要史书所采纳。如唐《通典》言：“西魏置西凉州，寻改为甘州，因州东甘峻山为名。”^⑧五代撰《旧唐书》言：“后魏置张掖军，孝文改为郡及县，州置西凉州，寻改为甘州，取州东甘峻山为名。”^⑨宋《太平寰宇记》言：“后魏……废帝二年更名甘州，因东甘峻山之名为也。”^⑩宋《舆地广记》言：“元魏置张掖郡，西魏置西凉州，寻改曰甘州，因州东甘峻山为名。”^⑪元《文献通考》言：“西魏置西凉州，寻改为甘州，因州东甘峻山为名。”^⑫元《资治通鉴注》：“其地自西魏以来，为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为名。”^⑬既然得到这么著名史家的认可，甘州因城东甘峻山为名的说法在学界广泛流传。

第三种说法来自于明万历《甘镇志》，认为系因城西南甘浚山下的甘泉以名郡，言：“甘泉，城西南八十里甘浚山下，味甘冽，因以名郡。又城南门内东三十余步，亦有甘泉，北流出城，引以转碕。”^⑭明确交待，张掖城及其附近有两眼甘泉，一在甘浚山前，一在城南门内，明清甘泉书院就设于张掖城内甘泉边。甘州之名来自城西南八十里甘浚山前之甘泉，而非城南门内之甘泉。《甘镇志》的意见，得到地方学者的赞同。清乾隆《甘州府志》云：“甘泉，城西南甘浚山下，有泉甘冽，因以名郡。”^⑮民国《张掖县志》言：“甘泉，城西南甘浚山下，有泉甘冽，元魏以名州。”^⑯这一说法，也得到甘肃省级地方志的认可。由时任甘肃巡抚李迪监修的乾隆《甘肃通志》卷三上“建置上·甘州府”称：“西魏置西凉州，更名甘州，取州西甘浚山泉味甘冽为名。”清升允、长庚监修，安维峻纂光绪《甘肃全省新通志》也采用此说法，在卷七“舆地志·山川下·甘州府”载：“甘浚山，在县西南八十里，山下有泉，味甘冽，故名。”^⑰该说法还得到朝廷官书的响应。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言：“甘浚山，在都司城西南八十里，有泉甘冽，因名。又名绀峻。”^⑱甚至顾炎武《肇域志》也引述此说，称：“甘州卫，本匈奴浑邪王地。汉置张掖郡，取张中国臂掖之义，后又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后魏置西凉州。西魏更名甘州，取州东甘浚山泉味甘冽为名。”^⑲

细究以上诸书，出现了甘浚山在张掖城东还是城西北、西南的问题。这里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即张掖郡或甘州治所，前后有所迁改，汉至隋末之麟得、永平、张掖县治，皆在今张掖市甘州区西北40里的明水乡黑水国遗址，唐武德二年（619）张掖县治迁移于今甘州区。但相对于我们讨论的三座甘浚山，其方位都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距离不同而已。原来，张掖附近有三座山都曾名甘浚山（甘峻山）。清官修《嘉庆一统志》“甘州府·山川”言：“甘峻山，在张掖县东北。《隋书·地理志》张掖县有甘峻山。《旧唐书·地理志》甘州取

州东甘峻山为名。《元和志》在县东北四十五里,出青鹞鹰,称为奇绝,常充贡献。《寰宇记》甘峻山,一名绀峻山,《注水经》云,弱水历绀峻山南,与张掖河合,是也。按《行都司志》有人祖山,在甘州卫东北四十里,俗名快活山,其山不毛,盖即古甘峻山。”又有“龙首山,在山丹县西北二十五里边外,明万历中夷人青把都自昌宁湖移驻于此,巡抚田乐击走之。一名龙头山,俗呼为甘峻山,山腰有三洞,各深五尺,山阴有泉,旱可祷雨。”^⑮乾隆《甘肃通志》卷六“山川二·甘州府”中辨证了甘浚山与甘峻山之别,言:“甘浚山:在县西南八十里。山下有泉,味甘冽,故名。”“人祖山:在县东北四十里。俗名快活山,其山不毛。《一统志》,东北四十五里有甘峻山,即人祖山,与甘浚山别。”^⑯显然,甘州得名之甘浚山在城西南八十里,而其它两座作为张掖北山部分的又名甘峻的山,一为城西北的龙首山、龙头山,甘峻山只是其俗名,即民间误传,一为城东北的人祖山,俗名快活山,只是被学者误判为古甘峻山。诸地方史撰述者因对上述几个以甘浚山或甘峻山为名之山的准确认识,故而坚称甘州地名来自于城西南八十里属于祁连山支脉的甘浚山前之甘泉。

在历史文献中,甘浚山有三种写法。其一为绀峻山,见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其文今佚。《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二·甘州·张掖县》有“甘峻山,一名绀峻山。《水经注》云:‘弱水历绀峻山南,与张掖河合,即鲜水也’。”^⑰其二为甘峻山,最早见《隋书·地理志》,言:“张掖(县)……有甘峻山、临松山、合黎山。”^⑱此后,《通典·州郡四》《旧唐书·懿宗本纪上》《旧唐书·地理志三》《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资治通鉴》胡注、《文献通考》《明实录》《读史方輿纪要》《清史稿》等皆如此书写。其三为甘浚山,《万历甘镇志》言:“甘浚山,城西南八十里,山下有泉,味甘冽,故名。”^⑲是说山因泉名,甘浚山之名来自于山下之味甘冽的甘泉,因而山名用“甘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明以来张掖地方志书皆如此书写该山名。查考历代史部著述,山名用“甘浚”者,首见《西夏书事》,文为:“崇宁二年、辽乾统三年、夏贞观三年(1103)春二月,逢(汪按:应为“建”字)卧佛寺于甘州。乾顺自母梁氏卒,辄供佛,为母祈福。甘州僧法净于故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⑳这是讲僧人在城西南甘浚山下发现三尊古佛,因此西夏崇宗乾顺下诏在张掖城内建卧佛寺,以供养之,且赐额“卧佛”。文中称故张掖县,是因宋甘州府张掖县西夏时改称宣化府镇夷郡。《西夏书事》作者是清江苏清浦县(今属上海)人吴广成,鉴于西夏没有“正史”,史料散佚严重,他博引古代诸正史、文集和杂史中与西夏有关的资料排比编次而成该书,其史料价值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故而其中所书“甘浚山”应为当初西夏史书的原用字,并非吴广成误书,从而证明了明地方史称山名“甘浚”是有历史根据的,并非肆改甘峻山所成。古代张掖城附近有三座龙王庙,皆在城西。“一在城西南八十里,张掖河来经流处,旧名河湊神庙,前有水涡,入小出大,莫测浅深,岁旱祷雨辄应。”^㉑城西南八十里,与诸地志所言甘浚山位置相同,应即甘浚山。庙前入小出大莫测深浅的水涡,就应是甘浚山因之得名的甘泉。明代称此庙为上龙王庙,清代称此庙为黑河龙王庙,据云该庙西夏始建,本名河湊神庙,求雨必应,为“甘民衣食源”^㉒。不仅与上引西夏在城西南甘浚山发现三古佛的史实相呼应,也因为山与泉相关,而成为其名甘浚山的有力证据。此写法,被清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沿用,言:“西魏置甘州,取州东甘浚山为名。”^㉓乾隆《甘肃通志》卷三上、卷四、卷六、卷十、卷二十二共用九个“甘浚山”。

明何景明撰《雍大记》称张掖形势言:“左人祖、右甘浚,如飞鸟之张翼;南祁连、北合

第335页上栏。

⑮[清]升允、长庚监修,安维峻纂[光绪]《甘肃全省新通志》卷7“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省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册,第490页上栏。

⑯[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37“陕西行都指挥司·山川”,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第653页下栏。

⑰[清]顾炎武撰,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肇域志》“陕西行都司·甘州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66页。

⑱《嘉庆一统志》卷266“甘州府·山川”,四部丛刊第2318册。

⑲[清]许容监修、李迪等撰,刘光华等点校整理《[乾隆]甘肃通志》卷6,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0页。

⑳[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2页。

㉑[唐]魏徵等撰《隋书》卷29“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815页。

㉒《丁酉重刊甘镇志·地理》,“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册,第16页。

㉓[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31,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㉔《丁酉重刊甘镇志·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册,第46页。

㉕[乾隆]《甘州府志》卷5“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

出版社,2008年,第44册,第252页。

②〔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63,中华书局,2005年,第2972页。

③〔丁酉重刊〕甘肅志·地理·山川》引,“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册,第16页。

④《嘉庆一统志》卷266“甘州府·关隘”,四部丛刊第2318册。

⑤〔清〕梁份撰,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秦边纪略》卷3,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

⑥〔清〕梁份撰,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姚继荣校注《秦边纪略》卷3刊用《边政考》地图,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

⑦〔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2页。

⑧《清史稿》卷78“地理志二十五·阿拉善额鲁特部一旗”,中华书局,1977年,第2444页。

⑨〔乾隆〕《甘州府志》卷15“艺文下”,“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4册,第554页。

黎,若雄虎之对蹲。^⑩”说明甘浚山位于张掖城西。几种地志皆明载甘浚山在张掖县西南八十里,光绪《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輿地考·图考》之“甘州府张掖县图”,在张掖县西南有甘浚山。明朝甘州左卫有甘浚堡,“在张掖县西南八十里,黑河西,明置,城周三百五十步。^⑪”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梁份到张掖,为靖逆侯张勇部中军黄燕赞之客,遂遍游河西及河州、西宁、庄浪、靖远、宁夏、延绥诸地,且参阅相关史书及档案,著成《秦边纪略》一书。该书卷三“甘州卫”言:“甘浚堡,甘州西南六十里。^⑫”甘浚堡与甘浚山位置相同相近,显系因山而名堡,故史书中又写作甘浚堡,今甘州区西境甘浚镇,即明清甘浚堡旧地。清同治间清军与造反回军在甘浚堡发生战事,事后同治帝对甘浚堡阵亡官兵予以表彰,在《清穆宗实录》卷二百零一,同治六年四月辛丑载:“予甘肃甘浚堡等处阵亡总兵杨甫宜等二十七员祭葬世职加等。”明《边政考》“甘州山丹图”,在甘州镇城西沙井儿站西南有甘浚堡,堡西南侧祁连山麓丘陵间有甘浚山口^⑬。从方位来看,甘浚山口就是距张掖市甘州区40公里今属临泽县倪家营镇南台子乡的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主景区。张掖丹霞地貌方圆500余平方公里,位于祁连山北麓丘陵地带,海拔高度在2000米至3800米之间,无数的山峦多由红色砾石、红砂岩、红泥岩组成,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水经注》(佚文)最早称该山为绀峻山,云:“弱水历绀峻山南,与张掖河合,即鲜水也。^⑭”所谓绀,是略呈红色的深青色。而张掖丹霞地貌数以千计的山峦呈现出的正是“绀”字所形容的颜色。《清史稿》称,甘浚山蒙语名阿喇克鄂拉^⑮。请教蒙古语专家得知,在蒙语词典中,鄂拉为山,阿喇克有三个义项:①花式的,杂色的,斑驳的。②不齐的,不整齐的,各式各样的。③异样的,不相似的。看来在蒙古语中,甘浚山就是花式的、杂色的、颜色斑驳之山的意思,这不就是对丹霞地貌最好的白描吗!蒙古同胞是因其色彩名山啊。乾隆《甘州府志》中有甘泉书院山长庄学和《辑甘州志咏四十韵》,在“泉味名甘绀峻异”句下的自注辨言:“甘州以泉名,将《水经注》绀峻山讹作甘浚”^⑯。指出《水经注》名该山为绀浚,后来才讹为甘浚的。我们以为,绀峻山名改写为甘浚山的时间应该在西魏初年,否则废帝三年时不会将州名命为甘州,而应命为绀州。

以上杂引诸书的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甘州之名,系西魏废帝三年(553)改西凉州而来。第二,史书中关于甘州之名来历的三种说法,因州东甘浚山说和因地多甘草说都难以成立,只有来自城西八十里甘浚山前甘泉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第三,甘浚山在北魏酈道元著《水经注》时本名绀峻山,是以山色命名,但至迟到西魏初,就写成甘浚山了,西夏时也称该山为甘浚山。第四,从文献描述的城西八十里的方位及明清甘浚堡(今甘州区甘浚镇)的位置,以及《水经注》该山本名之“绀”字和蒙古语称甘浚山为阿喇克鄂拉的含义,确认因山下甘泉而命名甘州的古甘浚山就是今张掖丹霞地貌主景区。第五,甘浚山,在史书中又写作甘峻山。峻,形容山势高而陡也。浚,使水流通畅也。张掖丹霞地貌景区位于祁连山北麓丘陵地带,山形系连绵不绝的小山丘,而非陡峭的高山,以峻字名该山是明显不妥的。甘浚山前上龙王庙之深不可测的水涡,就是甘州得名之甘泉,该泉甘冽,且出水很大,祷雨辄应,而被称为“甘民衣食源”,山因泉得名,故而该山名甘浚山是正确的。

“天下富庶无如陇右”新探

陆庆夫

笔者在1981年写过一篇题作《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的论文^①,文章在开头部分曾经引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形容开元天宝年间河陇地区经济繁荣的话:“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认为这是唐朝推行足食足兵政策,在河陇地区大规模实施屯防(加强军事防御)、屯田(组织军民垦种)、屯牧(发展畜牧业)的结果,由此导致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空前繁盛。

38年过去,笔者对此问题又有新的见解,写在这里,以求教大家。

一

关于“天下富庶无如陇右”一语,今天的人们颇持怀疑,觉得无论如何也难与甘肃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挂得上钩。但是以司马温公治学态度之严谨,其说当有所自,而决非穿凿附会之语。其实,在唐人的相关记载中就说过:

“开元初,上厉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互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③

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稹少年时曾在陇州一带生活,他的新乐府诗《西凉伎》也无感慨地追忆了河陇地区昔日的繁华之貌:

“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熟恣行乐,红颜清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别离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④

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对元稹的这首诗曾有评论说:“微之所描写者,盖得之于边陲之遗文,殊为实录,并非诗人夸大之词也。”^⑤

由此可见,唐代前期河陇地区确实出现过经济繁盛状况,“天下富庶无如陇右”一语并非虚言。

【作者简介】

陆庆夫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兰州大学教授

①原载《丝路访古》第97-12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收入《丝绸之路史地研究》第31-55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见《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二载。

③郑棻:《开天传信记》,载《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类似记载又见王谔:《唐语林》卷三。

丝路论坛

④《全唐诗》卷 419。

案：西凉州、河湟、河陇、陇右，陇中，是不同历史时期对甘肃及其附近地区的称谓。

⑤《元白诗笺证稿》第 23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⑥《元和郡县图志》卷 39《陇右道上》秦州条。中华书局 1983 年。

⑦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1975 年。

⑧《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⑨《汉书·霍去病传》。

⑩《汉书·武帝纪》。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辉煌的记载在甘肃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自安史之乱以后直到近代以来，河陇地区却一直处在贫穷落后状态甚至被扣上了“陇中瘠苦甲天下”的帽子？

二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进的大势进行分析。大体说来，中国封建帝国的历史可划作两个时期：秦汉隋唐为前一时期，宋元明清为后一时期。前一时期的发展重心在西北，后一时期的发展重心在东部。河陇地区社会蓬勃发展的历史正处于前一时期。

众所周知，秦汉隋唐诸王朝，皆崛起于西北，根植于秦陇大地。秦国先祖即起家于陇西，史载周孝公“使非子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邑诸秦，使为附庸，今天水陇西县秦亭、秦谷是也。”^⑥说明早在周朝，秦人首领非子在汧、渭间（案即今清水、张家川一带）为朝廷养马有功，受到重视，被封秦邑。及至秦襄公平犬戎，拥戴周天子东迁，又被封为诸侯。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倡导耕战，推行郡县制，首置北地、陇西郡。以上这些改革，使陇右（陇西、北地二郡大约包括今兰州、临夏、定西、天水、平凉、庆阳及宁夏等黄河以东）地区^⑦占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封建管理体制。先进的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则使秦国富强雄冠海内，亦即史称“东雄诸侯”^⑧。秦始皇正是在这一形势下，背靠秦陇，虎视中原，横扫六合，完成了统一天下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朝国祚短促，二世而亡。但由其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制定的一整套诸如土地私有、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及政策，作为一笔丰厚的遗产留给后世。

汉承秦制，在秦朝创建的基础上，经过一度休养生息，促成文景之治，社会经济由恢复进入繁荣。汉武帝即位后，着手经略西北，做法之一是发动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汉初以来，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匈奴王国长期盘踞汉朝北方及西北地区，动辄称兵南下，掠夺财物，伤害百姓。武帝启用青年将领霍去病及出身奴隶的卫青统兵，先后於元朔二年（前 127）、元狩二年（121）和元狩四年（前 119）对匈奴发动了河南之战、河西之战与漠北之战等三大战役，大获全胜。特别是河西之战，霍去病领兵数万骑于是年春、夏，先后出陇西、北地，长驱直入数千里，先由大斗拔谷（今扁都口）穿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大败匈奴骑兵；后又从居延一直打到祁连山，终使匈奴受重创而投降，退出河西之地。做法之二是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移民垦田。匈奴降汉，被安置塞外为“五属国”，而致“故浑邪王地空无人”^⑨。武帝遂决定“徙民以实之”^⑩。武帝前后共设有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并下辖三十五县，又多次调发中原下贫人户、刑徒及灾民迁入西北，重点是河西地区。先后数十万内地民户来到河西，通过开发营种，不仅弥补了河西人口之匮乏，改变了其地之民族构成，还改变了其经济结构，使原先单一脆弱的畜牧经济转向农牧相兼的稳定经济发展；中原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更在这里充分发挥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内地移民在河西长期繁衍生息，边种边守，既促进了城乡繁荣，也加强了边境稳固。做法之三是修筑边塞，加强守备。为确保西北边陲的安全，汉武帝下令修筑河西以北的长城（即“塞”墙），史书称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道通

玉门,隔绝羌胡”,“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⑩。所言令居在今永登县境,即从永登到玉门关筑塞墙,同时又建置有遮虏障、烽火台等配套防御体系。凡此,有力地保证了河西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史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惊,黎庶无干戈之役。”^⑪直到汉末,河西社会都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大动荡、大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东汉式微,天下三分,各割据政权穷兵黩武,争城掠地;西晋政衰,八王厮杀于朝野,五胡人主乎中原,造成百姓死亡流徙,社会经济破败。然而偏居西北一隅的凉州地区却依旧太平富庶。史书记载:“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八九,唯凉州独全”^⑫;“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⑬。这就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纷纷来到这里,使“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⑭。他们与当地学人一起,或开馆延学,培育人才;或著书立说,弘扬学术;或开窟造寺,宣传佛法。造就了河西历史上空前的文化繁荣高峰。北魏文人温子升曾作诗赞曰:“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⑮河西文化的繁荣,储备了大批人才。太延五年(439)拓跋氏灭北凉,悉收河西士人入代京,并“皆礼而用之”。对北魏的儒学礼仪、建筑雕塑、典章制度等的厘定以及南北朝的佛道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促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以及由孝文帝发动的以民族融合为宗旨的汉化改革^⑯。不仅如此,河西文化的意义,还在于其“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绵延一脉”^⑰,堪称隋唐各种典章制度的三大源头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给衰朽的世家大族机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使行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重新振作,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隋唐帝国的统治者同出于北周宇文氏“关陇集团”,虽然以“弘农杨氏”、“陇西李氏”相标榜,其实皆混染了鲜卑血统。杨隋取代北周伊始,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几年后又完成了南北统一,遂成为历史上最富裕的王朝之一^⑱。然而犹如秦朝一样,隋朝也是短命朝代,立国仅30多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李唐王朝建立在隋朝积累的大量财富基础之上,又以亡隋为鉴戒,君臣戮力,励精图治,不久便出现了贞观之治。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进一步发展,至开元、天宝之时,臻于极盛。唐玄宗对西北地区推行积极开拓政策,重视吏治,奖掖像牛仙客一类“清勤不倦”^⑲、善于治理的地方官员,“即以西北边陲之土著,致力于其地方足食足兵之策略,而大显成效”^⑳,最终出现了河陇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就是我们在本文开头引用司马光所说的话语。

综上所述,秦汉隋唐诸王朝,正处于封建社会由崛起进入发展的上升时期,其政治、经济中心在西北。河陇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各王朝对西北的开发经营;河陇地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关节点上都与中央王朝的前进步伐保持了高度一致,并且在不同时段都作出过突出成绩,而不仅仅是在唐朝。

三

河陇地区经济的繁盛,除上述诸王朝对西北大力开发经营外,还要特别指出一点,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起到过积极作用。

河陇地区地处中原王朝西北边陲纵深地带,向来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交通之孔道。早在秦汉以前,就有商贾、僧侣进出于河西,进行相关活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

⑩《后汉书·西羌传》。

⑪《后汉书·匈奴传》。

⑫《魏书·张寔传》。

⑬《晋书·张寔传》。

⑭《北史·文苑传》。

⑮《初学记》卷8;又见《三十国春秋辑本》注引段龟龙《凉记》。

⑯参拙作《五凉文化简论》,载《丝绸之路史地研究》第210-224页。

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页、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⑱《文献通考》卷23《国用考》载:“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⑲《旧唐书·牛仙客传》。

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9页。

②《史记·大宛列传》。

③《资治通鉴》卷19，武帝元狩元年。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

⑤ 参考拙作《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载《丝绸之路史地研究》第71-89页。

⑥《汉书·张骞传》。

⑦《资治通鉴》卷20，武帝元鼎二年。

⑧《史记·平准书》。

⑨《后汉书·西域传论》。

传》就记载周穆王从镐京出发，经凉州至蒲类海（巴里坤湖），驾八骏西游天下。虽属神话，但亦应有一定的根据，反映了秦汉以前中国与西方诸国进行交往的愿望与事实。

真正以国家行为出现的中西交通是在西汉武帝时代。在锐意经略河西的同时，武帝曾于建元三年（前138）派张骞出使西域，疏通与西域各国关系以共同防御匈奴。张骞历经重重艰难险阻，终于成就“凿空”大业，创通西域。在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见到其地种蒲陶，多善马，地肥饶，民安乐，善贾市。大夏国都蓝氏城“有市贩贾诸物。”^②张骞还在这里见到了产于蜀地的邛竹杖、蜀布等，又听闻其南面大国身毒及西面大国安息的物产、民风、交通等情况，大开眼界。归国后，据实奏报武帝。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海内，欣然以骞言为然。”^③

汉武帝从张骞的进言中受到启发，即决定派出王然于等从蜀地分四路使身毒。各路使者已出发一二千里，但终因路途艰危，其地盗寇多杀略汉使，故“莫能通身毒国。”^④直到唐贞观年间，一个名叫王玄策的使臣从长安出发，途经河湟地区、吐蕃泥婆罗道而抵达五天竺国，终于开创了中印之间的交通^⑤。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令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的情况与第一次出使多有不同。一是匈奴已被逐出河西，国家在河西设立郡县并修筑防御设施，匈奴不再对道途构成威胁；二是使团规模庞大，“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不仅有正使，还有副使多名，“道可便遣之旁国”^⑥。由此可知，此次通西域的主要任务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与西域各国建立关系，通商贸易。张骞帅团通使西域，所到之处，受到乌孙等国热情接待，与汉朝建立了友好联系。张骞又将副使派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身毒、安息、黎轩、奄蔡、条枝等国。西域各国也派人与汉使共同来到汉地。史书记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人所资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⑦反映中西之间的物资交往是何其频繁！而这一条以丝绸为标志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开展的物资贸易通道，一直为西方世界所瞩目，19世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一书第一次将张骞所创通的欧亚商贸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在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友好交往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各国之间赖以互通有无，开展贸易，极大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如一条横穿欧亚大陆的输血动脉，使周边国家和地区从中获得营养。河陇地区处于丝绸之路黄金地段，可谓“近水楼台”，因此也从中获益多多。

其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河陇地区的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前所述，汉武帝在解除匈奴对西北地区的威胁之后，就在河西设立郡县、迁徙人口，修筑塞墙，使河西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一空旷荒野变成经济较繁荣区域。实际上这也是他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的组成部分。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在人力、财力上有较大投入。如在元狩三年以后，朝廷从山东等地向西北移民多次，“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⑧。其效果，在两汉时表现为“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⑨

同样，大业五年（609），隋炀帝效仿汉武帝通西域，为疏通青海道（又称“吐谷浑

道”),解除吐谷浑对丝绸之路的干扰,曾亲临河陇指挥平定吐谷浑,同时在从伊吾到青海东西长四千里南北宽二千里的广袤地区共设五郡八县,“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③①}隋炀帝马不停蹄穿越大斗拔谷,来到焉支山下,召开了大约有三四十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贸易盛会,史载其时各国元首及使节“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闹。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填咽,周匝数十里”^{③②},场面红火,规模盛大。

朝廷为通西域在河陇地区大量投入招致西域各国商贾在河陇地区的频繁经商活动,所有这些,都是造成河陇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二,丝绸之路的开通,刺激了河陇城镇的商业贸易,形成了一批中等城市。据不完全统计,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到唐开元、天宝年间,河陇地区出现的城镇应不少于50个。其中以河西走廊变化最有说服力。武帝元狩年间,这里还是一片荒原,及至汉末,天下大乱,河西则是另一天地。出身官宦大族的窦融累世在河西为官,祖上曾为张掖太守,其从弟为武威太守,他又设法为自己谋取到张掖属国都尉一职。认为“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足以自保。由于他采取“习文修武,保境安民”的措施,使河西“上下相亲,晏然富殖”^{③③}。兹以武威为例,原为匈奴所居,号曰“姑臧”,武帝在此建郡,西方胡客多到此兴贩。史称“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③④}。斯坦因曾在长城烽燧遗址掘得8件粟特文信件,据研究信件写于永嘉六年八月,是发往撒马尔干的,其中有一信提到龟兹、敦煌、姑臧、金城、洛阳、邺城,讲他们从敦煌到洛阳等地经商的情况。据说这是一个粟特人的商团,他们长期住在中国,以武威为大本营,四处进行商贸活动^{③⑤}。唐代的武威更是空前繁华,唐初,玄奘法师到此,所见“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胡商听法师讲经,“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③⑥}。开元天宝年间,武威更加繁华,西域九姓胡之一的安氏在这里势力极大,武威城中共有小城七个,而安姓独占其五。岑参诗云“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十万家未免夸大,但据史书记载,13万多人口应是事实,比较西汉时期七万多人,几乎翻了一倍;也是唐初人口的十倍^{③⑦}。城镇的繁荣及人口增殖是经济发达的标志,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三,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使中外胡商贩客从中获利,而且惠及当地平民百姓。史书记载北魏一个名叫韩褒的官员,为官公正廉直,专为穷人谋利益。曾任都督、西凉州刺史。其地“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百姓,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③⑧}这可以说是古代官吏利用丝绸之路优势,帮助百姓致富脱贫,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个范例。

四

不言而喻,河陇地区在秦汉隋唐时期曾经有过辉煌历史。考其原因,主要是占尽天时、地理优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住了“机遇”。加之像张骞、霍去病、赵充国、窦融、孔奋、班超、甘英、徐邈、苏则、仓慈、张轨、李暠、李冲、源贺、韩褒、裴炬、刘权、王玄策、郭元振、哥舒翰、牛仙客、李汉通、黑齿常之等历朝一大批文臣武将,他们或(后转第40页)

③①《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五年。

③②《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五年。

③③《后汉书·窦融传》。

③④《后汉书·孔奋传》。

③⑤参考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第56-72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③⑦《汉书·地理志》载武威户:17,561,口:76,410。《元和郡县图志》载武威开元户:26,165。《唐志》载武威唐初户:8,231,口:33,030;天宝户:25,693,口:128,192。

③⑧《北史·韩褒传》。

【作者简介】

李并成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

李并成

河西走廊,位于祖国西北部、甘肃省西部,在自然地理上一般指祁连山脉与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 40 万平方公里(含黑河下游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这条走廊地处黄河上游的东亚与中亚的接合部,是我国中东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区的走廊过渡地带,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从世界历史上看,又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的汇流之区,在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具有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

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

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间最重要的通道,数千年来曾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而河西走廊由于其发源于祁连山脉三大内陆河系的滋润,沿程发育了连绵的片片绿洲,其自然和交通通行条件较之其北部的茫茫荒漠和南部的青藏高原无疑要优越得多,因而始终是这条国际交通大动脉的最重要的“黄金路段”。

除丝绸之路东西方向的主通道外,河西走廊还是连通南北方向青藏、蒙古两大高原的重要通道。沿黑河、石羊河河谷而下,向北可通往蒙古高原腹地;沿祁连山脉的一些隘口(如扁都口、当金山口等)向南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因而河西走廊可谓中国西部西出东进、南来北往的“十字路口”,从而也为多民族的交流交融、共生演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河西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我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走向世界,至少可以追溯到 2100 多年前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史称“凿空”。由于我国东面濒临浩瀚的大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远涉重洋,因而对外开放的主方向只能是选择向西开放,向欧亚大陆开放,即沿着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而位处丝路“黄金路段”上的河西走廊成为我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成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地处这条通道上的一些城镇也因之发展成了驰名遐迩的丝路重镇乃至国际都会。

例如,位居河西走廊西端、西域门户的敦煌,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迅速发展成为西出西域古道上无可替代的咽喉枢纽。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有些学者不解其意,认为敦煌是一个小地方,人口不多(汉唐时期敦煌绿洲人口不超过2万),又地处偏远,何以言大,何以言盛?早在唐代著名舆地学家李吉甫就解释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意思是说由于敦煌在开辟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所以才赋予了它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汉书·西域传》记,两汉时期出敦煌玉门关、阳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曹魏时增至三道。《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虚……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敦煌发展成了华夏民族与西方各民族交往的国际都会。隋唐时期通往西域道路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又如地处河西东部的武威,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其:“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葱右”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武威作为河西都会,就像一件衣服上的襟和带子一样,把西方各少数民族和葱岭以西各国连带起来,以至于胡商汉贾络绎不绝,并有不少西域和中亚商客长期留居这里。唐代诗人岑参写道:“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是说凉州大城之内有小城七座,城中居住的大量胡人受汉族文化的熏陶,已经能够一知半解地听懂琵琶的弹奏了。武威市博物馆藏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西夏碑》记:“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汇,日有千数。”

又如河西中部的张掖,地当横贯走廊东西的丝路干线与向北沿黑河河谷通往居延以至蒙古高原腹地和向南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道的交汇点,红尘走马,商贾络绎,物产丰饶,素有“金张掖”之美誉,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贸易重镇。例如隋代西域各地和西方一些国家都到张掖交市,以至“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还亲自带着庞大的车马仪仗,出长安,经湟水流域,翻阅祁连山脉的大斗拔谷(今民乐县南的扁都口),历经艰辛,到达张掖,前来会见这里的27国国王和使者,盛况空前。曾有一首诗称颂张掖:“三边锁钥河山壮,万国车书驿路通。”

河西由此深得丝绸之路之惠,发展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孔道、桥梁。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河西各地可得以长时期地吸纳、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如佛教和佛教艺术自两汉之际经河西传入我国内地,十六国时众多的西域佛僧来到河西,译经授徒,蔚成风气,凉州、敦煌等地成了我国佛经翻译的中心。蜚声中外的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等佛教石窟群像明珠般闪烁在丝路古道上,光艳夺目,令世人欣赏。又如,葡萄、苜蓿、石榴、红兰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瓜、胡豆、胡荽、橄榄、汗血马、珊瑚、琥珀、熏陆、苏合、郁金香、珠贝、琉璃等诸多来自西方的新的物产、特产品种,也都是通过河西而传入内地的。而来自中原精美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以及冶铁技术、水利灌溉和四大发明等,也大多是经由河西而西输的。它们的输出输入,大大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

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此处言敦煌和新疆,实际上

亦是包含整个河西地区在内的。敦煌乃至河西作为世界上几大古老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区,犹如一座历史的丰碑,标志着中国人民和西方各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交流历史,象征着古丝绸之路昔日的辉煌,在过去两千多年间曾为我们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传播建树了不朽的功绩,今天,又由于它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而瞩目于世界。

规模宏大的“民族走廊”

河西走廊东与黄土高原毗连,北与蒙古高原接壤,南与青藏高原邻境,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这种特殊的区位条件使其成为历史上生活在这些地域以致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各民族往来、迁徙、交流、融合非常频繁的地区,农耕民族和诸多游牧民族在本区的交流交融、共建共荣,不仅对河西历史发展有影响,而且在全国历史上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河西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以及东方来的党项族、满族等,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谷浑、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萨克族等,以及从这里西出的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远的暂且不论,自汉武帝开拓河西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少数民族在河西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角。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赋予河西历史文化多元互嵌共生的内涵和民族浑融的斑斓色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发展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这一概念,位处丝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国一条路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文化积淀最丰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公元1247年,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领袖萨班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武威市)就西藏的归属问题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会谈的成功使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的怀抱,成为祖国神圣领土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永远不可或缺的成员。河西走廊为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建树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

河西走廊不仅仅是国内许多民族交往共生的走廊,从更广阔的视域上来看,还是贯穿亚欧大陆的国内外不少民族友好交往交流的历史走廊和重要过渡地带。

早自西汉张骞“凿空”不久,粟特等中亚、西亚民族就大量涌入河西,及至唐五代时期达到高潮,粟特等民族胡文化亦随之传入,遂为河西当地的社会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营养,使这里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新气象。如当时敦煌辖有13乡,其中从化乡为粟特人的聚居之区,散居他乡的胡人亦不少,敦煌当地的民风习俗诸如赛袄、婚丧、服饰、饮食、乐舞、体育等等,无不受其浸染。又如隋唐时期的九部乐中,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都是经由河西传入中原而盛行于宫廷的。至于西域百戏、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并风靡于内地的。

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

河西历史上向为关中、中原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

地,或名之曰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河西可谓我国西部的“命门”所在,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作为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占领河西走廊,就可以割断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联系,并进而向西控制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因而河西历来就是中原王朝与一些民族政权相互争夺的重要战场,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明末清初顾祖禹云:“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从防守方面看,河西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西北边防要地。汉唐建都长安,为了解除从西、北方向而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经略河西是必不可少的选择。汉武帝开发河西就是为了断匈奴右臂、隔绝羌匈奴,消除西北边地的威胁。唐代前期“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同样也是为了抵御吐蕃、突厥、吐谷浑的骚扰,以确保关陇腹心地区的安全。当时军事中心已西移至天山南北路,但河西仍是防戍重地。从进取方面讲,有了河西就可以西控西域,北征漠北,大扬国威。反之当中原王朝衰落时河西往往易手,手臂被斫,中原腹地也就暴露在游牧民族政权的直接威胁之下。河西的得失与中原王朝的命运可谓息息相关。正由于如此,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开拓经营:修长城,列亭障,筑关塞,屯兵戍守,徙民实边,广置屯田,大兴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兄弟民族的茶马贸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创新高地

河西走廊对于我国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及贡献还不仅仅体现在“通道”上,河西走廊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衍生衍化和发展嬗变的加工场、孵化器和大舞台,是文化创新的高地。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路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内地后,大多首先要通过河西走廊进行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继续东传。同样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亦是经过河西发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智慧方面有着独具特色的优势。

佛教文化与西方歌舞艺术的传播就是如此。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欲在中华故土上传播发展,欲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适应中国原有的文化氛围,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运用中国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就首先需要进行一番“中国化”的改造与更新。史实表明,河西作为佛教进入我国内地的第一站,率先在敦煌、凉州形成了佛经翻译、传播中心,率先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之地。据《高僧传》卷一记载,被誉为“敦煌菩萨”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组织了译场,“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法经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功也。”竺法护被认为是当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是佛教东渐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开创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汉传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正是由于竺法护开创性的贡献,使敦煌实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发祥地。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其艺术形象源自印度,是佛教天国中的香神和音神,即专司香花和音乐的佛教专职神灵,莫高窟中的飞天多达 6000 余身。飞天形象传入敦煌后,不断地交融发展、艺术创新,完全摆脱了印度石雕飞天原有的样式,以全新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美不胜收,与印度的石雕飞天已非同日而语。

【作者简介】

张振兴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明肃王与左宗棠 对甘肃文化教育和工业文明的贡献

张振兴

明肃王内迁兰州，不仅扭转了兰州的命运，还为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明代以前，兰州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明代以后，社会渐趋安宁，经济日趋繁荣，定居人口逐年增加，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政府强制移民，填补了人口的不足，使得文化也在这种大融合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尤其是肃王带来的这批人，文化素质比较高，毫无疑问对兰州社会文化习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肃王来兰州以前，由于多年战乱，城市凋敝，兰州被降为兰县，远不如甘州、临洮的位置重要。肃王迁兰后，设藩建府，使兰州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加之大规模营建官邸宫观，使兰州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肃王在兰州经历9代，时达200余年，历代肃王都倡导文化，兴修园林寺观，督办学府发展教育，大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兴盛，使兰州特有的民情风俗开始形成并传承至今。

由于官方文献对历代肃王记载非常简单，肃王们的事迹仅散见于清初的地方志和现存的一些碑刻。从现有资料看，历代肃王在建筑学宫、寺庙、水利设施等公益事业方面有较多的贡献。纂于清乾隆年间的《皋兰县志》记载，肃王所建寺院有普照寺、崇庆寺、华林寺、萃灵寺、白衣寺。肃庄王驻兰州不久，便命人修编《金城志》，开了兰州方志先河。兰州仅有的一所学校——州儒学始建于元至正年间，到明代房屋破损，垣墙坍塌多处，万历二十九年（1601），兵备副使荆州俊募资重修，肃宪王绅尧即捐资相助，此事载于荆州俊撰写的《重修学宫记》中。这位宪王派人到南京印刷佛教巨著《永乐南藏》，还筹资请著名工匠摹刻宋拓本《淳化密阁法贴》，经历父子两代，历时七年完工，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来自江南等地的学者、工匠们的带动下，西北边区各项事业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肃王重视文化，喜好文墨，上行下效，一时流风所及，因而为兰州培养出了大批学者。其中有博学多才，操守严正的黄谏，为官廉能、“以儒术蚀吏治”的理学家段坚（其祖

先就是从山西随肃王而来的),文武全才、著作等身的彭泽,不畏身家性命、弹劾权奸严嵩父子的邹应龙,才会横溢的段续等。在这些学者们的带动下,兰州地方文化与教育日渐兴盛。

左宗棠对历代肃王作了如此评价:肃藩在明室多贤胄,留心文献,嗜词翰,礼士,为世所称。

同样,左宗棠也为兰州的文化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主政西北期间,要求各地恢复书院,兴办义学,由官府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免费发放书纸笔墨,甚至生活费。1875年,在左宗棠的力主下,甘肃实现了多年来与陕西分闱科考的愿望,建起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贡院,免除了甘肃学子千里迢迢赴陕西赶考的辛苦,这是他为甘肃教育事业所做的一大贡献。甘肃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的有3000多人,比以往多出三倍。1875年至1905年科举废止前的30年中,甘肃共选取举人681人,考中进士116人,超过分闱前两百年的总和,涌现出安维峻、刘尔炘和范振绪等杰出人才。

左宗棠身为读书人,对教书育人格外偏爱,除了建贡院,兴科考,他对普通教育也很重视。在他的督导下,兰州办了16处义学,划拨兰州北山775亩荒地,收租供给义学经费。

千载之中,兰州多出勇士,或刚直不阿,或烈性忠勇,或豪气干云,那是因为这里本为杀戮之地,战争锤炼血性男儿,苦难磨练不屈精神。明清之后,厚积薄发,文化泱泱,这片历史丰沃的土地又孕育出众多文人学士。与江南才子不同的是,在他们身上,还兼具着边塞勇士的气质。

兰州盐场堡人刘尔炘,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教育家,还是一位实业家、慈善家和建设者。他兴办实业,推举慈善,赈灾救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兰州民生状况;他著书立说,创办学堂,建图书馆,造福桑梓,为甘肃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倾注了大半生心血。

刘尔炘对兰州的文化古迹遗存保护也同样功德昭著。在他的主持下,修葺扩建了五泉山庙宇。五泉山历史悠久,传说霍去病西征时曾驻兵于此,酣战归来,士卒疲渴,骠骑将军手持马鞭,连击三下,鞭响泉涌,遂成五泉。得益于泉水浇灌,这里草木葱郁,清华灵秀,堪为奇迹。于是建庙修殿,成为清静胜地。只可惜毕竟边塞关城,难免遭战火侵袭破坏,或于朝政更迭时荒于治理。清光绪年间,五泉山上原建于元明清的崇庆寺、文昌宫、卧佛殿、大悲殿、武侯祠、千佛阁、地藏寺等建筑,因年久失修,殿宇颓败,楼阁坍塌,残存者仅十余处。看到这些名胜古迹惨遭毁坏,生长于斯的刘尔炘深为痛惜,于是向地方官绅和各界人士发起募捐,筹得白银4.8万余两,对五泉山进行整修。从1919年夏开工,到1924年竣工,历时五年半,不仅重修了原有建筑,还新建了太吴宫、三子祠、万源阁、层碧山庄等殿堂十余处。在修整同时,又广植树木,栽花育草,使五泉山的风景更加秀丽。

而今我们所看到的五泉山公园,殿宇楼阁重叠,廊坊桥榭交错,苍柏老槐参天,碧波泉水相映,在一片黄土苍山中如绿宝石一般灼灼生辉,这都要归功于这位晚清才子。尤其是他留下的白话楹联,浅显明快,寓意深刻,睿智谐趣,为五泉山的美景增色点睛不少。之后,刘尔炘还一鼓作气整修了小西湖园林和盐场堡河堤工程,并举办儒医精舍,开设医学讲习所和同仁施医馆,致力于济世救人和培养中医药人才事业。

为纪念刘尔炘对兰州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人们在五泉山公园树立了他的雕像,并

将层碧山庄改名为“果斋祠”。

兰州才子多刚正清廉,以己身倡正义,他们在修身立命、福泽地方的同时,亦不忘回报家乡。兰州段家台人段坚,后世称“理学名臣”,明景泰五年进士,曾任山东福山县知县、莱州知府、河南南阳知府,一生勤政爱民,洁身自好。在南阳为官九载,深得敬爱,离任时士民号泣挽留,在他死后建祠塑像。段坚退休后回兰州,在段家台建书院,著述讲学,桃李盈门,培养了很多名士,诸如彭泽等都出于他门下。

段坚后人段续,为官正直,不畏强权。常年在外做官,晚年回家乡后,深感兰州农民屡遭干旱之苦,便自备材料,聘请工匠,研制水车,坚持不懈,终于成功。黄河水车的功效显著,沿用数百年,极大地推动了黄河两岸的农业生产。建于新时期的兰州水车博览园就为纪念段续,感谢他创制水车,造福桑梓,为家乡做出的卓越贡献。

金城历史悠久,但史料记载却很有限。因为常年陷入纷争战乱,使得很多东西都难以继存。大概是因为荒芜,所以这里对文化的渴求就像是海绵对水的汲取。这座城市就像一个熔炉,将多种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地域色彩浓厚的独特文化。

对于兰州人来说,缺的并不是文化,而是弘扬与传承。

说起兰州的工业文明,就必须说起这么一个人物,他就是晚清赫赫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后人评价,兰州自西汉设金城郡之后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兰州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左宗棠。

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坐镇兰州,经营西北,收复新疆。兰州虽然早在康熙年间陕甘分省就成为省会,乾隆时为陕甘总督府的治所,是陕甘宁青的政治军事中心,但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不发达,仍然是个闭塞的边陲小城。左宗棠的到来,为兰州带来一股新风,使兰州沉重缓慢的历史进程突然加快了脚步。左宗棠把兰州带到了世界近代发展的门槛前。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亦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和实际推动者。当时,中国最早搞机器和轮船制造近代工业的只有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四个沿海临江城市,再加上一个兰州。左宗棠主持建起的兰州制造局和甘肃制呢总局,使一个当时闭塞落后的边城,竟然率先在全国拥有了机器制造业和毛纺业,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然而,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在兰州做的意义深远的事,远不止这些。他在担任陕甘总督的14年间,对吏治、军制、税收进行了坚决的改革,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贸易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对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格外的关爱,对社会环境民生工程改造付诸了大量心血,为兰州的历史和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兰州的五泉山公园和南滨河路上,至今仍有许多虬枝横斜的苍老柳树,它们被兰州人亲切地称为“左公柳”。不仅兰州,从甘肃陇东到河西,随处都可见“左公柳”、“左公杨”傲岸的身影。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清代诗人肖雄专为咏颂“左公柳”作诗一首: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这是左宗棠为甘肃做出贡献的最直观体现。

清同治四年(1865),西亚浩罕汗国阿古柏率军侵入我国新疆南部,同治六年(1867),在南疆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此后,沙俄于同治十年(1871)乘机派兵占领伊犁地区。当时,东南沿海防务十分紧张,朝中有人主张放弃新疆,全力加强海防。左宗棠则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认为东南海防不可忽视,但收复新疆更是当务之急。这种意见,得到同治皇帝的赞许。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率军镇压西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当时陕、甘两军的军火均依靠左宗棠部,左宗棠部的军火等项,也“皆由上海洋行采办而来,价值即甚昂贵。其他军装所用……从前均由鄂省制造,转运西安”。由于价值昂贵和运输不便,使左宗棠一到西安,就下决心筹建一个小型军工厂,西安机器局也就应运而生。为了使西安机器局能迅速投入生产,左宗棠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调募了一批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又花了30余万两银子购买机器,用以制造洋枪、铜帽和开花子弹等军火。

随着战事进展,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行营进驻兰州,筹划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新疆,实现其“东则海防,西则塞防”的主张。因战争的重心移到甘肃,左宗棠就把西安机器局的设备全部拆迁,移到了兰州,设在兰州畅家巷,即今兰州体育馆西南一带,改名为兰州机器制造局。当时,建厂经费十分困难,左宗棠便委托上海候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白银,购置了德制六英尺车床和手摇钻等机器。为增强兰州制造局的技术力量,左宗棠一方面从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抽调来一批技术工人,一方面委派一名追随他多年的、颇懂机器的记名提督赖镇主持工厂事务,着手筹建,当年就建成投产。兰州制造局主要生产武器弹药。赖镇是兵器制造专家,他领导百余名广东、浙江的工匠,还有外国的工匠,日夜不停地生产。产品有仿德国后膛螺丝大炮、仿意大利重炮、仿德国后膛七响枪。并且改进国内的劈山炮和广东制造的无壳抬枪。原来的劈山炮很笨重,要13个人施放,改进后只需要5个人就够了;抬枪原来是3个人放两支,改造后,成为一个人放一支。制造局还大量生产铜引、铜帽和大小开花子弹等。装子弹、炮弹的火药原来由国外进口,运费昂贵。光绪元年(1875),又成立了兰州火药局,生产出质量上乘的火药。

光绪元年五月初,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开始全权实施收复新疆的主张。当时,兰州制造局生产的优质枪炮弹药,其制造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准,这些枪炮弹药源源不断地供应进军新疆的部队,在扫平阿古柏政权,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37年中,第一次使用国产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

左宗棠在调离陕甘后,与护督杨石泉说:“大炮开花子均系赖镇一手经理,攻克肃



【图解】

左宗棠像

州,即得其助。用开花子至一千四百余枚。若非当时设局自制,必致匮乏,不能应手。见在新疆各城,次第速复,唯西四城所得贼遗大小炮位一百数十尊,余则空城一座。正须增添布置,伊犁收回旧炮既不合用,俄人枪炮岂肯留以赠我,将来亦费周章。弟见饬赖镇查明存炮若干,尚须添置若干尊,每尊约须炮子五六百颗,方勉敷急用,是此项制造不能停工也。尚希面谕该镇,仍前赶造火炮,储存待拨,开花子照炮预备为要。”

光绪八年(1882),随着左宗棠在河西、新疆等地军事行动的结束,兰州制造局暂时停工,期间利用停工的甘肃织呢局位于畅家巷的厂房恢复生产,改称洋炮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因加强新军的需要,兰州制造局重新开业,遂由畅家巷迁到武都路南的小仓子街(今官升巷),并改名为兰州机器局。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盘踞在甘肃的封建军阀,为扩充实力,制造军械,民国五年(1916)又将该局迁到城西萃英门内甘肃贡院,并改名甘肃机器局,大规模生产枪弹、炸弹、炸药等,兼搞军械修配。民国14年(1925),国民军进驻甘肃后,甘肃机器局进入全盛时期,有职工上千人。能够仿造捷克式、汉阳造等枪支,也能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1926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在门楼上题额“甘肃机器局”。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甘肃机器局被国民党中央资源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府接管,改名为甘肃机器厂,成为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企业之一。这时除修配枪械外,开始仿制一些比较简单的皮带车床。民国31年(1942),为了防止日寇飞机的轰炸,该厂又迁到西郊土门墩。解放前夕,该厂的全部机器设备,被军阀马步芳洗劫一空,运往青海,只留下几十间破烂不堪的工房和97名饱受饥寒的工人。

解放后,兰州制造局结束了77年来多难的命运,开始了新的里程。经过30年的艰苦创业,兰州通用机器厂——当年的兰州制造局已成为拥有5000名职工、能为我国石油工业提供成套抽油、固井、修井、压裂设备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

左宗棠对西北工业的开发,是在因战争需要而开办的军火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他并没有把军火工业仅仅局限在生产武器上面,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他在新疆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深深感到,要巩固西北边防,就必须大力发展西北地方经济。于是便利用西北得天独厚的羊毛资源,筹建了甘肃织呢总局。

1877年(光绪三年)冬,总兵赖长以自行设计制造的水轮机织成一段呢片,进呈左宗棠并建议购机设厂自造。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奏请政府批准,在兰州建立织呢局,局址定在通远门外前路后营旧址,即今畅家巷南侧。

当时办厂的条件非常困难,甘肃善后局拨款20万两,左宗棠委托胡雪岩在上海向德国商人购买机器设备1200多件,花了一年时间运到兰州。并从德国聘请匠师,从陕甘丁勇中选拔工厂学徒,为甘肃培养了第一批产业工人。在左宗棠看来,利用西北的特产羊毛,开发毛纺织工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他说:“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匠师之选……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

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二日(9月16日)织呢局开工。有纱锭1080枚,毛织机20台,染整机全套,24匹和32匹马力蒸汽机各一座,具有清毛、烘毛、漂染等机器。厂房230余间,占地20余亩。全厂分为三部分:东部为纺线、织呢部分,西部为洗毛及整染部分,中部为动力、机修和办公部分。雇用德国工匠13名。工厂颇具规模。

甘肃织呢总局的建成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毛纺厂，也是整个亚洲的两个织呢厂之一，比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我国第一家棉纺厂还要早几年，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作工厂，在近代中国乃至亚洲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织呢局每天生产 10 至 14 匹兰呢。左宗棠见织出的羊毛绒质薄而细，美观耐穿，并不比洋人的差，非常高兴。当年冬天他把甘肃织呢总局生产的毛纺织品带到北京，引起各方人士的兴趣和称赞，同时也引起了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关注。英国派人到甘肃织呢总局考察，并把考察报告刊登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

光绪九年(1883)八月，织呢局因锅炉爆炸停工。不久，继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利用织呢局中部厂房恢复了 1882 年停办的甘肃制造局，当时称洋炮局。1903 年织呢局址东部划出设立了“甘肃文高等学堂”(兰州一中前身)，1906 年西部又划出设立了“陆军小学堂”(此处后为甘肃省立师范，今分划兰州一中和三十五中)。1907 年，兰州机器局(即甘肃制造局)搬往小仓子街。至此，织呢局原址尚剩中部厂区。光绪三十四年(1908)，织呢局又在清末的“新政”声中修建恢复，聘用比利时人为工程师，改称兰州织呢厂。由于销售不畅，经营困难，遂于宣统二年(1910)招商。此后时办时辍，抗日战争时才走上了持续生产和有所发展的阶段，厂名为“军政部第二织呢厂”。兰州解放后，由解放军后勤总部接收，改为兰州第二毛纺厂。1951 年停办。

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局的创办，使近代工业在一向闭塞落后的兰州地区闪现出一缕光华，打破了兰州封建经济的沉寂局面，使古老的兰州开始迈入了近代工业的殿堂，对兰州乃至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文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人说，一个人激活一座城市。用这句话评价左宗棠对兰州城市建设的贡献一点都不过分。

咸丰同治十余年间，兰州城屡遭战火，疮痍遍地。左宗棠进城的时候，许多处城墙倒塌，杂草丛生，道路泥泞。

光绪二年，左宗棠将原有的兰州外城进行彻底大修，城根深一丈多，城墙底宽一丈数尺，城高三丈七尺，顶宽八尺多。又掘城壕，深宽各有二三丈。还兴建了城外的四墩堡，就是四个方形的碉堡，基址边长一丈多，高约二丈，排列在城西的龙尾山上，就是现在的伏龙坪。据说，兰州新修建的西城门楼格外壮观，为的是足以显示西北重镇的雄姿，让自西而来的人们，举目一望就为这座古城而倾倒。可惜，兰州的西城门早被拆除了，我们再也无缘亲眼目睹这座古城的昔日风华。

左宗棠 1881 年调离兰州，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其间当过几个月的军机大臣。1884 年 6 月再次奉命进京。入阁不久，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水师全军覆灭，11 月奉命督办福建军务，不幸于次年病故福州。兰州民众一片哀惜。当时报纸记载：“左公病逝噩耗传之陇上之时，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

左宗棠在陇上民众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受到非常高的尊崇，从清末到民国兰州街道的命名，可以看出这种崇敬的延续。西关大街，即临夏路，被命名为“宗棠路”，西稍城门为“宗棠门”。抗战时期，新开辟的城南国际运输通道，即现在的白银路，命名为“左公西路”，民主西路及原有的旧大路为“左公东路”。根据朝廷的礼法和 (后转第 36 页)

【作者简介】

刘启舒
甘肃省作协会员

清末民初碧口至重庆 水路运输漫话

刘启舒

碧口古镇,为甘肃省“四大重镇”之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处。在历史长河中,碧口古镇曾奏响过众多的华彩乐章,传颂着浩瀚的动人故事。然而,作为一个千年古镇,它最值得称道和回眸的,当数碧口至重庆的商船水上运输。白龙江上的每一朵浪花都深情地回望当年江上的悠悠岁月,娓娓讲述古镇“小上海”繁荣辉煌的往事。

三省通衢的“黄金水路”

碧口至重庆的航运线,由白龙江段和嘉陵江段组成,整个航线全长约 800 多公里,其中,白龙江航段全长约 130 多公里。据碧口镇 102 岁的老人张锡田先生讲述,这条航运的开通于清乾隆年间,持续通航了 100 多年,历经清朝、中华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碧口航运的开通,为碧口古镇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和空前的繁荣景象,使一个原本人口稀疏、名不见经传的山野之地迅速崛起,成为闻名华夏的“小上海”、我国西北和西南的货物集散地、名扬四海的“水陆码头”。

碧口至重庆的千里航道,遂成为沟通甘、青、宁、蒙、新诸省区与巴蜀乃至全国联系的“水上通道”,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路”。西北诸省的农副土特产品,尤其是甘肃的当归、黄芪、党参、大黄等“四大名药”和木通、木香、羌活、独活、猪苓等杂药,以及花椒、大麻、棉花等山货,源源不断地运抵碧口,再装船南下,历尽千里航运抵重庆,再达武汉,赴上海,远涉重洋,行销海内外。我国西南及江浙的丝绸、布匹、茶叶、烟酒、食品、食糖、陶瓷器、铁制品、工艺品、日用百货等,以及重庆瓷器口的土碗、蓬安的火纸、阆中的保宁醋、南部的井盐等日用百货,再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至碧口,然后再由骡帮马队和脚夫转销至西北各地。

碧口至重庆“黄金水路”的开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千百年来,我国西北地区甘、青、宁、蒙、新盛产的药材、皮毛等山货,曾长期靠用人力背负,或

骡帮马队驮运,沿山间小道踽踽行进,经碧口运往西南各地。而江浙的丝绸、布匹、日用百货等,也需人背肩挑和骡队马帮运抵碧口,再转运西北诸省。“山间铃响马帮来”的运输方式曾年复一年,因道路艰险、路途遥远,运输十分困难,不仅严重制约了物流,而且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早在唐时,白龙江以下的嘉陵江航道,便是四川、中原、西北间联系的重要交通命脉。西北和中原的小麦,经由洛阳、西安或秦州、徽县,沿白龙江、嘉陵江航道顺流而下,运往西南。四川的稻米,经由南充、阆中集积,逆流而上,在昭化、广元上岸,再经陆路送往中原或西北。该航道畅行无阻,历代均有疏浚。

碧口古镇地理位置特殊,加之“运之不竭”的货源,这一切使精明的先辈们洞察到开辟碧口至重庆航运的巨大潜力和优势。于是,清乾隆初年,就有人开始在碧口一带修建码头,就地伐木建造船只,同时将他们已有的运输商船陆续开往碧口,开创了碧口航运的先河。

起初,从四川来的商船停泊在距碧口镇下方 25 公里的四川青川县姚渡镇,后来溯江上移停泊在距碧口镇下方约 15 公里的中庙镇境内一个名叫“行店”的地方,遂成为当时碧口地区最早的码头;后来,码头逐渐溯江上移,移至距碧口六七公里的肖家坝旋滩;后来码头又移至石龙沟口处,人们便把那个地方称为“码头”;再后来,商船继续破浪而行,闯破禁区“鸡冠石”、“母猪石”、“磨石滩”、“复兴滩”等一个个暗礁险滩,最终停泊在碧口古镇的白龙江畔。至此,碧口逐渐成为繁华兴旺的水陆码头,西北西南货物的集散地。在高亢激越的川江号子声中,碧口航运拉开了古镇兴旺辉煌的序幕。

清末民初,是碧口航运的鼎盛时期。碧口当地历来就有“运不完的阶州(今武都区),填不满的碧口”之说。据碧口“最后的船工”朱继江回忆,航运旺季时,白龙江畔每天都停泊七八十艘甚至上百艘商船;下水船和上水船,来往穿梭,江面上呈现出纤夫奋力、号子震天的景象。

据史料记载,碧口每年运出运进货物总量七八万担,最高年份近 10 万担。碧口一度成为三省通衢、风云际会的地方,曾创下年税收 10 万两白银的纪录,占全省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左右。

实力雄厚的船帮

随着碧口至重庆航运的开通,碧口船帮逐渐形成了碧口“九大商帮”(其他八帮为:药材卖帮、药材买帮、百货帮、水烟帮、驮骡帮、旅店帮、绸缎帮、食品帮)中实力最为雄厚、阵营最为庞大的商帮。碧口船帮主要由在白龙江上航行船只的业主、船工组成,大部分为四川合江、宜宾、成都和重庆等地的业主、船工。

船帮对于整个江上航行的船只有绝对的管理权,对于整个水上运输起到垄断作用。对于没有入帮的船只称“野船”,野船不能航行更不得运输贩运来往货物、客商等,违规者将受到严厉惩罚。碧口船帮实力雄厚,他们来往于江上,运输贩运大宗药材、山货和从事客运,积累了大量财富,在碧口镇中街利用船帮“会费”修造了最为豪华的同业会馆——紫云宫,俗称“王爷庙”。此宫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竣工于嘉庆十八年(1813),历时 33 年,修建总领共历任三任。其整体建筑为宫殿式古建筑群体,坐西向东,一进三大院,5 大楼,36 幢宫院屋舍,雄伟壮观,精美豪华,工艺精湛,誉满四方,为陕甘川周边地区绝无仅有。

船帮对内对外都有相当严格的帮规帮约。如咸丰七年(1857),碧口船帮制定了船业帮规,即《碧峪镇复兴场闾帮议定装载水运章程》。船帮的帮规略见一斑,章程云:

皇清定鼎 200 余年以来,官有律条,民有团禁,国土皆然,诤我客船两帮,住文县碧峪镇,并及造紫云宫落成有年,板主客商,装药运载,竟无规条管集,众谘议章程,一一刻石,以塑悠久,展药材两帮客商板主,乃有条不紊,众曰唯唯,是如以程。今将违规罚条列左。

——议板主不得进山写载,查出将船只充公,客亦不得在山许载,查出罚酒四席,神戏一台。

——议众店客,勿论在渝文,有信将载许。不准徇情、瞒藏,查出罚银 2 两充本庙公用。

——议各店价行江水脚银两,照市水分一百文,板主私与店主通情,再少合监规,希图贪载,查出不准开船,凭众议罚 6000 文充入本街城隍庙公用。

——议装运西南船帮药材船只,诚恐沿途遇事,或板主亲身送渝或家掌代送,路上不得代卖客货,查出真庄实情,本帮人等将伊逐出,永不许入帮。

——议板主装运货物,原系两家有益,倘河道失事或打湿药材,雇人起捞炕干另装,炭火工价等费客号认出。所有杂工伙食等用板主认。客主不得争论,仍将原货收拾送渝,客若不得将所欠水脚银所给,即转向碧口本店各号收讨,客家若再不给,平众理叙。

——议板主船只失事,无非论险滩、逆水、飞梢等情,勿论家掌弟兄溺水捞出,板主给赏命钱四千文,以作超度亲,若不依规条,如领上告所有诉讼费用,众帮将小厘金给出以消官案等项。

船老板、货老板、驾长和船夫

碧口至重庆航运的船帮,有他们自己的“行话”。譬如,船帮们把船主称“船老板”或“板主”;把货主称“货老板”或“号客”、“庄客”、“下货客”。

碧口的货老板,均为在当地经商的商家,大多为药材行栈的药材商,都有自己的庄号,如“怡丰药材商号”、“祥源药材行”、“荣生药材号”、“忠信永药材号”、“元盛丰药材号”等;重庆的货老板,主要有百货商、丝绸商、副食商、铁器商等。

碧口下水船的货源,全都来自碧口街上的药商,属于药材帮中的买帮,他们常年在碧口扎庄,靠下行水运搞生意。他们将陇南各县、四川南坪等地药材卖帮的药材就地买进,然后再装船运至重庆。药材买帮中,“渝帮”即“重庆帮”居第一,有七八十人常住碧口,有一个人经营几个字号的,约有 100 多个字号。“川帮”即“四川帮”,又分“省赵帮”(成都金堂赵镇)、中坝帮(江油、绵阳)、中路帮(广元、南部、阆中、南充、武胜、岳池、合川),这三方面的人数亦有七八十人,常住碧口,经营 100 多个字号。除“渝帮”、“川帮”外,另外还有陕西、江西、河南、上海、广州等地药商,但住碧口人数不多。

如果船老板和货老板熟了,便可直接和对方联系,要货装船。如船老板和货老板不太熟悉,就要通过中介人,即所谓“烟锅子老板”,让其帮忙联系货源。烟锅子老板给货老板联系到货源后,便介绍给他装船运输,并向对方提成“中介费”。当船老板联系上货老板后,有的货老板并不当即答应船老板装货,还要顺便打听一下他请的是哪个驾长,如果认为请的驾长技术不好,就重新找船老板。

装船工人,称“搬运工”,在药店务工,专为药商服务。碧口装船的搬运工,不完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少搬运工已四五十岁。当年碧口街有个俗称“范老头”的搬运工,虽已年过50岁,还可背200斤重的药包,“嘿哧嘿哧”上上下下装船,靠此收入养家糊口。

船老板有的只有一艘船,有的则有两三艘,甚至三四艘。有的自己也会驾船,既当船老板,又当驾长。不会驾船的船老板,则聘请驾长驾船。一般情况下,船老板把货主的货装船后才去雇驾长、船夫,也有一边装船一边雇驾长、船夫的。有时船俏了,即船少货多,则货找船;有时货俏了,船多货少,则船找货。

驾船的人,称“驾长”或“家掌”,是一船之主,众船工皆听驾长指挥和管理。一艘木船在江里航行,通常有正、副两位驾长,其中船尾掌舵的称“正驾长”,船头搬艄的称“副驾长”,是为“前艄后舵”。驾长、副驾长和船老板的关系为雇佣关系,但这种雇佣关系很不固定,驾长今天给这个船老板开船,明天可给另一个船老板开船。会驾船的船老板一般自己当正驾长,再雇一个副驾长。

拉船的船工,称“纤夫”或“船夫”,碧口人俗称“船拐子”,多少带有调侃的成份。船夫自己则从不这样称呼自己。碧口至重庆航线的船夫,大多来自嘉陵江沿岸的农民或城镇无业青年,碧口农村和街道居民中也有当船夫的。船夫吃的是“力气饭”、“青春饭”,大多为二三十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最小的也有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船夫一般到了四五十岁便力衰气短,“不得行了”。船夫一般上身穿一件背心,下身穿短裤,脚穿一双梭草鞋或赤脚,肩膀上搭着衬肩,称“搭袷”,夏日常常光脊梁,有时甚至是赤身裸体。

船工们也有朋友,互称“连手”。有同船的,也有在各自船上的。有时,船夫会托先行船的连手到目的地后,为自己帮忙联系一个拉船的活路。船夫和船老板,并非固定的雇佣关系。船夫如同给船老板打工一样,不断变换打工对象,给不同的船老板拉船。俗话说:文官拜相武封侯。拉船的,若当上驾长便到顶了。

有的驾长、船夫开船、拉船积攒了些钱,便在重庆装货时用自己的钱买些货,让船捎带上,运上来也可赚钱。如此反复赚钱,等积攒到一定数量后,便自己买船,从驾长、船夫一夜之间堂而皇之地荣升为船老板。但这样的驾长为数不多,能买船的船夫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船夫只能一辈子和纤藤打交道。

因出大力、流大汗,所以船夫饭量格外大,伙食也与众不同,船上做饭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船夫把做饭的人称“大师傅”。各船的大师傅,有的固定,有的不固定。船夫中凡有会做饭的,都可轮流上船当大师傅。

每艘船上,还有一个负责看仓的人,如同保管员一样,一般是大师傅兼任。其责任重大:货物装船时,负责点货;船行途中负责看货,还要随时用“漏斗”刮出渗进船舱的江水,即使夜里也不间断刮水;船到目的地后,还要负责清点交货。

船夫们把拉船的绳索,称“纤藤”、“纤绳”、“纤索”,皆用竹篾编结而成。不同的江,不同的水流采用不同的纤藤拉船。白龙江与嘉陵江相比,白龙江水量小,嘉陵江水量大。鉴于此,船夫们习惯称白龙江为“小河”、“白河”,而把嘉陵江称“大河”。白龙江流速较急,船夫们称“二流水”。下行船在白水江航行,全靠水流冲击,正副驾长只需用舵和艄拨正航行即可。下水船行驶入嘉陵江,因水流相对平稳,则需要靠橹子奋力划,船才能全速前行。一艘船一般有四五对橹子,每对橹子两个船工,节奏一致,奋力划动。

每艘船的船工数量,依照船的大小不等,下水船和上水船的船工数量也不相同。下水船,一般每艘船有七八个船工,大船 10 多个船工,所有的船员都在船上,一个船员平均要“分摊”一吨多货,这样船老板才有较丰厚的利润,若不足一吨,利润就大大缩水。

上水大船一般有 20 来个船工,小一点的只有十几个船工。上水船,一个船夫平均要拉“8 分货”,即 800 公斤,20 个船工可拉 16 吨货。最小的船,也需七八个船夫拉,只装几吨货。

货物装上船,起航前,货老板需预付给船老板一定的运输费,船帮行话称“水脚”,一般预付费为整个运输费的 50%或 80%。剩余的运输费,待货物运达目的地后再全部付清。起航前,船老板将货老板预付的运输费,按比例分发给每个船工作为拉船报酬,剩余部分待货物运到目的地后,再向船工一一付清。

一船货物从碧口运至重庆,一个船夫可得“水脚”(运费)12 个银元,正驾长和副驾长的酬金,分别是船夫的三倍和两倍。

无论是从碧口起航的下水船,还是在重庆起航的上水船,开船时间均在早晨,目的在于多航行一些里程。碧口古镇的白龙江畔,除造船的工匠外,还有不少修船工匠,其人数远远超过了造船的人,当地人把这种工匠称“水木匠”。木船小修小补是家常便饭,随时都有;每隔一两年,则要大修大补一次,称“满滚灯”。

行船的忌讳和耍码头

船工长年生活在船上,天时、水情的变化难以掌握,大江里行船稍有不慎,随时都会有丧失性命的危险。所以,碧口船帮行业有许多讲究和忌讳,今天看来有的甚至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这些“清规戒律”,在当时,业内人士必须人人遵守,不得违犯。说法是,如果犯讳,便会带来灾难,甚至是遭遇船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一是货物装船须看期。船老板与货老板商定好装货后,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装货,而是先“下货”,即先往船上装两件货,表示船老板与货老板双方已达成了运货协议。然后要看期,请神汉(端公)或相关人士看上一个黄道吉日,到了那一天,才能正式往船上装货。

二是开船前敬奉老爷,祈祷保佑。待货物全部装上船后,开船前的当天清晨,船老板、驾长和纤夫,以及货老板,都要来到紫云宫(王爷庙)敬老爷,毕恭毕敬地敬奉镇江王爷、财神爷和药王爷。三个老爷挨个地敬,但主要敬镇江王爷。每个老爷面前,都要虔诚地磕头作揖,烧香、燃烛、化纸。一般烧三炷香、一对蜡,焚金裱纸钱,一般至少烧三刀纸。敬老爷的目的,在于祈祷神灵保佑本次航运一路顺水顺风,大吉大利,财源滚滚。

三是开船前祭拜水神。此举在船帮行话中,被称为“封头”,由船老板亲自主持。开船前,船老板亲自执刀,或指派船夫代劳,将一只大红公鸡宰杀后,把鸡血滴在江中和船头之上,并拔下三撮鸡毛,蘸上鸡血,分别粘在船头的正中和两侧。杀鸡祭典,表示祭神灵,祈求保佑平安。然后,水手们齐声高喊“起蒿——顺风顺水——”。

四是忌说犯讳的字词。犯讳字主要有“翻”、“打”、“沉”、“扣”、“破”、“烂”、“死”、“倒”、“漏”、“捅”、“撞”、“扯”、“眼”、“礁”等相关的字。

譬如,船工中有人明明姓陈,因“陈”和“沉”谐音,便不能喊他“陈”,只能怪怪地喊他“耳东”,或改姓“漂”。“橙子”不能叫橙子,只能叫“柑子”。凡是和“沉”的同音字陈、城、成、层、呈、晨、尘、臣、曾、蹭等,上了船后都不能说。

同样“翻”、“打”、“扣”、“破”、“烂”、“死”、“倒”、“漏”、“捅”、“撞”、“扯”、“眼”、“礁”等

忌讳的谐音字,也都不能说。

倘若说话时,遇到这些字时,则要用其它字来代替,即换一种说法。譬如,“把被子翻过来”,不能这样说,而要说成“把被子调过来”。

譬如船到岸,不能说船到岸,要说船拢岸,因“到”和“倒”是谐音。

“打水”(忌打),要说成“扯水”。

“翻了”(忌翻),要说“张面”。

“帆布”(忌翻,“帆”和“翻”谐音),要说“抹布”。

“倒了”(忌倒),要说“倾了”。

“搁着”(忌倒),要说“放起”。

“烂了”(忌烂),要说“皮了”。

“著面条”(忌煮),要说“放面条”。

“洗脸”(忌水洗),要说“抹面子”。

“洗碗”(忌水洗),要说“抹碗”。

倘若不小心,说了这些犯讳的字,便被认为不吉利,会带来灾难。

开船当天,敬老爷吃肉,不能说“五花肉”,以避讳船被打得七零八落的。

若遇船沉人亡,只能换一种说法,说成“王爷升天”。

五是举止行动有要求。譬如,不能将船上做饭用的勺子扣着放,必须仰着放,其它碗、碟等餐具和生活用具也都不能扣着放,而必须仰放。再譬如,船头上不能解手,说法是船头上解手,冲犯了神灵,会遭受惩罚。解手要到船尾,而且不能说解手,要说“放吊了”。并要事先“打招呼”,以告诉后面的行船,这时不要舀水。还有些规矩,如不能坐在跳板上,女人不能坐船头,米饭不能用汤泡,等等。

千里航运,船工每天与大江为伍,与纤藤结伴,日复一日,生活十分单调、枯燥、乏味。于是,耍码头,便成了船夫在紧张艰险、单调枯燥的航运中一种最佳的休闲消遣方式,也是船工们最喜欢的。无论上水船还是下水船,船工们都要耍码头,即在码头上的集镇玩耍,改善伙食吃肉,船工们俗称“敬老爷”。一般情况是,船当天下午或傍晚到码头,第二天除留一人看守船外,其余船工在码头上尽兴地玩,整整玩耍一天,在街上饮茶、喝酒、吃肉,甚至放荡嫖赌。耍码头的时候,相对还是比较少,因船老板和船夫都想着挣钱,盼望把货早些安安全全地运到,交了货,钱到手。

水运繁华了碧口古镇

碧口至重庆的千里航运线上,日日夜夜回荡着川江号子。

船夫们黑黝黝的脊梁拉动着一艘艘货船,拉动着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江,拉走了一个个春秋岁月,拉来了小镇的繁荣辉煌。

忽如一夜春风来,随着碧口航运的日益兴旺,前来“淘金”的客商趋之若鹜。一时间,悠悠古镇,商贾云集,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来自四川、陕西、江西、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的商贾,在小镇上荡漾着南腔北调,在商海中各显神通,宏图大展,共圆一个发财梦。通过碧口水陆码头,每年运出运进的货物总量达七八万担,最高年份近10万担,价值达一亿多元。

一花引来百花开,航运业的兴旺,随之带来了百业兴旺。

小镇上,商业繁荣,交易兴隆,仅药材行栈就有 70 多家。为航运业服务的各种行业悄然兴起,仅脚骡店、旅店、客栈就达 50 多家,各种商铺 200 多家,茶馆四五十家。饮食业更是“如日中天”,甚至有的皇宫御厨的后代,也慕名来碧口开办饭馆。各种小吃应有尽有,王鸡丝的鸡丝面、陈八砣的杂酱面、邓长凯的饼子、吴庆成的包子、陈凉粉的川北凉粉等名小吃,竞相登台亮相。还有一种名叫“春卷”的小吃,也在王爷庙门口出现。

碧口航运业的兴旺,解决了碧口居民的民生问题,为当地提供了两三千个就业岗位,成为他们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来源。小镇上仅各药材行栈雇佣的拆药工、装药工、洗党参工、撞大黄工等各种加工药材的工人就有一两千人,由航运业带动的客栈、旅店、脚骡店、饭馆、茶馆等各种服务行业人员,也有上千人之多。

碧口航运业的兴旺,还带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清末年间,碧口镇便建起了学堂。民国年间,当地国民政府驻军利用船帮交纳的费用,采用军工的形式,在碧口建起了全县最早的完全小学——碧山小学,首任校长为文县籍陇上著名学者韩定山先生。从碧山小学里,走出了一大批碧口最早的莘莘学子,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教授等。

碧口航运业的兴旺,促进了财政税收。无论清朝,还是民国年间,碧口均设有税务部门。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碧口先后设立了厘金局、税务局、海关等税收机关,最高年份征收税金达 8 万两白银,占全省总税收的三分之一。

碧口航运业的兴旺,丰富了小镇人的文化生活,航运搭台,文化唱戏,琴弦铮铮,箫笛合鸣,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外地的川剧团、豫剧团、秦剧团、皮影戏、马戏团、杂技团,纷纷冲着“水陆码头”慕名而来,在碧口献艺。甚至一些说评书、打金钱板的民间艺人,也纷至沓来,粉墨登场,为小镇人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

与此同时,各地客商出于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纷纷兴建自己的会馆。一时间各类会馆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四川帮的川主宫、江西帮的三元宫、陕西帮的忠义宫、筏帮的鲁班庙等,各具特色,异彩纷呈,成为商镇繁荣兴旺的象征和标志。尤以船帮筹集巨资,历时 33 个春秋建成的紫云宫,在众多会馆中独领风骚,其富丽堂皇、宏伟壮丽,为邻近诸省少有。早年,碧口古镇热闹繁华的程度,胜似十里洋场,被冠以“小上海”的美誉,可谓当之无愧。而这一切,都源于水陆码头航运的兴起。

(前接第 29 页) 民众的意愿,光绪十二年,兰州在曹家厅西侧,坐北朝南建了一座颇为壮观的左公祠。1910 年,澳大利亚人莫里循拍下了这座祠堂的照片。此前,左公祠还是官场高档次的接待场所,时任陕甘总督的允升在这里接待过外宾。后来会馆兴起,左公祠逐渐衰落。再后来,被圈入了志果中学的地界,就是现在的兰州二中,渐渐地没有了过去的踪迹。虽然,左公祠不复存在,但左宗棠对兰州的影响足够深远,无处不在。无论是他为兰州奠定了工业基础,将落后的兰州带入一个新阶段,还是他高瞻远瞩,坚决果敢,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及广开言路,为民谋利的做法和精神,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诗经》里的甘肃

赵逵夫

【作者简介】

赵逵夫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集，也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元典之一，因为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早期发展的历史与我国春秋以前广阔地域中的生产、生活与习俗，各个社会阶层中人的不同遭遇和思想感情。因此也是我国研究上古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

甘肃陇南的礼县、西和与天水之间是秦人发祥地，陇东庆阳一带是周人发祥地，这些在《诗经》中都得到或多或少的反映。

一

《诗经·秦风》收诗十首，有几首反映了秦人早期在今天水、陇南一带的状况。第一篇《车邻》，《诗序》说：“《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秦仲为秦人早期首领，时值周厉王时和周宣王前期。他重武备战，又重礼乐制度的建设，处于秦国势力开始强大的阶段。秦仲十八年（前827），周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秦仲奉命征讨西戎，后为西戎所杀。《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向史伯问当时各诸侯国及周王朝的发展大势。史伯说：“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可见秦仲在秦国早期历史上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物。《车邻》全诗如下：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耄。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寺人（古也作“侍人”）即宫内小臣，负责传达王后的命令。比如君王休息之时由哪些嫔妃或乐师乐伎去侍候娱乐等。从“并坐鼓瑟”“并坐鼓簧”来看，这应是一个从事音乐弹唱的宫中女乐唱出来的。“并坐”指乐师们并坐演奏。

“邻邻”，也作“辘辘”，是很多车行进的声音。白颠（额上有白毛的马），古人也叫“戴星马”，这里指君王所乘之马。第一章说未见过君王，因为未曾得到寺人的命令去为君王弹奏音乐。很含蓄地表现出秦仲忙于战事、狩猎、练武，很少观赏乐舞。

第二、三章的“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是兴句，起着以韵带起的作用，同内容并无多大关系。但是，它往往也反映着歌唱者的生活环境，以至于当时的社会文化

状况。本诗中的“阪”“隰”，正反映了当时秦人生活所处的地理状况。阪，即山坡、斜坡。秦东迁以前所生活的天水西南、陇南北部之地，多山地，少平川，是其地理特征之一。隰，即低湿之地。多有河流和湿地，并非干枯无水，这是其地理特征之二。所以说，这首诗也无意中作为背景展示了陇南、天水一带的地理环境。

四句兴词中，写到了四种树木：漆、栗、桑、杨。这至今都是陇南、天水一带最具经济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树木。漆在陇南各县和天水几个县中是重要的经济树。如成县南宋时石碑《广化寺记》中说：“盖其地饶腴皆可耕。丝身谷腹之外，蜜、纸、枲、漆、竹箭、材章，旁赡内郡。农桑既尽其力，而发贮鬻材、趋时射利、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者，子孙皆修业而息之。”“枲”即麻，“章”指大木料。也就是说，在耕种、采桑养蚕之外，也割漆砍树以售于郡内外，满足一般人和军政、官府等方面的需要。割漆在20世纪是西和、武都一带近林农民的重要副业。栗，即栗子，至今是康县、成县、徽县一带的特产。桑树不用说是养蚕做丝的基础。而杨树因为端直和长得快，在甘肃是最常用的木材。《汉书·地理志》中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有“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邻》《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猎之事。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甘肃南部、中部山多林木。陇南、天水山林附近多以板为屋墙、屋顶。所以说，《车邻》一诗的兴词，也反映出当时天水、陇南一带的地理状况。

这首诗也间接地写了秦仲重于车马军事，而远于歌舞娱乐与女色的作风。第一章开头的“有车邻邻”是说有很多车马，则显然非一人；第二句“有马白颠”是说君王也在其中。因为君王一直重于军事、政事，所以奏琴瑟笙簧者难得见到。这是一个方面的反映。其次，第二章末尾说：“今者不乐，逝者其耄。”清代学者俞越解释说：“今者谓此日，逝者谓他日也。逝，往也，谓过此以往也。”耄(di é)，指年龄已大。这是说：现在不取乐，转眼就老了（要想听看歌舞也没有兴趣和精神了）。第三章说如现在不行乐，转眼离开人世（想听看也不成了）。因为秦仲是有为之君，作为侍者这样劝他休息娱乐而不怕犯忌讳，一则说明臣民对他的关心和喜爱，二则表现出他的勤政贤明。看来秦人从秦仲开始兴起，不是没有原因的。《诗序》说其主题是“美秦仲也”，是不错的。

二

《秦风》第二首为《驷驖》。诗如下：

驷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猋歇骄。

这首诗应是秦国负责国君狩猎的官吏所作。《诗序》：“《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猎之事、园囿之乐也。”秦襄公为庄公之子，秦仲之孙。西周末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秦襄公以兵送周王迁都洛邑，因而被封为诸侯。此即所谓“始命”。驖为毛色黑而毛尖略带红色的马。“孔阜”即很高大。后二句说襄公之子也从襄公一起狩猎。第二章承上写狩猎的过程，具体而生动。“奉时辰牡”言驱逐野兽供君王射猎。后二句写襄公让驾车者向左，然后一箭射去，即中野兽。“舍拔”即放箭。第三章写狩猎结束后的悠闲，很有韵味。末句是说车上载着猎狗。猋(xi ā n)、“骄”(音 xi ā o)是不同品种的猎狗。全诗仍然显示

了早期秦人喜好田猎的尚武精神。

《史记·秦本纪》载秦襄公被“赐以岐以西之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中说：“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西，县名，故作西畴，祠白帝。”《封禅书》中也载此，《史记正义》注：“汉陇西郡西县也。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也。”“陇西”指陇山以西。在述及秦献公作畦畴之事时，《史记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畴。”并说：“西亦有数十祠。”《史记索隐》：“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这些在汉唐时代犹存的遗址，都证明了《诗经》中所反映秦人在今甘肃南部的活动。《驷驖》一诗反映了秦襄公早期在甘肃南部的情形。

三

《蒹葭》是一首情诗，表现出对思慕者极端想念而难以靠近的情感活动。过去，由于对秦国早期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或者说了解得不够具体，缺乏对此诗产生环境的认识，所以对诗中所表现的情节有些不解。为什么既然这样情深，又走不到一起？为什么诗中一再表现一方只在不断地设法靠近这样的—个情节？

这首诗反映了“牛郎织女”的早期传说。关于牛郎（即后来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的传说，20世纪50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撰文认为，在晋代之时，“牛郎织女”故事中他们的生活是富裕的，也是美满的，到南北朝时才变成了悲剧的故事（新编《辞源》即取此说）。所以一般人总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产生较迟。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先王陵墓的发现不但给古代一些文献的记载提供了实证，而且对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带与当时礼仪制度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史记·秦本纪》开头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大业即秦人之第一位男性祖先。秦人是很早从今山东迁徙来的，但在山东之时势单力薄，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和记忆。至汉水上游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秦人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将秋季在天空看起来很明显的一片星带以他们所居之地水名“汉”来命名，称作“汉”或“天汉”“云汉”，而将天汉边上最亮的一组星（主星为零等星）命名为“织女星”。因为他们的始祖女修的特长和事迹只有一个字：“织”，故称作“织女”。

秦文公（襄公之子）元年，居西垂宫（在西县）。文公十六年伐戎，戎败走，于是“收周馀民有之”。周秦文化进一步交融。因周人发祥于今陇东宁县一带，在汉水的东侧。《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西周之国，姬姓，有人方耕，名曰叔均。”“稷之弟（‘子’之误）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海内经》中又说：“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周人是以农耕起家的，而牛耕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水平，因而周人将天汉以东一颗很亮的星（一等星）命名为牵牛星。我国大部分地区自史前阶段形成的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成为“牛郎织女”故事形成的社会基础。

《蒹葭》一诗正表现了一个男子想走近久久思念的女子而总是不能的情节，正是牛郎织女隔在银河两岸的反映。原诗如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正是初秋季节的景象，这同后代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在农历七月初七是一致的。诗中所写地理特征，也与漾水河（西和河，早期秦人视之为汉水正源）与盐关河（后代所确定西汉水源头）交汇之处的复杂地形相一致，形成这首诗中所写“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那样的状况。

三

《周南》中也有一首与牵牛织女传说相关的诗，这就是《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蒹；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这也是表现了牵牛（牛郎）对织女的寻求和企盼。乔木即高大的树木。看着高大的树，却不能到跟前，比喻女方地位高，难以相配。所以下面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首诗的产生应在当时的汉水中游（今东汉水上游），产生时间应在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牵牛织女传说最早应流传在汉水流域。

《蒹葭》《汉广》一产生于秦人地域中，一产生于周人地域中，反映出牵牛织女传说早期传播的情况。这两首诗都是《诗经》中写男女爱情最有韵味的，而都同甘肃有关。

《诗经·邶风》中写周人早期发祥史的几首诗如《绵》《生民》也关系到甘肃，因为据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看法，周人最早的发祥地应到马莲河流域去寻找。

（前接第 19 页）指挥于军旅，勇敢捍御国土；或奔走于异域，精心谋划邦交；或操持于郡县，倾力打造惠政。上下齐心，共同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帝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藩镇势力的强大，唐帝国走向分裂；政治中心东迁，经济重心南移。北宋以降，海上交通发达，陆上丝绸之路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繁荣千载的古丝绸之路日趋衰落，河陇地区由原来所在的黄金地段一变而为闭塞之区，其社会、经济与东南地区渐次拉大了距离。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党中央高瞻远瞩，一再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号召；近年以来，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与世界各国共建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以及各项优惠政策。这对于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人民来讲，不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我们应牢牢抓住这一机遇，以历史经验为鉴戒，发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拼搏精神，同心协力，再创辉煌。

谈谈天水的三国古战场文化

张崇琛

【作者简介】

张崇琛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兰州大学教授

天水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很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水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化，同时也与它的重要地理位置有关。

天水地区是秦人的发祥地。当年秦的祖先自东方西迁，最早所居住的西垂，即在今礼县的永兴乡及西和县的长道镇一带。后来汉代的西县及三国时的西城也在这一地区。此后，秦的历史上曾出过许多重要的人物，秦王朝最终也统一了中国。而曾为周穆王养马的秦人造父被封于赵城后，天水又成为赵姓的郡望。于是，很多文化名人便自称是天水人。如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在泰山上的题辞，其落款便是“天水赵明诚”。甚至连金章宗完颜珣见到宋徽宗赵佶所摹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在上面题曰：“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其所谓“天水”，即指宋徽宗赵佶。此后，人们也常以“天水朝”来指代赵宋王朝。如陈寅恪著作中便常称赵宋王朝为“天水一朝”。可见天水的知名度之高了。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天水号称“关中咽喉”、“襟带陇右”、丝路重镇。由于诸葛亮是最早认识到天水战略地位的一位古人，所以，三国时期，围绕天水地区便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事，并留下了许多古战场，这便形成了天水的三国古战场文化。

说到天水的三国古战场，便不能不提诸葛亮的“六出祁山”。自公元228年（蜀建兴六年）至公元234年（蜀建兴十二年）的6年间，诸葛亮以汉中为基地，先后对曹魏进行过五次北伐，即所谓“六出祁山”。五次北伐为何被称为“六出祁山”呢？那是因为后人将建兴八年即公元230年秋诸葛亮待魏军于城固、赤阪的一次也计算在内了，而这一次魏军虽数道南侵，然皆半途而返，两军并未接触。而五次中，第一、第三和第四次北伐又都是在今天的水天地区进行的，因此，天水便成为三国的重要战场，而诸葛亮也遂与天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是在建兴六年（228）春举行的。他先扬声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取郿（今陕西眉县），并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境内），以吸引魏军主力；而自己则身率6万大军进攻祁山，并很快攻占了今甘肃西和、礼县一带的祁山地区，还在祁山堡安营扎寨，设立了他的北伐军指挥部，指挥蜀军继续北进。不久，

南安(今陇西县东北)、天水(甘谷县东)、安定(镇原县南)三郡纷纷叛魏归蜀,一时关中为之震动,曹魏朝野恐惧。至此,魏明帝曹睿才恍然大悟,慌忙从洛阳赶到长安坐镇,并派大将张郃率兵抵挡蜀军。于是,蜀魏两军便在“关陇大道”上的军事重镇街亭(今秦安陇城镇),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但由于镇守街亭的马谡“违亮节度”,“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遂使街亭失守,致魏军长驱直入。不得已,诸葛亮只好拔西县民千余家还于汉中。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遂以失败告终。这是诸葛亮首次踏上天水大地。

由于第一次北伐的失败,诸葛亮坚持“平取陇右”,先夺取天水然后再从背后包抄魏国的策略,曾遭到很多人的非议。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不纳魏延的“十日出子午谷”之计是“战略之失”,是“心胸偏狭”、妒贤嫉能,更由此而对诸葛亮进行全面否定。这是未能对魏延之计进行认真评估所致。子午谷全长约 700 余里,全是穿行于山谷之中。魏延所带领的 5000 人要边修栈道边行进,十天根本走不出去。两年后魏国的曹真也是由于子午谷南侵汉中,结果费时一个多月,才走了一半路程,便是最好的证明。何况曹魏在子午谷北口早已有军队防守,以魏延远来疲惫的区区 5000 人,根本无法与曹魏的重兵抗衡。诸葛亮斥魏延之计“悬危”是有道理的。至于街亭之失,那是因为错用了马谡所致,并非诸葛亮“安从坦道”、“平取陇右”战略方针的失误。

诸葛亮再次足履天水地区(还有陇南地区),是在公元 229 年(建兴七年),即他第三次北伐期间。此前,他曾于公元 228 年的冬天出散关(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围陈仓(今宝鸡市东),举行过第二次北伐,然因粮尽而不得不返。此次,诸葛亮首先派陈式攻打武都(今成县西)、阴平(今文县西北),待曹魏的雍州刺史郭淮欲率众出击时,诸葛亮则领军来到建威(今西和),从而逼迫郭淮退还,由蜀军完全占领了武都、阴平二郡,并拥有了今甘肃东南部及陕西省凤县、略阳等地的广大地区。后主刘禅对这一次的胜利也十分高兴,旋即下诏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位(街亭之役后诸葛亮曾上书“自贬三等”)。

公元 231 年(建兴九年)春天,诸葛亮又一次兵出祁山,举行了第四次北伐,也是他第三次踏上天水大地。这一次,诸葛亮以“木牛”(一种灵便的独轮车)运送军粮,首战即打败了西救祁山的魏军郭淮、费曜部,并借机芟割卤城(今盐官)一带的熟麦。魏国派司马懿率军迎战,诸葛亮与司马懿相遇于上邽(今天水市秦城区)之东。但司马懿敛兵依险,不与蜀军交战,诸葛亮只好引兵还保祁山。后司马懿因部下笑他“畏蜀如虎”,才自己率军取中道(赤峪沟往天水镇一道)击亮,而令张郃追蜀军至木门(在今天水市秦城区西南牡丹乡木门村)。木门又称木门道,其地两山夹峙,空谷一线,地形十分险要。诸葛亮撤退时早于木门东山埋有伏兵,待张郃追至,万箭齐发,“飞矢中郃右膝”,遂射杀张郃。与此同时,蜀将魏延、高翔、吴班等也于中道大破魏军,逼使司马懿还保上邽。而正当诸葛亮与司马懿再次对垒上邽之际,蜀中负责运送军粮的李严因害怕粮秣误期而受诸葛亮责罚,竟假传后主刘禅之旨,要诸葛亮回师。加之军中粮草已尽,诸葛亮遂不得不暂时收兵。

此后 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再率 10 万大军,由褒斜道出斜谷,占据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举行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北伐。但在与司马懿对垒百余日之后,即因劳累过度,于这年的 8 月 28 日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当然,这已不在天水地区,而是发生于陕西境内的事情了。

综观天水地区的三国古战场,像祁山堡(在今礼县城东 23 公里的祁山)、建威(今西

和县城附近)、卤城(今礼县盐官)、天水关(今天水镇北)、木门道(牡丹乡木门村)、西城(礼县永兴乡及西和长道镇一带)、上邽(今天水市秦城区)等地,诸葛亮皆曾亲历,并留下了不少的遗址和传说。如祁山堡附近的“诸葛亮上马石”、“诸葛九寨”(传为蜀兵积土假充粮堆),天水城东陈家磨处的“诸葛军垒”(传为蜀兵每人握一把土堆置而成),及流传于木门村一带的“木门矢髀”故事(传诸葛亮欲射一“马”即司马懿,结果仅得一“獐”即张郃)皆是。至于三国时期的著名战场街亭(今秦安县陇城镇),诸葛亮虽未亲至,但蜀军的首次北伐受挫及孔明的“挥泪斩马谡”,都与街亭之失是分不开的。所以,要追寻诸葛亮与天水的不解之缘,街亭也是不可忽视的。

天水的三国古战场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宣扬古战场文化,除了对这些遗址进行有效的保护外,在此我顺便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与陕西有关地区联合,打造一条三国古战场黄金旅游线。如能将礼县的祁山堡、天水的街亭与陕西的五丈原、定军山诸葛亮墓等遗址连成一线,我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对三国文化感兴趣的人们。

二是与京剧界联合,打造西城景点。由于京剧《空城计》的播扬,西城的知名度很高。很多京剧的须生名角都因唱《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而出名,而以上三剧目至今仍是各派须生常演的。中央电视台就曾多次同时播放过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四大流派的《空城计》,其受众之多是难以估计的。但很多人以为西城是戏曲虚构的,不知道西城乃实有其地,而且就在今天水地区内。倘能在当地选址重建一座影视基地式的西城,我想不但京剧界的艺人们会登城体验一番,就连普通百姓也是喜欢到“城楼观山景”的。这样一来,又可为三国古战场的黄金旅游线路再增加一处新的亮点。至于诸葛亮的“空城计”究竟有无,学者们尽可以见仁见智,发表自己的意见。反正历史上的西城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以上是对天水地区的三国战事及古战场遗址的介绍。下面便来谈谈天水三国古战场文化的弘扬问题。

三国文化的亮点是诸葛亮文化。我们读《三国演义》时便有这样的感觉,读到诸葛亮死后,便觉得索然无味了。天水的三国古战场文化也不例外,也应抓住诸葛亮文化这个亮点。那么,诸葛亮文化都有哪些内涵呢?它与天水又有什么关系?具体说,有五个方面:

一曰高尚的人格。诸葛亮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人几乎所有的美德,如忠贞、智慧、清正、廉洁、勤奋、俭朴、澹泊、谨慎等。而“忠”与“智”则是他人格最突出的特点。他死后被朝廷谥为“忠武”,又被民间称为“智星”。其所谓“忠”,当然不能排除对君王之忠,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理想、事业和职守。我们看他直到晚年,为了实现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理想,仍亲自带兵北伐,足履陇原,并最终以身殉职,便可以体会其一腔忠心了。他的“智”,即使剔除其被小说家所夸张的部分,也还是超常的。而更为难得的是,诸葛亮能将“忠”与“智”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无疑”^①,他用自己的忠心和智慧来报效国家,来实现理想,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此,他不但摈弃了自己的许多爱好(如音乐、绘画、文学创作及史学研究等),而且还长期夫妻分居,晚有几息(儿子诸葛瞻出生时诸葛亮已47岁了)。诸葛亮之为人,看起来自然平常,实际上难以企及。正如当年蜀汉小吏所说:

①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

②殷云《小说》(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本)。

③《鹤林玉露》乙编卷五。

④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⑤见诸葛亮《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⑥《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

⑦参见拙文《诸葛亮的〈又诫子书〉是写给谁的》，《国文天地》(台北)第十四卷第十二期(1999年5月刊出)。

⑧⑨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公在日，亦不觉异，自公歿后，未见其比。”^②宋人罗大经更认为，诸葛亮之为人，“自三代而后，可谓绝无仅有矣。”^③诸葛亮这种高尚的人格，在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今天，仍是值得国人借鉴和学习的。

二曰超常的智慧。诸葛亮智慧之超常是世所公认的。而我们考察其智慧的来源，则不外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观其大略”^④的读书方法。所谓“观其大略”，并非“不求甚解”(陶渊明语)，而是一种能抓住书中要义然又不肯死守章句的十分高明的读书方法。事实证明，这样的读书方法既可以将读书与“识时务”联系起来，以强化读书的实用功能；同时也能促进各种思想的比较与融合，从而形成诸葛亮思想的“聚合效应”并培养其综合素质。二是综合性的思维方式。诸葛亮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人的单向思维或定向思维，而是多向思维，或曰综合性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注重整体意识、前瞻意识和综合意识。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才开始兴起的“天地生综合研究”，与诸葛亮的思维方式可谓一脉相承。三是澹泊宁静的精神境界。所谓“澹泊”，主要是指对自身名利的不刻意追求，对统治者的不趋炎附势，能永远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在这种心境下，人的聪明才智便会充分地发挥出来。所谓“宁静”，实际也是一种不含任何杂念的精神境界，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便能“致远”，便能对万事万物都有透彻的理解。四是谨慎的处世态度。谨慎可以使思维更加细密，处事更加周全，也是可以出智慧的。

今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看到，资本的权威正在日益为智慧所取代。当今世界，国家要想强大，人们要想致富，单凭资本的拥有已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要靠自身的智慧。因之，智慧学的研究也被提上议程。而诸葛亮的超常智慧，恰可为智慧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凡例。

三曰廉政之楷模。诸葛亮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已为中国历代的官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不但澹泊名利(如拒受“九锡”)，而且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还能自行问责，自请处分，并广泛地发动将士对自己提出意见^⑤。他廉洁无私，执法如山，对部下赏罚分明，真正做到“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⑥。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即使对自己的嗣子诸葛乔也不加照顾，“一出祁山”时他令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转运粮草于谷中，并殒命于陇原大地^⑦。他对自己的财产完全透明，除了官家的俸禄外，没有丝毫的额外收入。他在临终之前给后主刘禅的一封上表，实可视为他对自己家庭财产的一次正式申报。而所谓“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⑧，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份中人之产。他还遗命薄葬，“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⑨。这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汉末三国时代，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四曰家教之典范。诸葛亮所留下的《诫子书》与《诫外甥书》，堪为中华家教的宝典，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人们。《诫子书》着重强调了修身和为学都要静的道理。指出“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宁静不能成就一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而诸葛亮所说的“静”，实际是一种不含任何杂念的精神境界。与“静”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碍修身，也不能治学，而且容易转化为“淫慢”，终至事业无成。诸葛亮去世时，其子诸葛瞻虽然只有8岁，但从此后他曾官至蜀行都护卫将军并平尚书事，与董厥、樊建一起主持蜀国后期的军政大计，以及在国难当头之际，与其子诸葛尚独冒锋刃、视死如归，终于以身殉国的事实来看，诸葛亮的教诲他应是牢记了。正如晋人干宝所说：“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

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⑩”

⑩《三国志·葛瞻传》裴松之注引干宝语。

《诫外甥书》是诸葛亮写给二姐与庞山民的儿子庞涣的,主要谈立志问题。这是诸葛亮在得知姐夫早逝,而外甥适当弱冠之年,正须立志时写下的。诸葛亮告诉外甥,志向应建立在远大的目标之上,要效法先贤,弃绝私情杂念和各种牵累,除去怨天尤人的情绪。只要能做到这些,即使眼下还不能发达,也不必担心事业不会成功。反之,若志向不坚毅,思想境界不开阔,只是碌碌无为地陷入在世俗之中,那便将永远沦于凡庸之列。此后,外甥庞涣便谨遵舅氏诸葛亮的教诲,首先从立志做起,并终于事业有成。晋太康中,庞涣已仕至牂牁太守矣。

五曰酒文化要义的阐释。无论古今中外,饮酒在人际交往中都是免不了的。但如何饮酒,却是大有讲究的。殷代的纣王是纵酒的,稍后的周公及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都是禁酒的。尤其是刘备,甚至连藏有酿具者都要治罪。这些都有失偏颇。唯有诸葛亮对饮酒的见解是最可取的。他在《又诫子书》中说: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⑪。

⑪《太平御览》卷497。

这确是一篇讲“酒文化”的绝妙好词。诸葛亮认为酒的功能有二:一是礼仪功能,即“合礼致情”(合乎礼节,表达感情);二是养生功能,即“运体归性”(让身体舒适,以恢复人的本性)。而饮酒的最高境界则是“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个人身心的和谐。由此出发,他既不主张纵酒,也不主张禁酒。只是在主人的心意还未尽完,而宾客也还没有疲倦的情况下,可以饮至微醉,但不能“迷乱”,即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这原本是第一次北伐期间,诸葛亮有感于当时蜀中诸将子弟的饮酒之风而写给其嗣子诸葛乔的一段话,不意竟成了对酒文化要义最经典的阐释,以至我们今天读来犹觉意味深长。

以上是诸葛亮文化内涵的几个主要方面。可以看出,这些内涵的形成大都与天水有着一定的关系。如晚年的北伐所体现出的报国忠心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三次兵出陇右所体现出的对天水战略位置重要性的认识,嗣子诸葛乔殒命陇原所体现出的凛然大义,“六出祁山”期间所表现出的战略远见及廉政垂范(如街亭失守后的“自贬三等”及第三次北伐胜利后的拒受“九锡”),还有晚年所写出的家教名篇及酒文化名言等,皆与诸葛亮的天水之缘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要弘扬天水的三国古战场文化,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后接第93页)呢?

我这个人,素来怕作序类文:一怕自己档次不够,大头戴小帽,显得滑稽;二怕自己力不从心,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不到痒处;三是本人最烦那些动辄给人作序的,要么自己是个局外人,说来说去说不到点子上,贻笑于方家,要么自己也就半瓢水,却好人前充大佬,更觉得丑陋。但王祥林跟我提这个要求,于公于私,都让我无法拒绝。拉拉杂杂说这么多闲话,也只是为了滥竿充数,聊以塞责。能够读到我这篇序文的人,自然也能读到王祥林的诗,关于他的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还是闭上嘴巴,不说了吧。

权为序。

【作者简介】

陈自仁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略论老子修身思想的当代意义

陈自仁

老子的《道德经》，既是一部辉煌的哲学巨著，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修身指南。老子的修身思想，特别强调修心，追求清心制欲，明心见性，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意识，进而改变人生观和价值观，达到人的心灵升华，净化人的精神世界。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探讨老子的修身思想，继承和弘扬老子的修身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子倡导的修身方法和途径

老子倡导的修身方法和途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重道守道，道法自然。

一、修身修德，关键在道

在《道德经》中，修身就是修德。老子的修身思想，完全建立在对道的领悟之上。他认为德是道的表现，道是德的基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以下凡《道德经》引文，只注篇章序号）“孔德”即“大德”。在老子心目中，道既是德的内容，又是德的本体，德则是道的表现形式。所以修身修德，关键在于重道。只有重道，用道修养自身，“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第五十四章）不仅德与道是统一的，而且身心灵魂都必须与道合一。为此，老子发出“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第十章）的反问，强调守护灵魂与坚守大道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分离。

二、道法自然，自然而然

那么，如何守道呢？老子认为，道最大的特性在于“法自然”。这里说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自己的样子”、“自己的本性”，因此，“道法自然”是道无效法的对象，道的法则就是“法自己”，就是自然而然。人受制于地，地受制于天，天受制于规则，不加人为，其中的缘由是道自然而然。因此，一个重道修身的人或者圣人，必然会“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事物的发展，大都是各种客观因素聚合的结果。我们不能人为地去改变这种趋势，其实，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只有不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顺应这种趋势，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也是修身的方法和途径。

由此可见,老子修身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重道守道,“道法自然”,依道修身,一切都要以无为不言为核心。所修之德,是为之上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第三十八章)上德的人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下德的人顺应自然而有作为。自然无为之德,才是修身的目的。老子强调,“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作无为之为,行无事之事,品无味之味,也就是道法自然,才是修身的途径。

三、贵身爱身,保全自我

老子认为,修身的目的是贵生保身。儒家认为,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人世,以良好的心态治理天下。老子的修身思想,则是贵生自保,明哲保身。贵生即爱身,以保全自我为贵。人间一切事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所以要保身,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老子问:“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第四十四章)言下之意,名利财物皆身外之物,与人珍贵的生命相比,不足挂齿。因此,一个人为争名利而危及自身,玷污自己的灵魂,那就得不偿失了。人们对这种外在的名、利、得与身之关系要有正确的选择,要贵自身,轻名利,真正要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第十三章)得宠则喜,受辱则悲,原是人常情。但宠辱都是身外之物,都会给人带来祸患。因此,只有无私无欲,才能达到贵身爱身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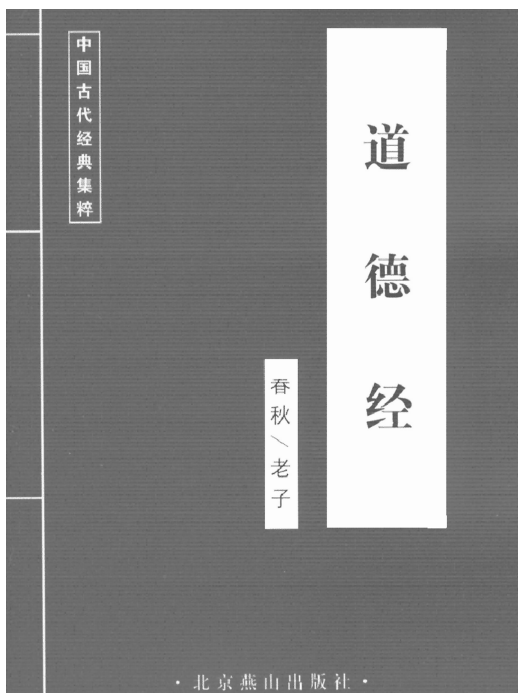
老子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

老子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静无为

这里的清静和无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清静是无为的思想前提,无为则是清静的外在表现。只有清静,才能做到无为。清静要求人们致虚守静。《道德经》第十六章中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致虚”,就是心灵有空虚通透,排除蒙蔽心灵的一切杂念;“守静”,就是坚守清静之心,顺应自然,恪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道的法则,也是修身的第一要务。虚静之境,是天地万物的本始,因此,人要修身,自然要致虚守静,只有这样才会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换句话说,只要人人做到清静,才能做到天下清明。

无为是老子修身思想的行为原则。天地看似“无为”,却化育万物。“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无有人



【图解】

《道德经》书影

有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无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在这里，“无为”可以有多种表现，在行为上，不轻言，不妄作，行不言之教，为无为之事。在政治上，要无为而治，顺应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中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在老子看来，最好的统治者，是老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较次的统治者，是百姓在亲近他，赞誉他；较差的统治者，是百姓从内心害怕他；最差的统治者，是百姓在侮辱他。因此，无为而治，才是真正的大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这是老子给统治者提出的治国良策，也是他梦想的国家治理效果。

二、俭嗇之德

俭嗇之德是与清静无为相联系的一种思想品德。所谓俭嗇，就是在物质、精神、行为等方面，要处之吝嗇，不铺张，不浪费。收起欲望，爱惜精神；收敛精神，内心纯洁。用俭嗇之德修身，就是要为人谦恭纯朴。用俭嗇之德治国，就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俭嗇与盈满是相对立的美德，任何事物到了极点即盈满，就会转向反面，甚至会带来祸害。因此，倡导俭嗇与反对盈满是相辅相成的。“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第十五章)不去追求盈满，敝旧却能新生。倡导俭嗇，就要反对“余食赘行”。“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第二十四章)多余的饮食和行为，令人厌恶，有道之人，绝对不能这样干。“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事物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衰老，就不符合道了。不符合道的事物，会提早消亡。因此，人做事都不要过分，而要坚守俭嗇之德。

三、柔弱不争

“守雌”是《道德经》的一个重要术语。这里的“雌”，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在老子的哲学中，“雄”是强势的代名词，“雌”是弱势的代名词。一个人修身，就应该“守其雌”，不出人头地，如低洼处流淌的溪水那样。只有这样，才能与永恒的道德不分离，像回到了婴儿时代那样纯洁。

“守雌”就是展示柔弱，不争强好胜。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这就是柔能克刚的道理。所以，老子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由于不争，才能得到，争来争去，却往往什么也得不到。因此，在老子看来，柔弱不争，既处理人际关系的法宝，也是人生修养的一种境界。

四、谦恭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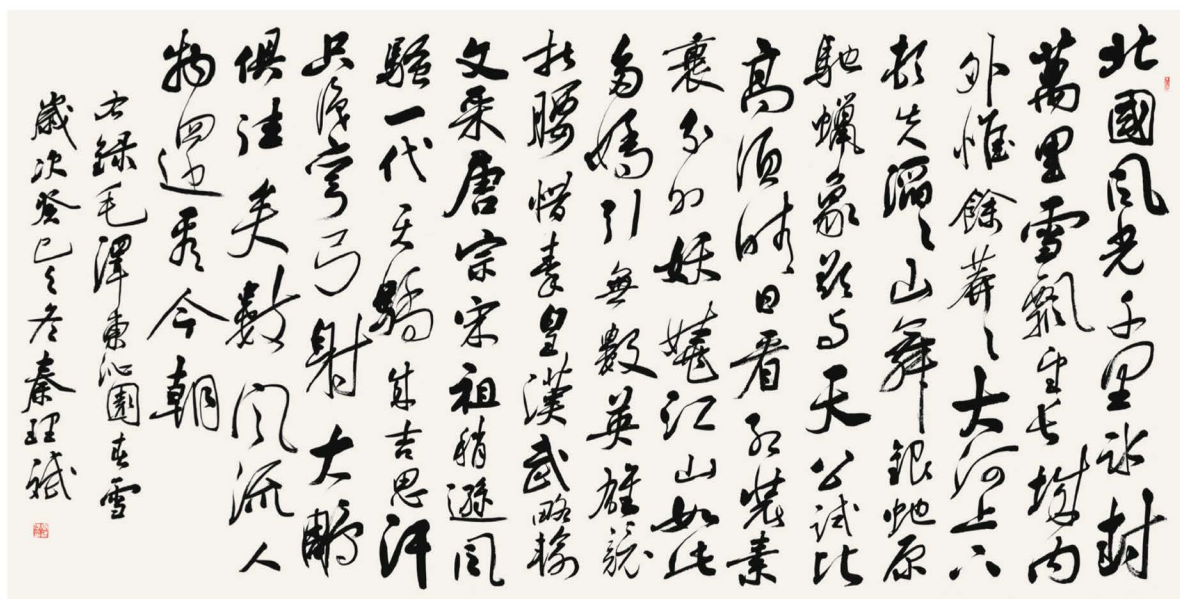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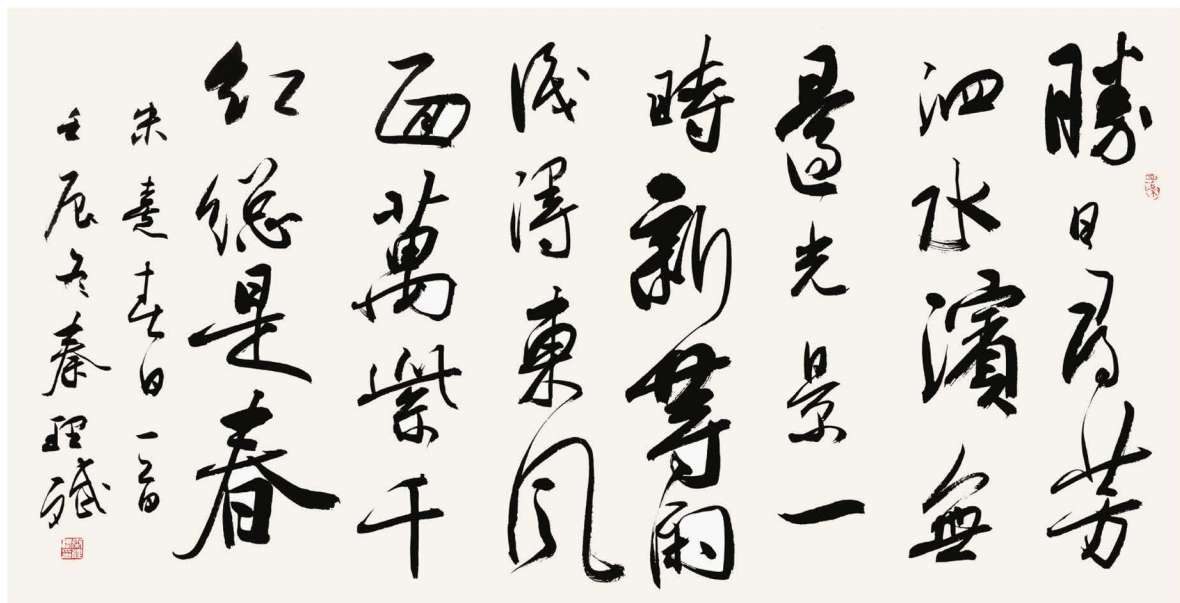
谦恭之美的思想，在《道德经》中随处可见。所谓谦恭之美，就是处处甘居人下人后，以他人为先为尊。“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生，就是因为它不是为自己而生。“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第七章)因此，一个得道修德之人常常能把自己看低、把别人看高，甚至把自己置之度外，这样他才会成就自己。“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

阎仲雄国画作品欣赏

阎仲雄，男，甘肃省临洮人，1955年11月出生，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甘肃省工艺美术特级大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擅长雕塑、根雕、石雕、戏剧帽子、戏剧道具的制作、秦腔甘肃耿派脸谱的绘制以及油画、国画、书法、盆景的创作。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全省各种工艺美术展览，并荣获全国金牌、铜牌奖，全省一、二、三等奖等多项奖励。人物山水花鸟画取得了北京荣宝斋的售画资格。



秦理斌，笔名文杉，别号陇南子，甘肃礼县人，兰州大学档案馆馆长，甘肃省书协副主席、楷书委员会主任，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曾担任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和“尧山杯”新人展评审委员等。书法作品曾获甘肃省第二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甘肃省第三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第三届甘肃省“群星奖”一等奖等奖励。作品多次参展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等国家级大展。《鉴藏》《人民艺术》《中国书法》《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羲之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甘肃日报》等媒体曾对其做过专题介绍，曾应邀赴日本、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进行书法艺术交流访问。出版有《荣宝斋画谱·秦理斌书法》《中国名家画库·秦理斌》《敦煌风中青年书法家精品库·秦理斌作品》等。



萧 暗 国 画 作 品 欣 赏

肖爱民，笔名萧暗，号乐墨斋。1962年生于兰州。1988年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28岁师承齐白石门下、著名画家韩不言先生，为嫡传弟子，后师承顾子惠、骆石华先生习书刻印。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丝绸之路协会常务理事、兰州市政协书画院特聘书画家、兰州市美协西固分会副主席。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美术展览并获奖，多幅作品被国内外艺术机构收藏。甘肃电视台摄制专题片《画家萧暗》。书画作品在《鉴藏》《中国书画报》《书法报》《篆刻》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出版有《萧暗画猫选辑》《萧暗书画篆刻精选》《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萧暗画选》等。



配天,古之极也。”(第六十八章)能用人的人,必然是处于上位之人,如果他能甘于人后,说明他具备了谦恭之美,也说明他高于常人,这是符合天道规律的,也是自古以来最高的法则。

五、谨言慎行

老子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这句话,可以引申为聪明的人不多言,多言者不聪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面对一种事物,懂的人不说话,爱说话的人往往不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与其多说话屡屡失误,还不如坚守空虚无为,即“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至于圣者,更要行不言之教。

不言、谨言还可以理解为不要轻易许诺。“轻诺必然寡信。”(第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第八十一章)老子的谨言思想,不是不让人说话,而是告诫人们不要夸夸其谈,不要信口开河,更不要胡言乱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谨言是老子修身思想的重要内容。

除了谨言,还要慎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第六十四章)慎行即遇事从小处着手,从易处做起,有始有终,不盲目蛮干。“大小多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第六十三章)如果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必然要遇到挫折和困难。圣人遇事都会看到困难的一面,最终就不会遇到困难。老子要求人们做事,一定要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从小事做起,谨慎行事,才能做成大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这就是慎行作为修身内容的意义所在。

六、慈爱公正

慈爱即广泛的爱。老子认为,只有爱天下所有的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夫慈,以战则胜,以守以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第六十七章)老子说的慈爱,区别于儒家的仁爱。老子说的慈爱,是一种抽象的、公平的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是古代的一种祭品,祭祀时人们对它敬如神灵,祭祀后却对它焚烧践踏。在这里,刍狗前后的命运不同,并非人们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而是环境和人们的需要发生了变化。天地和圣人对人并无私爱,只是平等的对待,这就是老子心目中的“仁”。“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圣人对百姓有普遍的慈爱,能对百姓不分亲疏、利害、贵贱,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所以才被天下人所尊重、所景仰。这是慈爱公正的体现,也是对慈爱公正的回报。

继承和弘扬老子修身思想的几点思考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已成为时代潮流。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大量新问题。人们原来恪守的一些东西,有的面临严峻挑战,有的被新思潮完全颠覆,有的被新生事物所代替。更为严峻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大量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如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出现了政风败坏的一些问题;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公德缺失的现象;公众生活领域出现了诚信丧失的现

象,等等。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老子的修身思想?

一、清静寡欲,顺应自然

“无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修身问题上,“无为”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严格来说,老子是针对人私欲的“有为”,即人性的贪婪,提出了“无为”的修身思想。在人欲横流、物欲泛滥的今天,老子的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只有放弃为了私欲的“有为”,放弃主观的任性,顺应客观的自然而然,才能达到修身上的“无为”,进而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静寡欲,放弃贪婪,从“为无为”达到“无不为”,这也是切合老子倡导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原则。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清静寡欲。清静寡欲是前提,顺应自然是手段,修身养性是目的。

二、知足知止,净化心灵

追求出人头地,是人类共同的天性。但是,“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第四十六章)罪恶没有大过放纵欲望的了,祸患没有大过不知满足的了;过失没有大过贪得无厌的了。所以知道满足的人,才能享受到满足的快乐。一味地争强好胜,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给自己带来痛苦。只有做到淡泊名利,才能净化心灵,知足常乐,达到“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的崇高境界。可见,知足知止,净化心灵,是继承和弘扬老子修身思想的重要途径。

三、为人谦和,与人为善

“无为”、“不争”、“善下”、“少私寡欲”、“上善若水”、“慎终如始”等等,都是老子修身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些修身内容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为人谦和,与人为善。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六十六章)他希望人们虚怀若谷,善待他人。善是人性中最闪亮的部分,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是群居动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人类共同理想。我们继承老子关于谦恭善下的思想,如果能真正做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第四十九章),具备了报怨以德的宽广胸怀,在名利面前,“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即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能化解生活中的各种误解和矛盾,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为人谦和,与人为善,是对老子修身思想的发扬光大。

总之,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修身指南,《道德经》具备独特而全面的理论体系。对我们来说,《道德经》反复阐释的修身思想,就像冬日里的一缕春风,大漠中的一泓清泉。学习和研究老子的修身思想,可以滋润我们焦躁不安的心灵,化解我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困惑。自觉地传承和弘扬老子的修身思想,将使我们的时代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吐蕃”一称语源新证

贺文宣 杨士宏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随着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外藏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吐蕃”一词的语源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因各自研究的角度和所掌握的资料不同,得出的结论仍互有差异。其中,有的说“吐蕃”一称源于藏文,有的说源于汉文,但都没有用汉藏互译的实例和汉文译文特有的汉语方言读音特点去探索,得出的结论均不甚确定。纵观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1. 认为吐蕃一词起源于南北朝北魏时期。有学者认为“吐蕃”一词起源于北朝鲜卑族。十六国之一的南凉是秃髮鲜卑族建立的;“秃髮”与“吐蕃”同音异译,遂以秃髮为姓氏,以“吐蕃”为国家或部族称号,该国被西秦灭亡之后,国号无存,但“吐蕃”作为族名、地域名保存下来。

2. 认为吐蕃一词起源于唐朝。(1)吐蕃一词最早频繁出现在唐朝史籍里。《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唐太宗实录》等应是最早出现吐蕃一词的权威典籍;(2)学界公认“吐蕃”中的“蕃”译音藏文^{ཕུ་བོ་}。问题是吐蕃政权一直自称单音节“^{ཕུ་བོ་}”;藏文文献中也从未有过“吐蕃”二字,在《吐蕃会盟碑》文中与“大唐”相对,吐蕃才自称^{ཕུ་བོ་ལྷ་སྐྱོང་པོ་},是三音节词语。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吐蕃”中的“吐”出自什么语言,作何解释。对此,不少学者给出了多可能的解释,如“吐”通“大”说;“吐”表“上部”说;“吐”源于“氏”说等。

3. 另有学者说吐蕃很可能是由突厥语 t ü p(宗族)加 bod 组成的,意为“蕃部族”。认为“吐蕃”一词起源时并非吐蕃政权或族群的自称,而是他称,应是唐人根据他族对“吐蕃”的称呼造出的汉语音译词。

4. “吐蕃”的源起路径,因“吐蕃”地处边远,从跨文化交往的角度,认为“吐蕃”名称可能的源起途径为:(1)突厥居中介译;(2)党项居中介介绍;(3)吐谷浑居中称呼。“吐蕃”作为他称应先产生于突厥,后传于吐谷浑;如果吐谷浑人引导吐蕃使者通使唐朝,其给唐朝介绍的“吐蕃”名称音应来自于突厥:突厥语与吐谷浑语属一个语系。

5. “蕃”字在唐代的音韵表现。在《广韵》中可见“蕃”字仅有“附袁切、甫烦切”两读,均属元韵。藏学家牙含章根据《广韵声系》,认为番、蕃二字有“补过切”、“孚袁切”两读,认为唐时“蕃”就是依“补过切”读做“播”的,并说这可从唐蕃会盟碑中“蕃”藏文作 bod

【作者简介】

贺文宣

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

杨士宏

甘肃省府文史馆研究员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①黄奋生编著《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第一版，54页。

得到证实。

6. 五代后晋《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以秃髮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北宋《新唐书·吐蕃传》：“有發羌、唐旄等……蕃、發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

7. 吐蕃时期的ཁྲུང་པོ་与 ཁྲུང་པོ་ཨ་ཁྲུང་པོ་既然吐蕃里的“蕃”对音藏文ཁྲུང་པོ་，在松赞干布时期及以前，吐蕃宗教方面主要信仰的是本土的苯教()ཁྲུང་པོ་从藏汉文资料看，“悉勃野”是在“蕃”正式冠名前的吐蕃名称。那么为何又出现了“蕃”作为国号呢？这与苯教有关。因“苯”和ཁྲུང་པོ་的韵尾音接近，文字可以互换，故可由“苯”而“蕃”。

另外，著名藏学家黄奋生教授在《藏族史略》一书中对“吐蕃”一词有这样的论述：“唐朝称当时住在今西藏的藏族及其所建的国家为“吐蕃”。“吐”是“大”的同音字，读作“杜”；“蕃”读作“博”，和“发羌”的“发”字一样，是藏族自己民族称号ཁྲུང་པོ་这个字的译音。唐朝对吐蕃自称“大唐”。当时吐蕃也是个强国，对唐朝自称“大蕃”。如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唐蕃长安会盟文中有“西为大蕃，东实巨唐之语。公元822年(唐长庆二年)，拉萨唐蕃会盟碑上刻有汉文“大蕃”、藏文ཁྲུང་པོ་ཨ་ཁྲུང་པོ་的对称字样。但唐朝在一般文字上总不愿用这个“大”字加给它，于是改用这个“大”的同音字“吐”字，称它为“吐蕃”(杜博)。突厥人和后来的蒙古人称“吐蕃”为“吐伯特”。“吐”可能是ཁྲུང་(上部)字的对音，ཁྲུང་字的后置字发音读“伯特”。“吐伯特”是“上部博族”的意思。总的说，“吐”含有“大”和“上”的两种意义。“蕃”和“伯特”是藏族自己民族称号的不同译音；“吐蕃”是“大蕃”，而“吐伯特”又含有“上部蕃族”的意义^①。

梳理以上不同观点，黄奋生教授对“吐蕃”一称的解读最接近科学，但仍未说明“吐”为何为“大”，语源是什么。且在快要揭开千古之谜的瞬间，不知何故，先生又说：“吐”可能是ཁྲུང་(上部)字的对音，使得本来清晰的研究思路，又变得模糊了。当然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承前启后，为学界解读“吐蕃”一称有很大启发，难能可贵。

另外，一种想法，可能来自外界的刺激。笔者曾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某学报主编，他说：“哎朋友！我发现你们藏族‘吐蕃’一词出自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不过我们有多年学习藏族文化，从事藏学研究和藏汉、汉藏文翻译的实践经历，受此刺激，自然有了探讨“吐蕃”一称语源的想法。同时，深感要找到“吐蕃”一称的语源，必须从至今仍然矗立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门前一千多年前的《吐蕃会盟碑》文的藏汉译文翻译技巧、译名原则和汉译的特殊读音特点等入手。因为金石铭文是最可靠的实证材料。

《吐蕃会盟碑》，碑身的东南西北四侧，均镌刻有藏汉两文对照的盟誓内容。其中碑身背面，刻有藏文71列；碑身正面，左侧刻有藏文77列，右侧刻有汉文译文；左面刻有藏文49列，为大唐登坛立盟官僚名位之藏译文，附有汉文原文；右面刻有藏文40列，为大唐登坛立盟官僚名位之原文，附有译文。

我们发现此碑文自身具有的三个特点，为我们寻求“吐蕃”一称的语源提供了足够的有利条件。这三个明显的特点是：汉藏译名的真实性，汉文译名中关中方言特殊读音的真实性；藏汉译名多音字读音的两可性。

一、汉藏译名的真实性，为寻找“吐蕃”语源指明了方向

我们知道唐代的“吐蕃”一称是指当时西藏地区吐蕃王朝的政权称谓。这一汉语名称的读音来源，必然与藏汉翻译有关，与其他语系或语言似乎没有什么瓜葛。那么，它是

53

音

(11) ལྷ་མོ་ཐུང་དཔེ་བླ་མ་ལྷ་མོ་ཐུང་དཔེ་བླ་མ་

(12) ཡོད་པ་བཀའ་ཆེན་པོ་ལ་གཏོགས་པ་འདྲ་ཡོད་

太夫侍平王

中中郎章拂

大书同事

(例三)南侧 49 列藏文中དཔེ་བླ་མ་和དཔེ་ཆ་ལྷ་མོ་之读音:

(37) ལྷ་མོ་ཐུང་དཔེ་བླ་མ་ལྷ་མོ་ཐུང་དཔེ་བླ་མ་

(38) ལྷ་མོ་ཐུང་དཔེ་བླ་མ་ལྷ་མོ་ཐུང་དཔེ་བླ་མ་

(39) ལྷ་མོ་ཐུང་

银大尚金将

青夫书吾军

光工兼卫郭

禄布右大鎡^③

以上三例中汉文都是原文正字(书面语),而在藏文中则有译文口头读音的痕迹。

例一,原文“门下”的“下”[xia],译文中读成了关中方言读音[ha]—哈—𑖀字;例二,原文“王播”的“播”[bo]字,译文中读成了关中方言读音“坡”[p‘o]—𑖀字;例三,原文“大夫”和“大将军”的[da]“大”字,译者都读为关中方言“岱”[dai]—𑖀字。作为内容极为重要的“大蕃”一称中的“大”字,原译文中虽未注明其关中方言的读音,要是注明关中方言读音,它应读作什么?据笔者所知,至今凡能把以上三例中的“下”读作“哈”[ha]音;将“播”读作“坡”[p‘o]音;将多音字“大”,既能读“大”[da],又能读“徒盖切,泰定开一,d、ai—岱”^④。关中地区某些地方的人,至今还把“大”字读作特殊的方言[tuo]或[duo]。就此问题,笔者做过随机抽查或专访。一次在兰州十里店叫了一辆计程车(出租车)回家,师傅是位年轻人。在车上我喜欢与司机交流,问这问那。便问:听口音不是兰州人,老家是哪里的?师傅说老家在陕西咸阳,几年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车,因离家太远,就来到兰州。我便问咸阳方言中把“大”怎么说,司机脱口说叫“妥”[tuo]。但后来在专访中发现陕西兴平、咸阳人,一般称父母或爷爷奶奶等长辈为[duo],叔伯亦可称[duo],譬如向朋友或其他人介绍父母时,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的[dù o]。邻居家的大叔,叫[dù o]叔。再如我要回老家,给妻子说:我要给[dù o]带两瓶酒。另外,在陕西咸阳边远社区的老年人中,还有把“大”称作[tù o]“妥”,父母等长辈叫[tù o]“妥”人的;汉语西北方言的陇西、定西、岷州(岷县)、洮州(临潭)话中,[tù o]有“大、壮、肥胖、结实”的含义,比如说:这根柱子[tù o]得很,有“粗”,也有“大”的意思。

总之,不论是汉语陕西关中方言的兴平或咸阳话,还是汉语西北的其他话中,[dù o]和[tù o]二者在音位系统中属舌尖中音,只有清浊和吐气、不吐气之分。且均有“大”的含义。

因此,我们认为“吐蕃”一称的语源,当然也包括当时那些熟悉或带有关中方言的《唐蕃会盟碑》文的翻译者,他则将由བོད་ཆེན་པོ་译作“大蕃”一称中的“大”字,按照自己的方言习惯,由衷地读作其所耳濡目染的[tù o]—“吐”字,把“大蕃”一称的书面语,自然地译成关中方言的读音[tuo/ba]—“吐蕃”来。正如黄奋生先生的判断:“公元 822 年(唐长庆二

③ 《王尧藏学文集》(卷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32 页。

④ 罗常培著:《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 年 2 月,174 页。

年),拉萨唐、蕃会盟碑上刻有汉文‘大蕃’、藏文 འདྲུག་ཆེན་པོ 的对称字样。但唐朝在一般文字上总不愿用这个‘大’字加给它,于是改用这个‘大’的同音字‘吐’字,称它为‘吐蕃’”。若这个推想符合事实,这不仅符合当时民间将“大”字读作“吐”[tu]字的实际,而且原来在民间口头上传了若干年,也不知它来自的何方的“吐蕃”一称,与“大蕃”一称完全准确的对上号了。通过方言读音与书面语对译,原来互不相连的“大蕃”与“吐蕃”之间的关系就立即发生了变化,二者名称虽异,但所指内容却相同,“大蕃”就是“吐蕃”,“吐蕃”亦即“大蕃”;“大蕃”是“吐蕃”一称的正字或书面语,“吐蕃”则是由汉文正字或书面语“大蕃”译成唐朝的官方语言——关中方言的读音。通过正字(书面语)与关中方言对译这个路径,使我们知道“大蕃”一称译自藏文,“吐蕃”也必定出自藏汉翻译。这样一来,“吐蕃”一称的语源就准确地找到了。

三、汉文译名多音的两可性,给“吐蕃”一称带来了两个误读的缺陷

如前所述,“大蕃”和“吐蕃”均来自藏汉翻译。所不同者,“大蕃”是个半音半译,直接译自藏文 འདྲུག་ཆེན་པོ 的译名,“吐蕃”同样为半音半译,间接将汉文“大蕃”转译为汉语陕西关中方言的读音。二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有一个译名用字没有使用单音字,而错误地使用了多音字,分别使“吐蕃”一称中的“吐”字和“蕃”字都出现了读音两可不定的错误缺陷。

(一)“蕃”字多音的两可不定误读之缺陷

由于《吐蕃会盟碑》文的译者在将藏文 འདྲུག་ཆེན་པོ 译为“大蕃”时,“蕃”字没有遵循译字必须采用单音字将其译作“𪛗”[bo]字,却采用了当时既可读“蕃”[bo],又可读“番”[fan]的“蕃”字,这样就给汉文读者带来了多音字“蕃”在译文中该读什么的困难。从而对译文产生了两可不定甚至误读的现象。关于这种情况,若是见到过将 འདྲུག་ཆེན་པོ 译作“大蕃”这个实例者,他一定会将藏汉两文互相对照,就能将“蕃”字准确地读作单音字“𪛗”[bo]字音来,而不会误读为读为“番”[fan]字的。正因为后来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未见过这个藏汉翻译的实例,乍见“吐蕃”一称中的“蕃”,必然会产生不知在译文中该读什么音的,甚至会出现误读为“番”[fan]的情况。这种误读现象,不仅会在现今一般读者中出现,就连这方面的有些著名专家,有的也会产生犹豫不定的现象。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张吉川研究员在《“吐蕃”,读 tǔbo 还是 tǔfan》一文中说:“我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民族史的同志请教‘吐蕃’的读音,22人中,18位读 tǔbo,只有四位读 tǔfan,其中研究藏族史的有六位,两种读音各占一半。”^⑤由此可见,当年,《长庆会盟碑文》的译者,在译名用字的原则上没有使用单音节“𪛗”字,而使用了多音字“蕃”,则给后来的读者带来了两可不定,以致误读的影响。历史上既然,已将 འདྲུག 音译为多音字“蕃”字,早已约定成俗,故我们将“吐蕃”一称只读[tǔbo]就行了。

(二)“吐”字多音的两可不定误读之缺陷

“吐蕃”一称是对汉文“大蕃”一称关中方言口译的读音。其中,“吐蕃”的“吐”字,是对“大蕃”之“大”字的关中方言的音译。为了不使读者对译名有所误读,译名中的音译字只能用单音字“妥”[tuo],而不能使用多音字“吐”。然而当时没有遵循这个规则,却使用了即可读“妥”,又能读“土”字音的“吐”字,这就给读者造成译名读音两可不定的疑虑。见了“吐蕃”一称,就会出现即可读为“妥蕃”[tuo/fan],又能读作“吐蕃”[tu/bo]的两种可能。但在此读音的发展信息中,将“吐蕃”[tu/bo]一称读成正确读音“妥蕃”[tuo/bo]的并未

⑤张吉川《中国藏学研究》2000年,第二期,78页。

见到一例,而读作“土蕃”[tu/fan]的却屡见不鲜。读音演变到了明清时期,竟将“吐蕃”一称直接读为“土伯特”或“图伯特”了。这些译名的出现,则是当时翻译“吐蕃”一称中的“吐”字时,没有采用单音字“妥”字,而是用了多音字“吐”字所产生的后果。因此,我们得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吐蕃”一称,是有其译音词使用上的瑕疵。“吐”和“蕃”的准确读音应该是[tuo]“妥”和[bo]“𪛗”,合起来应该是[tuo/bo]“妥𪛗”,而不是容易引起两种误读的[tu/bo]“吐蕃”。

四、“吐蕃”读音的衍变

唐代“吐蕃”一称的读音只有两个音节,演变到后来的汉文史料中为什么则成了“土伯特”或“图伯特”三个音节呢?这仍然是个藏语翻译问题。在唐代,藏文^{ལྷོ་མོ་}字中的后置字^{ལྷོ་}还只能与基字^{མོ་}拼读为一个音节,读作^{ལྷོ་མོ་}—“𪛗”,衍变到后来,藏文^{ལྷོ་མོ་}字中的后置字^{ལྷོ་}在拼读中能多读出另一个音节,读作“特”[te]字音了。唐以后,蒙古文化与藏族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蒙古人在使用藏文取名时,藏文后置字^{ལྷོ་}可以另读一个音节,作“特”[te]字的现象非常普遍。直至现在,他们把所取的藏文名字^{ལྷོ་མོ་ལྷོ་},读作,“索特纳木”;将^{ལྷོ་མོ་ལྷོ་},读作“那德木德”等。这些都是很现实的多音衍变例证。

不论是早期两个音节的“吐蕃”,还是后来演变成三个音节的“土伯特”或“图伯特”,其音节多少不同,汉字的字形有异,但内容完全同一;它们出现的时代迟早不同,但来源却同一,即过去两个音节的“吐蕃”是译自藏文^{བོད་ཆེན་པོ་}一称,后来三个音节“土伯特”或“图伯特”,同样也是译自藏文^{བོད་ཆེན་པོ་}一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区别。

五、结语

通过对《吐蕃会盟碑》文藏汉翻译技巧的学习研究,我们在译文多处直接见证了“大蕃”一称译自藏文^{བོད་ཆེན་པོ་}。同时,并在译文中发现,汉语陕西关中方言将“大”读作[tuo]“吐”。说明“大”和“吐”字,字异而意同。“大蕃”就读作[tuo/bo]“吐蕃”,“吐蕃”的含义和正字(书面语)也都是“大蕃”。译文中的多个实例证明,“大蕃”确系译自藏文^{བོད་ཆེན་པོ་}一称,作为“大蕃”的读音词“吐蕃”必然也译自藏文。“大蕃”一称的语源是译自“藏汉”翻译,“吐蕃”一称的语源则为“汉藏”翻译了,在译法上二者互相调了个位置。

“大蕃”和“吐蕃”二者的含义虽然相同,但它们出现的场合却不一样。“大蕃”作为正字(书面语),多出现在藏汉笔译之中;“吐蕃,”作为“大蕃”的口头读音,多出现在口头翻译和口头讲述之中。

“吐蕃”一称中的“吐”和“蕃”都是多音字,过去在译文中产生过或容易产生误读,它们的单音字读音应该是[tuo/bo]“妥”和“𪛗”,而不应是容易产生误读的“吐蕃”。

墨子的政治主张(下篇)

郝洪涛

【作者简介】

郝洪涛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尚 同

尚同,即上同。人们的思想应当统一于上级,并最终统一于天。

《尚同上》指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刑法与政治)之时,盖其语,人异义。”“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这就是各执己见、没有统一思想的结果。

“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行政长官),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国君”,“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无论听到好的或不好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这样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并以上级意见为准。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天子唯能壹同(统一)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灾祸)犹未去也。”最后的裁定者是有最高意志的“天”。

《尚同中》强调:“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尚同下》提出尚同的前提:“凡使民尚同者”“必疾爱(深受)而使之,致信(诚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结论:“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而行的行政管理原则。

尚同提出选择贤者、仁人担任各级领导,自下而上同于“义”,这是对当时贵族统治的批判,是墨子针对国家混乱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另外也有人指出,尚同是集权主义。

尚同思想亦有时代价值。面对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培育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努力奋斗!

节用、节葬、非乐

节用、节葬、非乐,提倡节约利民。这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也是墨子的经济思想。

节用,节约用度,反对奢侈浪费。

《节用上》指出:“去其无用,足以倍之(去掉不实用的东西,国家财利增加一倍)。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有益于实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通“得”)不劳,其兴利多矣。”

墨子从制作衣服、建造宫室、制造兵器、打造车船等方面细化了节用标准。“其为衣裳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芊不加者(漂亮而不增加实用)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凡为宫室加固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兵器)何以为?有甲盾五兵者胜,无有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不加者去之。”

文章最后点明主题:“去无用,之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辞过》是对《节用上》的补充。墨子通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养妾)五个方面的古今对照,得出结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节用中》还强调:“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较少。墨子提出节用,其心至善至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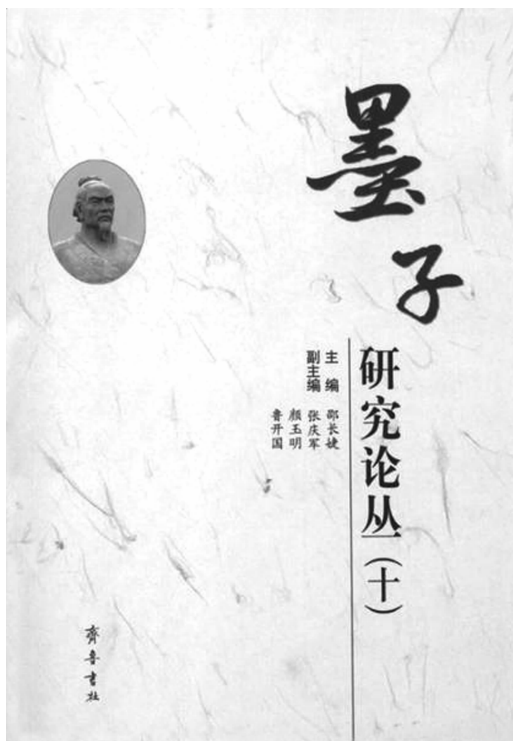
节葬,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这是节用的一个分支。《节葬下》集中论证这一主张。

墨子站在治理天下的高度,提出要做好三件事:“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但“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所以“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

墨子以严密的逻辑推理阐明厚葬久丧的危害。“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请求)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墨子指出:“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三尺)之亩,则止矣。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并以尧、舜、禹三代圣王的葬事举例说明:“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

墨子无情地揭露了当时贵族大办葬事的现象。“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阼(纹饰皮革)三操,壁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衣衾)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差通(墓道),垄虽兄(当为‘况’)山陵。此为辍



【图解】

《墨子研究论从〈十〉》书影

(荒废)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这与圣王之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结论:“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内心真诚)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葬之为政。”

节葬,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非乐,反对奢靡音乐,提倡节约人力财力。《非乐上》专论这一问题。

作者先立准则:“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证“为乐非也”(从事音乐是不对的)。(一)“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二)“姑尝厚措(增加赋税)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三)撞钟,“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亏夺民衣食之时。”(四)听音乐,“废君子听治(治理政务)。”“废贱人(平民)之从事。”“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五)歌舞,“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绣。”“亏夺民衣食之财。”(六)观乐之害,王公大人“即必不能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士君子即不能“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农夫“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妇人“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

作者宣布:“今天下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的非乐思想否定儒家的礼乐,批判贵族享乐生活,也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我们辩证地看,音乐有娱乐和教化功能。音乐可以传递感情,振奋精神,鼓舞斗志,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有医疗保健作用。人类生活不能没有音乐。当然,对古人不可求全责备,看问题不要脱离时代背景。

墨子的节约利民主张,意义在于重视发展生产,尊重劳动成果,培养节俭美德。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中央要求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墨子节用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节用也是持家之道。

非 命

非命,不认命,命非注定,事在人为。

《非命中》首先提出衡量言论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故使言有三法”:“有本(本质)之者,有原(情理)之者,有用(实践)之者。”办法是:“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征以先王之书”;“发而为刑政(刑法政令)。”

然后进行论证:“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发布政令)也,则岂可谓有命哉!”

“初之列士桀大夫(古代的有功之臣与杰出的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而天下皆曰其力(他们努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

“是故昔日三代之暴王。”“外之驱骋田猎毕弋(打猎捕鸟),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

国家百姓之政。”“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僇之中。”“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恶恭俭而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曰：我命固且穷。”“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反复粉饰命定之说，用来教育广大愚昧纯朴的人民）。 ”这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命定论的本质。

结尾引用历史典籍得出结论：“命者，暴王作之（天命是暴君伪造的）。 ”“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墨子还在《非乐》中指出：“赖其力者生（生存），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又在《非儒下》批判了天命论。

墨子的非命与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针锋相对，儒家的天命论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麻醉剂。墨子主张事在人为，提倡个人努力，尊重人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彻底否定天命论。

《非命中》的“三法”，含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是文中的一大亮点。另外，墨子《经说上》把知识分为“亲知”、“闻知”、“说（推理）知”三类，把同分为“重同”、“体同”、“合同”、“类同”四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认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应当指出，《非命中》与《天志》《明鬼》自相矛盾。但应理解墨子大讲天志、明鬼的良苦用心。

非命，倡导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希望人们自主、自信、自强，通过不懈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历史地看，这一观点弥足珍贵。

法 仪

法仪即法度。泛指一切标准、规范或制度。《法仪》一文专题论述。

《法仪》先提出法的重要性。“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百工（工匠）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悬垂）。 ”“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聪明）也。”

《法仪》论证法的标准：法天。“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老师）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法（效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度）。 ”“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以什么为法度？“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而不自居），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衡量）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残害）也。”“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详焉。”

《法仪》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并发感慨：“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法仪》中百工从事一段话，体现了程序的重要性，是程序法的萌芽之一。

《法仪》“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尚同上》“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这与法国 18 世纪思想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人人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思想接近。而墨子比卢梭早 1000 多年。

墨子早于法家。他的法治思想有先驱作用。

墨子的法治思想有待深入研究。

五 谷

五谷,在《墨子》中没有专论,也没有这个题目,而见之于《七患》一文中。

《七患》指出:“国有七患。”(国家有七种隐患)其中,“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施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墨子把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摆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上。

《七患》论述五谷的重要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赖以生存)也,君之所以为养(养育百姓)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役使),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努力耕种)也,用不可不节也。”遇到粮食歉收,官员俸禄随之减少。遇到“饥”年,“则尽无禄。”

墨子认为:粮食收成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故时年岁善(丰收),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荒年)则民吝且恶。”

墨子认为:有自然灾害,五谷不可能年年丰登。既要努力耕种,又要节俭。而且必须有储备。“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按农时耕种),而自养俭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

墨子从战略高度讲“储备”。“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武器)者,国之爪(利爪)也;城(城池)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工具)也。”“故国离(遭遇)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这是墨子的大局观。

墨子提出解决“七患”的方案:集中发展农业,国家要保留有三年储备。

我读此文,有两点感悟:

(一)有备无患,有忧患意识,防范风险。

(二)农业是基础。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往今来,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任何时候不能放松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墨子还在《非乐上》《鲁问》中表达了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热切关注。

当代,我党高度重视“三农”工作。2004年,粮食直接补贴全面推开。2006年,正式取消农业税。今年2月19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1个、新世纪以来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现在,全国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政策,符合国情,深得民心!

以上是我对墨子主张的归纳、诠释及点评,吸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个人不成熟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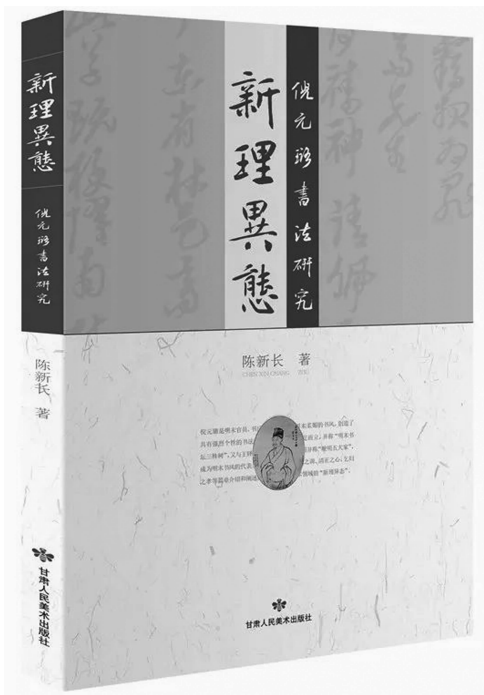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这正是我写此文的目的,不足之处,祈求读者指正。

【作者简介】

陈新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丝绸之路研究会副
会长

【图解】

《新理异态——倪元
璐书法研究》书影。



“澹”的审美意义

陈新长

“澹”，许慎《说文解字》注曰：“澹，水摇也。从水，詹声。”又“薄味也。醴之反也。”“西部”曰：“醴，厚酒也。”从这部最早的字书的解释来看，“澹”的本义为水波摇动的样子，又可引申为味觉上的薄味，即味道清淡之义。进而引申为恬静安定的心境，如贾谊《鹏鸟赋》：“澹乎若深渊之静。”从形意角度，“澹”“从水”，从“水”的意涵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视觉上的波纹微动，安详自然甚而深沉之貌，如《老子》：“澹兮其若海”，白居易《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一是“水”之清淡的味道，即味觉之中的薄滋味，不浓厚，如《庄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而这种清淡的水味，既可能指一种相对于咸的淡味，如《韩非子八说》：“酸、甘、咸、澹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也可能指在甘、酸、咸、苦、辛五味之外，指每一种味道的程度之轻。自此引申开去，还可以引申为视觉上的“浅”，与“浓”相对，也可以引申为情感之淡等等。

而在我国古典艺术美学中，“澹”主要是指诗歌书法绘画语言色彩用墨等方面表现出的素朴平淡的审美特征。如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塞城朝烟澹”，又如“澹月”、“澹云”等古典诗词意象等。从艺术心理的角度而言，语言色彩等方面的“澹”，往往联系着精神上的“澹”，即创作主体的淡然世事，超脱世情的格调。例如白居易称赞韦应物“高雅闲澹”，即是精神之“闲”与表达之“澹”的融合。

从艺术风格上，对“澹”的崇尚最早可追溯到老庄哲学。最初的“澹”，在老子那里是以“无为”思想为基础，体现道家崇尚“自然”的人格追求。“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

口,澹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澹乎其无味”指出要说明“道”是何情状,任何语言都会是乏味的,它无法与“乐”的动听和“饴”的味美相比。所以“道”的特征就是“澹”,它“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是在所有感官把握和功利用途之外的。庄子也以“澹”名道:“澹澹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以一种描述性说法,指模糊不清的状态。“澹”因为与“道”的联系而被赋予了审美上极高的地位。为了进一步说明,老子还批判了与“道”相对的世俗之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样,“澹”作为道的特征就是“其无味”,耀目的色彩、动听的声音、鲜美的味道,都会造成对“道”的遮蔽。因为“道”超越性地高于一切现实中的存在之物,“道”的至高无上的特征不是现实中可以比较的高下差别,而是一种生成性的、本体性的,所以“澹”虽然“无味”,但它高于一切有“味”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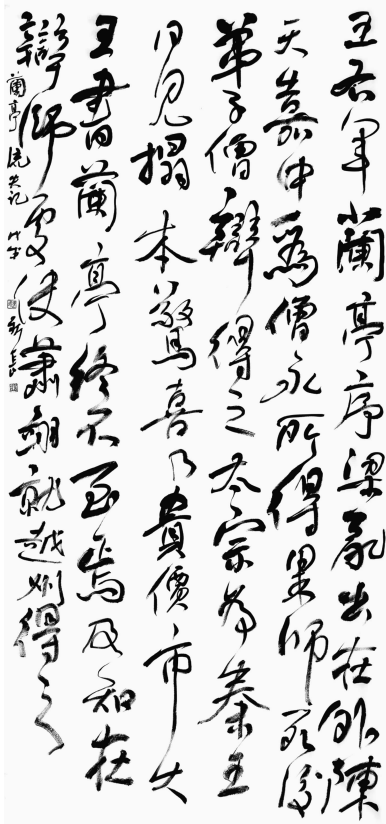
作为“道”之特征的“澹”,由于其超越于五色、五音、五味,因而并不与它们构成平面的对立关系。这种超越性特征,是道家思想所特别赋予“澹”的,也是“澹”最终能成为重要的中国美学范畴的原因。和“澹”的这一特征相联系甚至具备同样含义的,是老庄哲学中出现的“朴”、“素”。在老子哲学中,“朴”和“素”主要指一种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如:“敦兮其若朴”(《老子·十五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而庄子则进一步将“素”、“朴”明确为对自然本真的复归:“夫明白(入)[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庄子·天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布备。”(《庄子·天地》)庄子既认为“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又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就明确道出了“澹”在美学内涵上与“朴素”有着极强的一致性。

总之,尽管老子没有直接从美学形式上论述有关“澹”的艺术风格,但其中从“自然”所体悟出“无为”的人生境界,则间接地成为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人生及人格的写照。老子从个体生命对“无为”的人生态度出发,表现出“复归于朴”“清静”“朴素”的“自然”人生观,提倡顺应自然、简单真切,罢黜一切不必要的铺陈、藻饰、雕琢的“质朴”的审美情趣。并且,老子对“虚和实”“有和无”的辩证阐释,揭示了“澹”的内蕴,即惟有“涤除玄鉴”“致虚极,守静笃”,才能达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换言之,“澹”在审美上所追求的落花无痕的旨趣,其实正是从老子所指向不可言传的艺术境界——大音、大象乃为美的极致。经由庄子的进一步阐发,明确为“素”“朴”的艺术风格,成为闲逸时如落花无言的审美特征,借由魏晋玄学为桥梁,与古典艺术创作相接触,最终形成了中国艺术寓华于朴的“澹”的审美传统,成为我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

从我国古典美学的艺术实践来看,“澹”的艺术风格主要通过主客体融合、天人合一这样一种自然界事物的状貌样态被塑造。从小桥流水、清风明月、疏影深潭、水淡墨薄、朦胧景象等艺术形象的选择中,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融和谐。这一点与西方的审美旨趣相比就能见出特点,比如同样是感受沧桑巨变,欧洲文学家朗吉努斯以浩瀚壮阔的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举例,说明崇高是来自“伟大心灵的回声”;而陶渊明却漫步河岸,“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寻访世外桃源,对抗苦难人生、艰难世事。前者似巍巍高山令人望而生敬,崇高而激越斗志;后者如涓涓流水抚慰人心,澹泊而沉静释怀。

【图解】

陈新长书法



将感性的、直观的外在视听转向理性的内在视听,强调的是主体能够保持心灵和精神的自由,澄怀观物,体悟到美的对象和美的真谛。在中国传统艺术美学中,平淡的外表暗示着人格修养的充足,正如玉石一样“暖暖内含光”。而此正合乎“澹泊”艺术风格所需要经历的心路历程。中国尚“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大体沿袭了老庄以来所追求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传统审美习惯。

“澹”的审美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理性精神。其追求的是个性心灵的自由,达到“大味必淡”的审美感受,形成了感性、理性和志性三位一体的审美结构,更具有空灵性和可透视性。它体现的是东方文化“天人合一”、“心物合一”、“虚实相依”以及“中和为贵”的整体思维和追求心灵超脱、容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这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审美体验,是一种精神内向性的审美活动,它把人的思想从不和谐的外在世界拉回到和谐的内心世界,强调“内圣”、“忘我”与“和谐统一”。“澹”的审美精神表现为历代中国艺术家所标榜的那些艺术理想:沉着、含蓄、冲淡、自然、质朴、高古、旷达和超逸,推崇“出污泥而不染”的生存状态,追求“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和“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审美理想。

“澹”是一种理性哲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辩证统一思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澹”的审美追求人类的自我克制。即:自我节制社会物质生活需求,自我节制社会精神生活需求,并且努力使这种欲望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而勿使其任意膨胀,这是一个自觉的精神活动过程。“澹”的审美追求更看重人的精神感受,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它是一种高、古、清、雅、逸的审美思想,是一种“胸罗宇宙,思接千古”的超越物象之外的对人生和宇宙的独特空灵感悟,这对人类的永续发展无疑富有积极的意义。

“澹”的美学蕴含的起点是从对“自然”的崇尚开始,向往天然本性的真、善、美。在艺术实践中,艺术家通过在主客体的融合中表现出“自然”的审美内涵来体现“澹”的意境。庄子的“人与天一也”的命题,渗透进了后世无数文人的创作与人格写照中,从谢灵运“明月照积雪”的山水诗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让人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司空图将“自然”位列 24 诗品第二,成为后世立主作则,表达了物我合一、直取自然的艺术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艺术创作。

从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角度看,“澹”表现出的是一种含蓄内敛的审美取向。从艺术思维方式出发,古人多采用“感悟”的方法体味“澹”,这种思维强调“感悟是感应的、直觉的、生动形象的,同时,感悟又是理智的、抽象的”,这使得“澹”的艺术风格注重在“表现”上的美感,而非“再现”上的准确。譬如庄子的《天道》篇。庄子所论的“虚静”,其实就是要

有关天河注水的短歌

崔俊堂

【作者简介】

崔俊堂
中国作协会员

一

薄雾中撩下雨丝，窗外的月亮这时露出了小半个笑脸。暖暖的月光像是天上的河水。

卦台山，伫立在我眼前。我此刻在迎接着一位慈祥的历史老人。而眼角的皱纹是一台一台、逐级而上的梯阶吗？千年不老，我看不清时光倒流的影子！头上的青丝是一棵一棵相互挽扶的草吗？一朝流光，我数不清生活沉重的份量！

画卦台，是历史，更是展现。画出秋收冬藏、云腾致雨的景观，而露结为霜、霜一样的思念呢？仰观天，伏羲也走过来了，他的老气是一块风胜龙石，如松之盛，我看出似兰斯馨的衣袂飘着。

画卦台，是心系，更是根兴。画出陈根委翳、散虑逍遥，而落叶飘飘、梦一样的凝望呢？俯察地，伏羲还没有走远，他的朝气是一方洗石真迹，川流不息，我听见了犹子比儿的教诲。

画卦台，气象不凡，高山仰止。今天，我低下了头，一路上走着，走在几千年留下的一条老路上。现在，有多少人暗恋和祝福？有多少人守望和拼搏？其实，老祖先也是一位子民，只是一只走遍山山水水的脚，串联起来的是每一个子民的心田。其实，圣者也是一个儿孙，只是一双望尽天涯路的眼，收藏了每一村户的门关。

育黎伏首！盖此身发！在我高山仰止、仰望卦台山的目光里，山连着山，每一个山头抬起神圣的龙头。在我高山仰止、仰望卦台山的腹稿上，水融入了水，每一滴水留下寻觅的龙脉。

二

绵绵细雨像是天河注水的无数把梳子，悄悄地梳着天地和星星点点的游客。在羲皇故里，我体验到一把梳子一把米。也许，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四季丰收的祝福就这样一点一滴铺开了。

一对又一对儿女走过来了，他们在谈笑故里吗？我看重的是来自谈笑的幸福，似乎

在见证着龙和凤两块大木雕所传递的美满。

骑马者下马,乘轿者下轿。前来寻根问祖的人陆续多起来了,走走停停,谁也不愿意离开。他们凝神的注目像是这羲皇庙檐前的两个红灯笼,亮了又亮。而一些惊讶和叹息像是这庙周围的古宅子,古老中散发出沉重。

历史就这么愧了愧脚,历史的车轮从没有驻停。岁月就这么摇了摇头,岁月在挥手时从来不会让步。伏羲的时代永远看不见了,兄妹联姻的故事至今流传。我只能想,我们都是始祖的儿孙。

天下衙门朝南开,而伏羲带着儿孙们所盖的房子也坐北朝南,这也许是自然的法则。在这法则的中心,他划定了一个“一”,用来探测日月、涉足山水、建造房屋、识别烟火,多么伟大的壮举啊!今天,戏楼上没有人演戏,鼓楼里没有人击鼓,来鹤厅不见鹤子飞来,我只是看见一条坐北朝南的主线,在延续着这个“一”。难道这是一画开天吗?难道这是道启鸿蒙吗?我看到:在目不识丁的愚知里,走来了第一个智者!在漆黑的夜晚放出第一颗亮星!在满纸烟云上划下了第一道路线!在人生的空无中走过文明的第一步!

三

一阵大风突然横卷过来,微弱的雨丝也突然带着劲口擦过伏羲庙。

请允许我赞歌一回华夏第一庙吧!有人自豪地讲,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八千年历史看甘肃。历史不能改写,这种讲解只能说传递着对祖先迈向文明、创举文明的神往。在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羲皇故里像是一轮红日,定格在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天河注水,长河流过的地方,我似乎看见伏羲浓眉大胡,赤肘跃足,树叶为衣,手托八卦,目光如炬,灵气如水,带领着他的子民共同建设家园。

千载恭传开世纪,万家肃敬辟鸿蒙。在这里,神往和肃穆是没有功利性的。有好多游客惊叹起来了,原来,一棵死去的千年古柏上生出几枝新枝,像是几条龙吻着伏羲庙脊。

是啊!时光的背面,一棵古老的柏树用复活的心在见证伏羲的奇迹。宇宙洪荒,伏羲唤醒了沉沦,识别着万物,决断起善恶。作为部落酋长,他依然住在这孤陋的房子里,那么安然,那么宁静,似乎化解了一回又一回愁苦,照旧用渭河水洗着一场又一场梦幻。

四

雨大点子的刹下来了,还有几束阳光许下明媚,真是三光无语,八卦存神。

我眼前的几十棵古柏岿然不动,更像是伏羲,在观天地的时候,承受着无情击打,坚守着脚下的每一片土地,迎接着每一场祭祀。游客一阵一阵,已赶上春祭,他们还在赶着秋祭吗?

一场庙会的热闹夺不走永远的怀念。我也举起了香火,缭绕的烟雾中,我想象蛇身马首的伏羲。也跟着询问导游,为什么把一个部落酋长塑成这样呢?她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是的,蛇能起死回生,马能疾驰四野。也许,这是后来的子民在用图腾崇拜,纪念这位带领子孙们迈向文明的先祖。

雨停下来了,阳光大片大片的洒开了。在对伏羲的感怀里,人的努力会添加空白的日子,使其更加充实,就像是这一对叠在一起的磨盘,沉重而厚实。我真希望这对磨盘转个不停,因为,在那个年月,生活富裕了,磨盘才能转起来。至于,已成婚的摸一摸磨盘,

会更加和谐,这也是对生活的向往吧。

大化首推羲皇启,万象同归一化开。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为这副对联点赞。

五

大片大片的云彩压得半山密密实实的松树喘不过气了,太阳躲在云的背后,一阵凉风卷走了一川的热浪。

行走在麦积山石窟的栈道,抬眼细看那一座座佛、一个个崖洞石窟,是故事,是历史,是工艺,是智慧,是过去,是人生……这一千五百年的云烟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这座“东方最大的泥彩塑艺术陈列馆”将怎样延续呢?

“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在感叹这建设工程的浩大和巧夺天工的玄妙时,像是听一部天书。回头远望,除了大自然赐予的山山水水,天书的书写者依然是一个善慧的人,他们也许载入史册,也许被历史湮没。

劳动者创造了历史,智慧者改写了历史。正当我以劳动的手掌素描日月这对好儿女的时候,一大群鸟飞来了,又一大群飞来了,为突然生发的一块一块的烟云缀满了无数个惊叹号!

麦子一茬茬熟过了,像是一个“大麦垛”似的麦积山似乎还陶醉在越来越重的烟云之中,经久不衰,再化神奇。草开旧路沙浪在,日照新池凤迹重。烟雨与重光之间,苍松与鸟鸣之间,芳草与化石之间,真是是无等等,摆在眼前这一切就这么在迈开双脚的日子里过去了!只是那个石窟里一只双头的共命鸟,一只头叫睡眠,另一只头叫睡觉,因共同吃下相互恶斗的苦果,再也不能复活。

先天始始,后世问津!厚德载物化作新时代合作、发展、共赢的新篇章,其深远的意义像是这两排大槐树散发着馨香!

(后接第 76 页)第三行“翠”字,最后一竖笔拉长,还有三处两字相连,还有个别字使用了草法。这样的处理就使得整体作品于凝重之处洋溢着灵动流美的风采。而这一切又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的,了无痕迹,浑然天成。

从张九畹的这副作品来看,其成熟、高超的笔墨技巧,醇厚古雅的艺术格调,放在当时全国书坛来衡量,也是一流的,是毫不逊色的。

五、结语

传统文化是民族情感和精神的重要载体。地方历史文化无疑是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对于地方乡贤的研究、推介,为我辈应有之职责。乡贤是一个地方历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人物群体,他们的嘉德懿行,他们的传世著述,对于“培养士气,激励人心”(《九畹先生乡贤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更是“记住乡愁”的最佳介质。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乡贤与我们渐行渐远。渐行渐远的不仅仅是历史,更重要的是情感。面对乡贤,任其泯灭,不能使其“起顽立懦,留先正之典型;发潜阐幽,示乡国之模范”(《九畹先生乡贤录》),淡然处之,良知的愧疚,将是永远!

【作者简介】

韩甦毅

甘肃省文史馆研究员
西北师大古籍所特聘教授

吴佩孚在甘肃陇南

韩甦毅

1931年的甘肃和全国一样，也是军阀盘踞，各种政治势力勾心斗角，还有民族矛盾纠葛其间，关系错综复杂，时隐时现，形势动荡不安。这年8月，在四川休养的吴佩孚得到甘肃部下的邀请，带着夫人、公子、幕僚200多人，由四川松潘南坪（今天九寨沟县）进入陇南文县。

当时的陇南还是川军的势力范围。吴佩孚进入文县后受到汉军统领杨抚权、县长郝墨庄和我祖父韩定山的欢迎和接待。

我的祖父韩定山，文县人（1893—1965），同盟会员，曾任冯玉祥十二军部秘书长，参与北伐，1930年返回故里办教育，成绩优异，被甘肃省聘为文县教育局局长，后任文县参议长。1931年8月底吴佩孚抵达文县，祖父韩定山以乡绅身份一直陪侍。

文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教育比较落后，小学虽有数十处，也是徒具形式。吴佩孚非常关心当地教育，多次过问，与祖父深度交谈，祖父一一解答。

吴佩孚在文县休息期间，杨抚权、郝墨庄和祖父日日陪侍。县上听说吴佩孚写的一笔好字，人们纷纷争先恐后索求吴佩孚的墨宝，市面上一时“洛阳纸贵”。祖父在吴佩孚身旁，目睹其丰采：他接纸到手并不折叠，一口气写下了50多副对联，十多幅条幅，不曾有倦容。吴佩孚提起笔来，不问左右，即可照求索者的姓氏特点，写出巧合的词句。如给一个李姓的人写的是“西当太白有鸟道，东来紫气满函关”，给一位王姓写的是“登楼文士思国家，誓墓将军惜年华”，给一个大烟鬼议员写的是“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可见吴佩孚能文能武，才华过人。

吴佩孚也给祖父留下了墨宝：“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此对联祖父找人装裱后一直挂在家中，在“文革”中被毁，十分可惜。吴佩孚在离开文县时将自己的文房用具：端砚、铜墨盒、铜镇尺留送与祖父，这些文房用具一直陪伴祖父，并留传至我的手中，每每睹物思人，让人心中生出无限感慨。

吴佩孚在文县待了10天左右，之后由杨抚权和祖父韩定山陪送到武都。

吴佩孚在武都停留了20多天，期间与地方政要、社会贤达广泛接触交流、应酬，也留下了很多墨宝。

9月29日从武都动身过成县，10月8日抵达天水。当时天水政要马廷贤热情招待，极其奢华。吴佩孚下榻天水九间楼，房间布置的华彩夺目，行辕内外辉煌如昼。一时天水市场上海味、鸡鸭被搜买一空。吴佩孚将军在水天期间与很多人见面交谈，其住处门庭若市。

在水天呆了10多天后，10月26日，吴佩孚一行200余人从天水起身，经陇西、渭源、临洮，于11月7日下午抵达兰州。当时兰州各种势力角逐，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回族及军阀

之间矛盾重重，异常尖锐，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雷马事件”：甘肃的保安司令雷中田发动政变，扣押了甘肃省主席马鸿宾。1931年初，马鸿宾任甘肃省主席之后，地方势力割据一方，甘肃政令所及不过兰州附近各县而已。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认为马鸿宾懦弱无能，欲取而代之。时任甘肃省政府委员的马文车，在甘肃省府7月改组时，未能得到省主席或民政厅长职位大为失望，欲利用雷中田的实力来改变甘肃政局，取得自己的地位。8月25日，雷中田将马鸿宾扣押，自任甘肃省保安总司令，同时由马文车代理甘肃省府主席（马鸿宾是战死正阳门的甘军首领马福祿之子）。一时间，兰州剑拔弩张，战火即将开启。西北一部分人相信吴佩孚，均感到“雷马事件”只有吴出面调停，才会有妥善了结。于是，便有“邀吴来兰、调解雷马事件”的急电给远在四川的吴佩孚，使吴佩孚的北上兰州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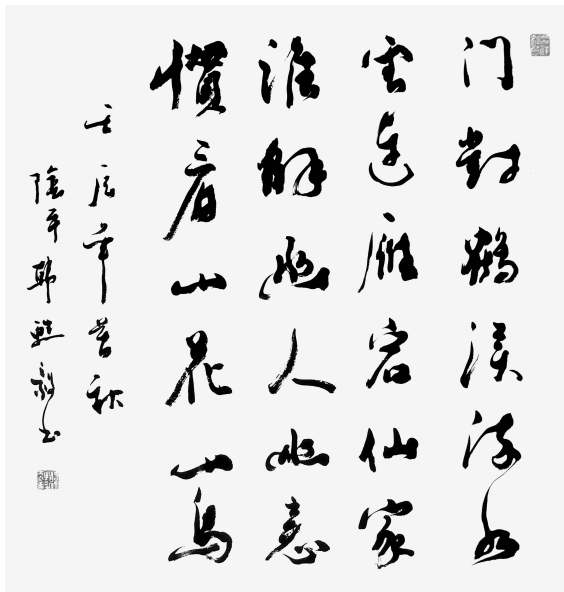
事变发生后，马鸿宾之子马立清奔赴西宁，请马麟前往营救。

马麟遂带随从人员行至距兰州70里的寒水堡，派青海省教育厅厅长杨希尧等持函会见雷中田。雷要求马麟来兰州面商一切。马麟回函提出，亲自赴兰必须带600骑兵进城，遭到雷的拒绝。马麟调停无效，遂取道河州、循化一带，转回西宁。后由吴佩孚到兰州从中说项，始将马鸿宾释放。

8月30日，蒋介石为此致电雷中田：“连日接报告谓马主席被禁，如果属实，实属反叛中央，目无法纪。限文到即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施职权。中央命令，绝不更改。兹责成兄查办此案，并将查办情形，火急电复。”

吴佩孚是打着调停“雷马事件”到兰州来的，无论多大困难，他得把这件事办成。调停不成，他便寸步难行了。所以，他不惜一切努力，去办这事。加上中央政府的严责和各派势力的政治权衡及地方贤达的斡旋，“雷马事变”终被和平化解。之后，吴马上派政治处长刘泗英并让他以四川省代表的名义和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代表协商，达成共同意见，不久，即发出了“拥护吴佩孚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的通电。吴佩孚在兰州，终于取得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头衔！

但吴佩孚的入甘，又引来陕军入甘，互相火并，争夺地盘，从而加剧了甘肃的纷乱局面。



【图解】

韩颋毅书法

【作者简介】

甘肃省府文史馆研究员
西北师大古籍所所长、教授

文化自信的先行者刘尔炘

漆子扬

刘尔炘生活在政权新旧更替、现代学术兴起的历史巨变时期。那是一个没落与新生、死寂与蓬勃、衰败与崛起、独裁与民主、沉沦与奋起、贫穷与振兴共存的时代。先生在晚清官场拼打不到三年，看透了王朝的腐朽，吏治的肮脏，官吏的堕落，当这个烂透的王朝走向死亡的那一刻，虽然先生依旧流露出些许的眷念痛惜，但他无疑是参透人生、透彻世事的智者，辞官回里，义无反顾，给自己确立了四大人生目标：远离官场、教书育人、兴办公益、著书立说。从此将全部的生命和甘肃的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学术事业紧密连缀在一起，风掣道德学问文章的大旗，大力兴办书院学堂、文化机构，弘扬程朱理学，以此践行自己失去政治依托之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这是先生处处弘扬宋明理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他活在人世的精神动力。

先生自京归来，一直生活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兰州，但他紧随时代步伐，思想开明，倾心学问，教书育人，尊崇孔孟之道，践行知行合一，主张学以致用，反对脱离社会实践而空谈学问。如《劝学述言》一书，反复劝勉学生树立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力求实学。告诫学生读书要“静参于书册之中，默会于书册之外，遍观于天下之物，体验于一己之身”（《劝学述言·励行》），一个人“必能知过，方能改过。改过在乎有勇，知过本于无私”，凡“悔过愈真者，其人愈高；反己愈切者，其人愈大”。要求学生读书务必推研究竟，融会贯通，修养自身须寡欲寡言，剔除杂念，忘怀名利，做到“坦荡宽平，心境如光风霁月”。（《劝学述言·立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能放弃人性的底线。《劝学述言》涉及为学为人修身立言，行文精妙，字字珠玑。

先生既是一位与时代潮流同步前行的教育家，又是一位对中国传统学术、学问具有清醒判断的思想家。在儒学面对西学和西方科技的挑战面前，他坚守中国传统学术，同时积极吸收西学的进步理论和思想，阅读研究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对比中西学术思想、哲学思维的异同，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总结概括传统儒学在培养人性伦理道德方面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先生的文化自信具体表现在对儒学的研究、坚守、践行和宣扬以及对西学衍生的“机器劫”批判方面。

刘尔炘先生的文化自信首先表现在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学术宗旨方面。他认为一切学问的根基就是经学，是服务社会的“道”。无论教学还是学术研究，先生始终

把倡导经学、教化人心放在首位,亲自给学生讲授《书经》《易经》《诗经》《春秋》,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修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做一个坚守正义、是非分明,“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的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反对读死书、死读书,鼓励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先生认为以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代表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世人崇尚的价值观,即使社会有盗贼也容易整治。最可怕的社会就是极端思想盛行,人们是非观念混乱、颠倒黑白、道德沦丧,谋取名利不择手段,社会成员互相欺骗,则全民皆为盗贼,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力。因为“天下事坏于小人者十之二三,坏于常人者十之七八”。(见《果斋日记》卷四)当人们普遍道德人性出了问题,社会也就不可能健康。

先生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出发,在《果斋日记》卷七曾呐喊道:“陈义愈高而为祸愈烈。”他认为口口声声阔论大义者,声音越高,影响越大,祸害也就越强烈。今天党中央多次斥责的两面人正是如此。先生针对民国时期大小军阀标榜自己为“伟人志士”的丑相谴责道:“父老子弟之脂膏已竭,而伟人志士之欲望无穷,敛脂膏以供欲望,是糜生命以填溪壑也。”(见《果斋日记》卷七)揭露他们浩劫国家人民的罪恶。

其次,先生的文化自信还表现在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方面。他把学习儒学作为提高民众整体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期望国人从根本上改造“有善有恶”,达到理学提倡的“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良知和格物境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先生于宣统三年(1911)奉命将兰州育才馆和简易师范改建为存古学堂,并任学堂监督,招收青年才俊文县韩定山、正宁赵元贞等,为甘肃各地的师范学堂培养经学、国文、历史教员。根据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的教学理念,亲自讲授黄宗羲《宋元学案》、顾炎武《日知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等课程。

其三,先生的文化自信还表现在对儒家思想的捍卫和宣传方面。先生的确是甘肃近百年来一代儒学大师,时代需要这么一位高举儒学大旗前行的探索者。民国初年,社会本已混乱不堪,西方科技、学术思想的传播又激发了各种思潮的兴起,一时乱象丛生,青年学生无所适从。先生站在儒家思想的制高点,解析青年思想纷乱的缘由,人生观价值观迷乱的因果。他期望用儒家的思想作为救世的良药。在他心中儒家至高无上,理当居于世界思想领域的高峰,一切与此相悖者必属另类。他甚至蔑视西方哲学。他说“欧美各国若无物质机械诸科学之发明,创为制造致之实用,则所谓哲学者,亦与吾国先秦诸子之诡辩,宋明诸儒之争门户、别异同、玩弄光景者同一,托诸空谈、寄诸想象耳”。(见《果斋日记》卷八《壬午癸亥》)我们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考量,先生之所以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宣言,无非想为社会提供一剂救世的猛药,期望人心一统,共同谋取人类福祉。其中必然包含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砸烂孔家店过激行为的反动与纠正。先生以捍卫儒家思想或者说捍卫传统文化为号召,反对偏执与极端,告诫人们不能数典忘祖。

先生面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批判传统文化,以及西学对国学的强力挤压,告诫人们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国体如何更改,孔孟之道及其传承的载体不能改变。“尧舜孔孟之道,布帛菽粟也。饮食如何变更,而不能离乎菽粟;衣服如何变更,而不能离乎布帛;政教如何变更,而不能离乎尧舜孔孟之道。”(见《果斋日记》卷三《丙午》)他曾经担忧汉字汉语被洋文取代,高声呼喊汉字汉语一旦毁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然走向灭亡,最终中华民族也将万劫不复。在《果斋日记》卷八感慨道:“文言亡,则吾国之经史辞章俱亡。”

经史辞章亡则中华亡,是千古亡国之最痛心者。”此处之文言特指汉字汉语,经史词章特指以汉语为依托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灭亡了,即使国家实体存在,内核全然不是中华之国。先生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其四,先生的文化自信表现在以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教化挽救走向迷途者的良药。他一生孜孜矻矻,以传扬儒学为己任,其目的并不在于就学论学,而在于用传统儒家的仁道和宋明理学的天理约束规范现世内心空虚、盲无目标的人,尤其渴望借此约束、劝诫、警告无法无天、心无敬畏、毫无良知的地方军阀,意将他们关进仁义礼智信的笼子。这是先生构想的社会理想的一个方面。虽然先生当时无法用精确的民主话语对中国制度提出大胆的号召和构想,但凭先生的智慧已经明晰地意识到权力必须得到制度的钳制,可惜的是形同虚设的民国制度对军阀政客而言不过是杀人越货的朦胧月色。先生之所以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以现实现象解说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无非认为限制军阀政客、社会邪恶等最有效的手段莫胜于儒家的仁道。

其五,先生文化自信的又一表现是对西方“机器劫”的批判。他认为儒家思想是“道”,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西方科技是“标”,是服务社会的“术”或者“法”,“道”与“术”一个属于形而上,一个属于形而下,“道”高于“术”。他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主张科学技术运用于发展生产力,服务社会,服务人类。但先生对科学技术作为双刃剑的另一面保持着清醒的警觉,揭示科技被战争贩子、独裁政权利用沦为杀戮人民机器的危害性,于是奋起批判科技威胁人类文明的负面效应,适时提出“机器劫”的命题,呼吁人们务必认清高科技的双面性。

其六,先生的文化自信还表现在用儒家的道德准则衡量社会财富是否合乎道义。社会财富因工业化革命过度集中于资本家手中,并且机器的诞生导致传统技术工人大量失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他说“因机器聚敛而有资本家,因资本家而生均产主义之学说”。(见《果斋日记》卷八《壬午癸亥》)他认为资本家因先进机器生产而聚敛财富,又反过来以均产的口号劫夺他人的财富。“机器是富豪之母也,万恶之源实在机器,不推翻机器,财产无能均之理。”资本家利用机器聚敛财富,在先生的认识世界属于缺乏儒家仁义道德的不义之举,和孔子“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均贫富”思想背道而驰,理应得到正义的谴责。这也正是先生“机器劫”命题产生的思想基础。

其七,先生站在宋明理学的高度,提出世界大同的命题。先生在《劝学述言》中,极力褒扬二程、周敦颐、张载、朱熹、李光地等人的理学思想。《拙修子太平书》系先生晚年理学思想的总结,主张以理学为学术统领,注重人性和精神的自我修养,反对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理论,批判达尔文主义把人等同于动物,对运用现代科技恃强凌弱的西方列强提出警告。提倡以孔子思想统领人类,实现世界大同,这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张九畹其人、其文、其书

罗愚频

一、张九畹其人

张培兰，字九畹。生于清乾隆己酉年(1789)三月初十日，歿于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十九日，终年 67 岁。道光辛巳年(1821)恩科举人，选授固原州(今甘肃省固原市)学正。主讲四川安县、汶江，甘肃阶州正名、文县兴文书院。

张九畹天性至孝、笃友。幼时即能先意承志，怡色柔声。有食必先父母。其父张临开设教馆授徒时，张九畹从之学习，每次从学校回家，张九畹都追随左右不离半步，同窗诱之嬉戏，从不理会。张九畹昆仲八人，他排行第三。其父歿时，诸弟尚幼，张九畹竭尽全力，辅翼教诲，以至成家立业。其二兄张培棣、四弟张培萼在外省居官，均卒于任。张九畹不远万里，不惮跋涉，亲自扶其柩回文县安葬。

张九畹恪教职、善课士。张九畹一生从事“传道、受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曾主讲四川安县、汶江，甘肃阶州正名、文县兴文书院，也做过固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学正。他训导学子以宋明理学为旨归，务重实践，不尚浮藻，循循善诱，“成就多知名士。”他在任固原学正期间，手订《训飭士子八条》，“勉以孝弟忠信廉节之事，故当时士风为之一变”，“遐迩奉为圭臬。”

张九畹性笃学、好藏书。张九畹幼时，因家贫，其父命他改业就农，他则悄悄将书藏在袖中，去寺院中终日潜心研读。“每读书，殚精竭思，疾雨迅雷，皆弗知也。”平生遍游关中、陇右，惟以书册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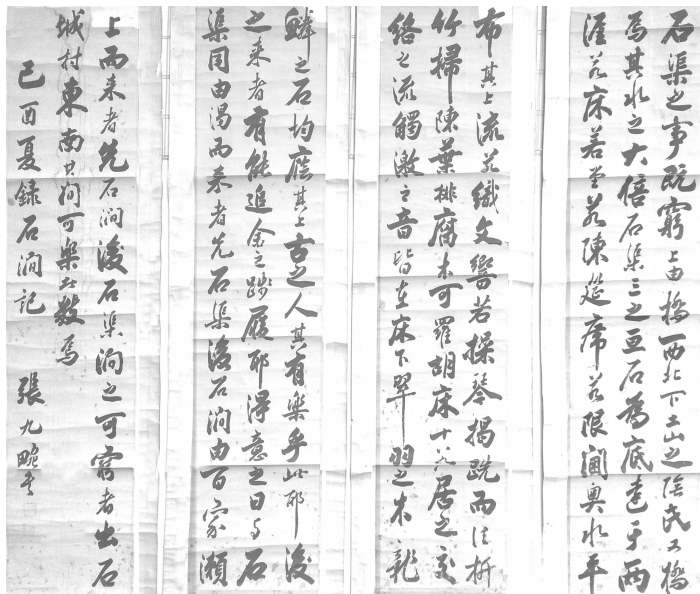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罗愚频

甘肃省书协会员

【图解】

张九畹书法



陇原文史

随,投宿古寺荒村,诵读不辍。张九畹性好藏书,晚年度架为满,当时人称之为“书痴”。

张九畹性恬静寡欲,不慕荣利。张九畹不仅精研儒家学说,而且与佛家学说亦颇有造诣。也正因为此,造就了他性情平和、与名与利皆视若浮云的性格特征。他在任固原学正期间,清廉自守,“不妄受诸生一钱”,以至于歿后无钱归葬故土,全赖同僚捐资才“始得归其丧”。他喜以山水风月,陶其性情,曾在文县天池结庐种树,日夕吟咏。据 2000 年文县天池靖国寺横梁发现的墨迹推断,清道光二十年(1840)张九畹曾在靖国寺皈依,法名圆觉,时年 51 岁。

二、张九畹家世

张九畹,甘肃省文县城关人。自张九畹祖父张予翮、父亲张临到张九畹及其子张价,这祖孙四代,以至到民国年间,文邑张氏可称望族。之所以如此,这与自张予翮起订立的诗书传家、孝悌传家的家规家风有关。

清光绪二年(1876)长赞所撰《文县志》中,张九畹祖孙四代 11 人在《选举志》《人物志》中频繁出现。作为一部官修方志,入志人物是慎之又慎的,一个家族的人物频率出现如此之高,如非特殊情况是绝不会如此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九畹祖孙四代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现列述如下:

张予翮,乾隆壬午(1762)科举人。优于品行,远近忻忻然向慕。得其指授,悉能成立。子孙蕃衍,至今称望族焉(长赞《文县志·人物志·笃行》)。为九畹祖父。

张临,嘉庆岁贡。号屏山,予翮次子。品端学优,乡里敬服。历主潼关、略阳书院讲席。生八子,俱贤(长赞《文县志·选举志·贡生》)。为九畹之父。长赞《文县志·艺文志》中载入其文 2 篇:《龙溪洞碑记》《玉峰韩公暨张安人墓志铭》;其诗 10 首:《和方邑候游天池》3 首、《玉虚晨钟》1 首、《麻关水灾》1 首、《寄子培棣广东任中》5 首。邑候胡荐夔曾为其撰写《屏山张公暨德陪俱太安人墓志》,山西举人邵赠铨曾为其撰写《张屏山先生画像赞》。

张培棠,生员,家夙贫。勤于治生,二老甘旨无亏。七弟悉藉以成立。闾党称孝悌焉(长赞《文县志·人物志·笃行》)。为九畹长兄。

张培棣,字翕庵,予翮孙,临次子。道光乙酉(1825)拔贡。朝考一等,历任广东澄迈、信宜、仁化、三水等知县,卒于任。书法秀逸。所遗廉俸,兄弟八人均分(长赞《文县志·选举志·贡生》)。为九畹二兄。

张培萼,候銓从九。(长赞《文县志·选举志·杂职》)为九畹四弟。

张培筠,候銓从九。(长赞《文县志·选举志·杂职》)为九畹五弟。

张培荆,候銓从九。(长赞《文县志·选举志·杂职》)为九畹六弟。

张培芝,乡饮正宾。(长赞《文县志·人物志·乡饮》)为九畹七弟。

张培槐,恩贡。善真草书。(长赞《文县志·选举志·贡生》)为九畹八弟。

张价,岁贡。候补州同。(长赞《文县志·选举志·贡生》)为九畹之子。

由以上所列可见,张九畹祖辈、父辈皆是品端学优、望重乡里的读书人,其昆仲八人亦俱是读书人出身,其子张价亦为“候补州同”。这种良好的家世,无疑对于张九畹的人生道路、思想品德,乃至至于学问艺术起到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张九畹其文

终其一生,张九畹都在藏书、读书、教书、写书。作为一位封建社会时代的正统读书人,张九畹毕其一生都在研究、探索儒家学说,虽然他亦曾精研佛学,但这似乎只铸就了他恬淡平和的性格,而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现在能读到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张九畹的文章及时人对他的评价来看,亦可得其大概:张九畹“学问深邃,颇有旨归。一生致力于朱晦庵(朱熹)、陆象山(陆九渊)之学(“心学”)。尝曰:陆朱之学,虽有异同,然大旨皆归中正焉,乌可舍此而他求哉。……其学术之正皆有裨于世道人心云”(《张九畹乡贤录》),“于文求华实并茂,不主奴于骈散之说……类目数十,皆编排丽藻,自单词以致于成文,间附已作□□运用故实,必求无愧古人……县人著述,未有如先生之富者”。(韩定山《阴平耆旧传》)

张九畹毕生著述十余种,皆未刊行,现在已全部散佚。从民国14年的《九畹先生乡贤录》中,亦仅看到四种存目:《四书圣学指南》20卷、《獭祭编》36卷、《传家宝鉴》3卷、《登瀛棹》4卷。惜哉,痛哉!

张九畹现存世之文,遍求诸文献,仅从吕震南《阶州直隶州续志》、长赞《文县志》中找到数篇:《补修文昌宫碑记》《重修阴平桥记》《补修城隍庙碑记》《邑候钱公德政序》《獭祭编自序》《张芷塘候小照赞》。有此数篇,虽不能窥其全貌,也可略知其为文“衔华佩实,迥异时艳”(长赞《文县志·人物志·乡贤》)之文风。张九畹之诗词,吕震南《阶州直隶州续志》、长赞《文县志》中皆未载。

四、张九畹其书

张九畹至今依然为邑人津津乐道,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书法,一直以来极负盛名。在文县,只要谈到书法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九畹。其实,在张九畹生前,他的书法在当地就享有极高声誉,《九畹先生乡贤录》中说道:“当时得其书者,咸什袭藏之”。只是因为文县地僻,并未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世人重视罢了。

关于张九畹书法的渊源、风格的形成等,因为资料所限,我们不能妄言。现只能就目前所收集到的他的两幅书法作品及时任县令张绩所撰《张九畹先生字赞》、进士米穉等撰《九畹先生乡贤录》、学者韩定山所撰《阴平耆旧传》等资料,对其学书经历、书法风格和书法成就做一初步研究和探讨。

张九畹对于书法的痴迷和勤奋,至今在文县传为美谈。韩定山《阴平耆旧传·张九畹》载:“先生书法甚工,传者谓先生习字,终日口讲指划,几如入魔。昼坐以指划案,夜卧以指划被,木为之陷,布为之裂,亲友笑之止之,弗顾也”。蒲松龄云:“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以此验诸九畹先生,信然!

张九畹的书法应该是深受家庭影响的。他的祖父张予翮是举人,他的父亲张临、二兄张培棣、八弟张培槐是贡生,其书法想必是绝对不会差的。特别是其八弟张培槐,长赞《文县志》上明确说是“善真草书”。尽管目前,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家族其他成员的书法作品,更无法看到他们的书法作品和张九畹书法风格上的联系。但他的书法启蒙和对于书法的热爱,说是受到家庭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张九畹的家学渊源,导致了他早年的独尊“圣学”的世界观和正统的审美观,体现在书法上,又因科举的需要,他在祖父和父亲的直接熏陶、教育下学习馆阁体。馆阁体特

殊的应试用途,要求“乌方光”,这就造成了千人一面,无个性、无生气的局面。但却严整精到,法度森严,没有很强的书写功底很难达到。张九畹所处的时代,虽然在政治上内忧外患,但在学术思想上相对活跃,文学艺术上求变求新,在书法领域,碑学初兴,推崇碑帖融合。这种大的学术和艺术环境,对于张九畹书法艺术成熟和最终个性风格的形成应该起到了极大作用。

时任文县县令张绩(广东举人,道光二十四年任)著《张九畹先生字赞》云:“不羲不献,不柳不颜;欧虞褚薛,亦无取焉。虫书鸟篆,何必强妍;纯任天真,惟曰自然。”这短短的三12个字,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一是认为张九畹的书法取法对象既不是羲(王羲之)、献(王献之)、柳(柳公权)、颜(颜真卿),也不是欧(欧阳询)、虞(虞世南)、褚(褚遂良)、薛(薛稷)。二是指出了张九畹的书法风格范畴是“天真自然”。张绩是时任县令,肯定与张九畹有很深交往,他的这个《张九畹先生字赞》所传达出的信息应该是靠得住的。但张九畹的书法到底是取法何家,却又语焉不详,我们也无法妄断。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之第十品“自然”云:“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代表作。司空图提出的诗歌美学,在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后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以审美感受为中心,侧重艺术风格、意境和技巧的重要美学流派。我们今天不妨将其第十品用来观照张九畹的书法艺术。

民国25年由文县清末进士米稬、著名学者韩定山等人撰呈的《九畹先生乡贤录》中,对于张九畹的书法评论道:“其运笔颇有古趣,不尚妩媚,颇类其为人。”揆诸其所遗书迹,评价是极为恰切的。“运笔颇有古趣”,自然格调不俗;“不尚妩媚”,也正是“自然”美学风格的最好注解。

现在联系前述张九畹之为人、为文,再来观照其书。张九畹为人“恬静寡欲”、“性情平和”,张九畹为文“衔华佩实,迥异时艳”,张九畹为书“纯任天真,惟曰自然”、“颇有古趣,不尚妩媚”。其为人、为文、为书三者之间,达到了高度统一、高度和谐。这“高度统一、高度和谐”正是艺术的“自然”之境,亦正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如以此反观当今书坛,面对张九畹,我们不能不对其产生景仰之意。

下面,具体赏析张九畹的传世墨迹之一《石涧记》。

《石涧记》,系录唐代柳宗元名文《永州八记》之七。该作品纵125cm,横29cm,四条屏,粉彩纸本,保存完好。正文179字,可能是因纸张原因,原文最后“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未录。书于道光己酉年(1849),钤印两方,模糊不可辨。

张九畹的这副行草书,墨饱笔丰,气韵生动雄强。用笔沉着而出清新,结体浓郁朴茂,骨气深隐。通篇欹正相依,疏密相间,大小错落,虚实相当,字与字,行与行,左顾右盼,前后呼应,一气呵成,一任自然。2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可以想见书法家当时凝神挥运,心手双畅时的洒落情态。这副作品从整体上来看,几乎字字用墨浓厚,落墨如石,几乎字字中锋行笔,无一懈怠,几乎字字独立,却又活活泼泼、一派生机,无丝毫僵硬、板滞、沉闷之感。这与书法家对于作品整体把握能力有关。这幅作品虽主基调是雄强朴茂,主要笔墨特征是浓重刚健,但书法家在挥运之际,却巧妙地做了调整。如第一屏第一行“上”、“由”、“北”、“下”、“土”、“山”、“又”字,写得小而轻;第二屏(前转第67页)

参考文献:

1、清·长赞《文县志》,文县政协翻印,1984年。

2、清·吕震南等《阶州志集校笺注》(曾礼笺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3、民国·米稬、韩定山等《九畹先生乡贤录》,复印件。

4、现代·韩定山《阴平耆旧传·张九畹》,复印件。

艺术创作不能放弃生活的积累

杨立强

少年时代,经常见到外地画家来这里写生,那时的我像一只贪婪的小猫常常守候在画家身边,从开始一直看到结束,我的心灵陶醉在画家笔下的写生作品里。画家走了,我的魂也像被勾走了似的。回家的路上,我如同一个走火入魔的人幻想着能当一名画家,像他们那样背上画夹走四方,那该是多么荣耀和自豪啊!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实施当画家的梦想。我买了一个笔记本,拿一支铅笔,悄悄走到没有人的地方,亦步亦趋学着画家的样子对景写生。结果怎样呢,笔下的画真是惨不忍睹,自己都不知道画了些什么。画几笔撕一张,揉成一团,丢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再画几笔又撕,撕了画,画了撕,眼前的景物就是画不到纸上,我心急心躁,头上手心直流汗。我这才意识到写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心乱如麻地回到家里,不知怎样才好,只有翻书看,期望着能从书里获得一点写生的方法。那时候绘画方面的书籍很少,尤其如何写生的书更是少见。说来也巧,一次在县文化馆借阅图书,意外地发现了《叶浅予速写集》和《黄胄写生集》,我高兴得像发疯似的,托人想了许多办法悄悄借出来。这两本书我爱不释手,反复看了好几遍,从书中获得了一点写生的技法。这是俩位先生

多半生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他们的写生线条流畅生动,造形准确,神态飞扬,令我大开眼界。我才知道,写生没有基本功不行。老人们常说:“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学习任何东西都要循序渐进。这两本书对我启发很大,可



【作者简介】

杨立强

甘肃省府文史馆馆员

甘肃省美协名誉主席

【图解】

杨立强先生带学生在外写生。

文艺评谭

以说我终生都深受其影响。

我每天拿上速写本去偏僻的小巷道,这里很少有大人们出入,我怕他们会笑我画的不好还装模装样。我躲躲闪闪地开始了游击式的写生练习。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写生的画稿积攒了百十张,每有一点点进步,自己暗暗地高兴。当时我心里憋着一股犟劲,我不相信自己画不好写生,只要长期坚持一定就有收获。后来,我和母亲被下放农村劳动。换了一个地方,面对生疏的面孔和陌生的自然环境,我的胆子也大了。工休时在地头给社员画像,上山拾柴时画树画山,就是进城办事,我也不忘带上速写本,走到有好景的地方就画。这样不到一年时间我就画了好几本速写。虽然画的不那么满意,但我依然沉浸其中,常常因写生而忘记了赶路回家,老母亲总是望眼欲穿地等我到天黑。

欣赏自己的写生画稿,不仅使我忘记了生活的种种不如意,还获得了别人无法体会的情趣和欢悦。通过写生,我渐渐爱上了这里的山水和这里的人,也使我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力量和信心。古人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当时我并没有深刻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只知道要画写生。当我翻阅过去的写生画稿时,那些简单的线条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年轻时候,我意气风发,不管路途遥远,高山险阻,从来没有丝毫畏惧。即便当时我连口粮都没有,全靠亲戚或和朋友暗中资助,生活极度困难,但我对艺术的酷爱和追求一直都没有改变。一方面我向古人学习,另一方面遵循“师造化”的原则,开始了“行万里路”的漫长训练,我没有为生活的艰难叫过苦,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练习中去,写生成了我每天必做的日课,无论走到哪里我的速写本总是随身携带着,不管雨雪阴晴,从未停止过,有时写生结束了,我还意犹未尽地站在那里看景,在路人看来我似乎精神不正常,也因此闹出许多笑话。

因为写生,我曾多次进过派出所。当时的阶级斗争比较紧张,大家政治觉悟高,警惕性也特别强,我在火车站或火车出入区写生,常常被公安人员或当地干部当作偷画地图

的特务分子抓起来审问。他们粗暴地撕毁我的写生稿子还要我交代究竟搞什么活动。我啼笑皆非,和他们展开舌战,但我总是叫化子打官司场场输。冬季写生时的冷冻硬捱过去了,最难熬的还是饥饿。我那时常在晚上加工白天的写生,或者把写生稿画成一幅画,因为缺粮吃不饱,画到夜里两三点就饿了。没办法,我只好烧开水或煮茶充饥,这样难免磕磕碰碰打搅邻居休息。第二天邻居指责我晚上干什么,我还死爱面子不说实话……往事历历在目,如今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其实年轻时候受点苦累算不了什么,应该说这是一笔丰厚的生命财富,它使我懂得了社会,懂得了生活,自然更加



【图解】

《中国美术家作品集·
杨立强》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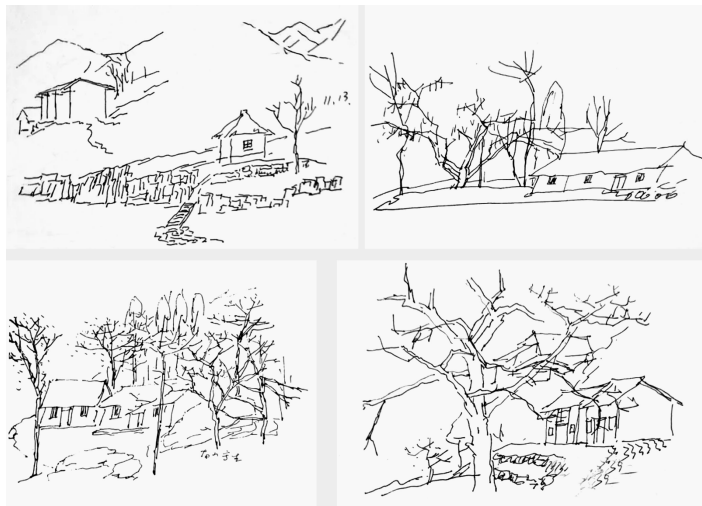
珍惜今天的环境。多少年过去了,我由去外地体验生活画写生,转向了我的故乡,并一直致力于陇南山水画的创作。从写实的路子走到今天,我都在不断地思索、实践,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精神代价。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这是危言耸听吧!

选择了艺术创造的道路,就是选择了一种寂寞而艰难的生活方式,对此我无怨无悔。为了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一直都在努力积累生活,不断开拓新领域,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身修养。所以,我又把过去走过的路重新来走,继续感悟生活,用新的视角认识生活。和青年学生一起闲谈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不要轻视写生这一环节,哪怕是一片细小的叶子都要细心观察。写生不单纯是临摹自然物体,同时也是记录生活。我常说走路想画画吃饭想画画,睡觉也要想画画,这样才能进入状态。也许在今天的人来看,这实在是又蠢又傻,但一个人想要一生从事艺术事业,没有这样的蠢和傻劲,不去真诚专注,持之以恒,就不会有收获。

通过长期的写生、学习和创作,我才慢慢地体会了其中的奥妙。写生是画家长期感受生活、积累生活的一种手段,创作是最终的目的。要创作好作品,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积累,以及艺术技巧不断的提高和完善。艺术作品要打动人,就要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寻找美。寻找生活非吉日才有,美非在名山胜水中。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你爱,投以真情就有自己的感受,必然会产生创作的激情。写生不必拘泥于特定的时间或环境,艺术的宝藏就埋在身边,等待你去挖掘。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我觉得这句话适应于任何一种艺术创作。

个人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天长日久,所看过的东西就慢慢地模糊了,或者失去了记忆。当你打开写生本,看到一页一页的写生画稿,眼前就会浮现出写生时的印象和激动人心的情景,那种快乐只有画家自己能享受到。写生的过程也是孕育创作的过程。要把写生回来的素材应用在创作中,需要一个很长的消化过程,数月或几年,甚至数十年。有些人的写生本身就很生动,精彩完整,完全可以加工创作成一幅好作品。即使是这样,在创作中还有一个笔墨的处理过程,对画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写生到创作有一个很长的思变过程,它是量变到质变的思想升华。有些人看画家画画好像很容易,不经意的涂涂抹抹就完成了一幅画,但他们却不知道画家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大多数人写生,并不注重眼前客观景物的存在,而只重视写生时线条的速度和流畅。尽管画了许多写生画稿,但在创作中从来派不上用场,仅仅是为了表现几根线而已。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许多画家已不注重写生的需求和作用,他们放弃手中的画笔,拿起照相机和摄影机拍大场面和特写,以此来代替写生,作为创作的参照。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这和写生的效果并不一样。画家通过写生亲身感受生活,不仅锻炼



【图解】

杨立强陇南山村速写稿

了画家眼睛的敏锐观察力,大脑的想象和思维的能力,以及对各种信息的反应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手的表现力。这三位一体的结合,通过长时间的磨炼,对写生和创作思想的提高,技巧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是极其有益的。这是对生活的再次体验和再认识。画家通过艺术的“取舍”完成的写生,含有画家的真情实感,与用照相机摄取素材获得的写生完全是两种感受,两码事。照相机只是一次机械的完成过程,对画家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古代的先贤如荆浩、范宽、黄公望等,在 1000 多年前尚且能深入到大自然当中观云山之变、感悟大自然的真情,和大自然进行心灵的勾通,难道我们今天不如古人吗?我认为写生仍然是画家终身应该做的事情。

在长期的写生过程中感受家乡山水之美,使我对家乡山水的眷恋远远胜过了对名山胜水的喜爱。我常说故乡的山是山外山,“养在闺人未识”。写生学习进行的初始阶段我走了许多地方,也见了一点世面,我心里曾经产生过一种可笑的想法,认为陇南山水哪有美可言,那沟沟坎坎怎么人画?画陇南山水对创作有什么用处呢?在我的心目中,只有黄山、桂林、三峡等地的山水可以入画,才有美可言。于是我东奔西跑地去登名山写生。当然,登名山开阔了我的胸怀,放宽了眼量,自然是极好的事情。但我对名山胜水的认识只是得之皮毛,不象故乡的山水可以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家乡山水的四季变化都是亲身体验。后来在写生中,我才真的爱上了故乡的山水,和故乡的山水交上了朋友。我常常一个人走在山间小路上、对着一座座土坡、一层层田地,在雨中、风中、雪中、月夜中去亲身体验,享受大自然的无私恩惠。我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感悟着家乡山水的微妙变化,生活在无处不美处处美的环境里。这是我的福气和缘分。有时在山沟里写生,会遇上很多当地的熟人和朋友,他们看我写生,似乎大惑不解:“这里有什么可画的?”“这景还能入画?”

多年来,我在写生中不断地实践,感悟,寻找它的规律,慢慢地在写生技巧上有所获得。我把写生分为素材性写生和构图性写生。素材性写生是通过观察生活中的一切景物,对它的形体、结构以色彩进行具体而深入的描绘。在创作中这种素材可以直接应用。面构图性写生是指眼前景物的构成本身就是一幅完整的画,或者能启发构成几幅画。这种写生只需用简练的线条画出大概的框架即可。尽管是几根简单的线条,它含盖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有取舍,有思想的提炼,对画家来说这是表现生活的一种艺术符号。掌握和积累生活素材是每一位画家必须去做的事。至此,我深刻地理解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的许多生活感受和写生在创作的思变中得以升华,大量的生活素材使我创作了许多表现家乡风貌的山水画,尽管还不那么理想,不那么成熟,但它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它没有程式化,是我的真实感悟。

一晃 40 多年过去了,现在已有许多人不带速写本写生,而我每次和朋友外出时总要带上速写本,见好景就写生,已经成了改不掉的习惯。也许有些同道会笑我还是那样的傻和痴,但我不在乎。前些日子在回家的路上碰见许多朋友,他们在下棋、打牌,笑着喊我:“立强,来下几盘棋,休息休息。”我说不会,没时间。他们便严肃地说:“都画了一辈子画了,还画不够?什么时候就画完了?”我无法回答。我也想玩,但自己的艺术总不能荒废,所以只要有时间就外出画写生,在飞雪中登山看景或踏着春泥赏山花,这是多么美的事!感受和积累生活是我一生中必须做的事,我愿意用痴情对待自己的事业,用傻去对待生活。假如我的真诚能感动上天,我会用自己的智慧创作出更美的家乡山水画。

浑融于笔墨深处的西部情韵

——我观国画画家李伟

雒青之

在西部高原李伟的画作无疑是灌注了大地情歌的心灵史图，书写着真正诗意的生命激情。我常常把他创作的藏族人物和陇东风情的作品看作是辞别了城市的乡野之魂。它在贯通古今的高原和草海深处剔除了一切嘈杂的声响，以不可凋敝的心象构画着一个民族的沧桑大美。

“在那东方的山顶，升起皎洁月亮，年轻姑娘面容，渐渐浮现心上。”这是在藏区民众中广为流传的一道情歌，它深深地打动了李伟那颗敏感而晶莹的心弦。在李伟的创作视野里，四季的草原和如花的牧女以及散发着腥膻气息的牦牛，是大地上最富色彩的跫音，也是画家本人晕染笔墨显现情感力、文化力、创造力的源泉。

李伟是甘肃画院的专业画家、一级美术师、院长，是成名较早、成熟较快的具有浓郁人文精神的实力派画家。他常如痴如醉地解读那个风雪高原上的奇异风情，他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动物、植物统统看作是尽可能深入地接近美与爱的世界的慈航之旅。因而，他的绘画每一幅都不是强打精神做出来的，而是内在地源源不断地打开了抒情的大门。他的人物画洗净铅华，流露出毫不犹豫的自然本性，画面以少见的干净质地承接着生命的阳光。他的山水画在与自然的对视与对话中找到了安静的表达方式、语汇和结构，他没有强求自己去画那种令人目眦俱裂的险怪奇拔山势，而是力求平和地将如屏山峦表现得宠辱不惊，画面上显现着从容不迫的朴拙和平实。

李伟是一头扎进生命底层的画家，他的内心世界永远是不加装饰的，纯如雪水，淡如野草，所有的灵性、悟性都融入到那些不期而遇的诗情画意中。类似《雪域高原》《远方》和《莹·霜》那样非常优秀的作品，让我始终感到比画面更深的深处，有李伟激情流溢的咏叹，那不是故作高深和高亢的咏叹，而是半带忧郁半带深思的牧歌式抒情长调，他把天、地、人和动物合谐地招到了神的凝眸中。你看那草地上肃然而立的藏家姑娘，眼神里传达着比雨滴更透彻的清洁，她背后则是静穆如夜的牦牛，牦牛背上那沉重得化解不开的黑色使这种牲灵具有了美的深度。你再看那与苍鹰比肩而立的藏家女子，如同雪山冰峰一样傲视寒风，以澄澈对抗着凛冽，以缄默对抗着喧响，以纯粹对抗着尘埃。这就是

【作者简介】

雒青之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中国作协会员

文艺评谭

李伟心中的远方:不是天堂,也不是课堂,而是能撕裂胸膛的灼魂之爱,爱就在远方,爱就是远方。

我总觉得,要想真正解读李伟和李伟的创作,就如同要把淹没多年的古曲重新弹奏一样难度很大,但有一点是可以置信不疑的:他是在用笔墨不停地追赶着美的境界。在他所置身的西部画坛,有一批能够并乐意与大自然的万物生灵情同兄弟的杰出画家,李伟作为其中的一员,近些年不断创作出广有影响的作品。有论者称其作品犹如“西部的方言”,带有难以泯灭的地域特色和人文痕印。的确,李伟笔下,从早期的陇东风光、塞上田野、草原人家到现今的以藏族人物为主线的作品,都像是对西部时空的预约,预约着历史与现实的交汇,预约着自然与文明的春天,预约着人性与物性的碰撞。他的一笔一墨一点一线都闪动着对西部厚土的宿命般的人文情怀,因而他的作品生发着一种不可测量的美学高度或精神海拔,笔墨与情韵之间构成了不可割裂的艺术走势。即使是在一些小题材的作品中,李伟也表现出真情勃发的创作活力,将生活中不可诉求的美,极其灵动地加以笔墨证实:窑洞、树木、草垛、土石、磨碾、山民以及觅食的小猪、奔跃的山羊、拉磨的毛驴等等,都加入了一点也不孱弱的笔墨色彩,使那些原本画意不足的对象,一下子如弹簧般伸展出美的力量。读这样的画,你绝对不会感到疲惫,相反会产生一种将春色握在掌心里的快感。

当然,以我个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倾向,我最留连的李伟的作品还是那些寒气纵横而心香氤氲的人物画。特别是久久不能遗忘的是画中人物那淡静的神色,一个个美丽的少女在冷峻的生活面前所体现出的肃穆镇定和永不绝望,在我看来就是凝血凝情的生命之诗。这样的作品他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越来越具有生存的厚厚重重和情感的沉甸甸。以《暖冬》《阳光下》《春沐》等作品为标志,李伟让我看到艺术的灵魂竟然有那么圣洁的表现力,触须联结着永恒的爱。往往于画中少女简洁的一瞥中,我看到忧郁中

所深含的火花。从邈远的远方,从草根深处,从艰难的世事中,李伟画出了噙满爱意和渴望的女性形象,也画出了一个古老而又青春的民族所具有的高贵的美。我相信没有血性和柔情的人,是画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我画我心”这句话到了李伟这里就是一种与头颅共生的



【图解】

李伟国画

追求,也是作为西部有代表性画家的必然归宿。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上,画家永远不必发愁颜色的搭配,倒是心灵的熔炉里能否提炼出如梦如幻的生命情韵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这一点李伟不愧是以西部为家、以西部为神的“唯美”画家,他可以不属于任何流派,但他始终珍爱着这里的芸芸大众和日月山河,魂魄里早已把每一年的每一天都视为心灵的旅行、生命的采风。对李伟来说,或者对一切艺术家来说,最佳的创作状态不是对大自然君临一切,而是主动地向大自然投怀送抱。只有释放自己的创作激情,让西部情韵化作笔与墨、歌与情、爱与梦、思与愿的珠连璧合,才有了李伟在创作上以梭子拉出经纬般的自由。

李伟是一个理性成份很浓的画家,这种理性成份不仅充斥着他的个性也充斥着他那平面构置见长的作品。在李伟笔下,绝少有狂放不羁的激情和恣肆,有的是纯静、温适和诗意。读他的画,感到严谨与和谐。严谨,是他在构图、设色各方面都很讲求法度,一丝不苟。他努力在作品中强调绘画性、强调笔墨语言的锤炼的前提下展现精神性,他在寻求和探索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强调笔墨自身的潜力挖掘中确立一种全新的笔墨排列方式和秩序,在强化画面的视觉冲击力的同时强化思想和精神的冲击力,故而李伟在画面布局上极其认真,一笔一墨绝不轻率。和谐,是指他的作品在构成上把握张力的均衡、施色的雅典和人物的动态。严谨和谐的统一,使作品赏心悦目。《居延泽的记忆》《迁场》《牧人》《胡杨洒秋》等作品,题材都是生活中极寻常的景观,但一经李伟的艺术处理,这些寻常景观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韵。

李伟的作品采用了中国画传统的散点透视法,增强了平面构图的效果,并且使景物环境流畅、自然。构图极具匠心,不经意中处处着意。特别注意平面位置分割和经营布局,以及画面层次的调度。形成静止中的流动感,使画面层次分明,动静结合,给人以视觉上的舒适。特别是画面上“留白”,产生了空灵之感。笔墨讲究,工写俱当。整幅画具像写实,工笔为主,但每一处细节,却又或皴擦、或简笔、或渲染、或变形、或夸张,充分发挥了水墨画的各种技巧方法,突出了意境韵味。在用墨施色上,浓淡、湿枯兼施;积墨、破墨并用,使画面感觉在凝重中不乏活泼。举凡油画、水粉、版画的一些表现技法,在画里都有所融进,因而构图显得极为丰满、厚重、色彩柔和。以拙为巧,大巧若拙,以拙见秀。拙朴是水墨画至高境界的一种表现,齐白石衰年变法后主要点就是作品的拙朴感。李伟深知绘画精神性的重要,只存在一种精神的导引和贯穿下,形和笔墨语言才有意义。所谓精神是指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审美原则,李伟的拙朴、平实,在大朴不雕、既雕既缘复归于朴的思维过滤和笔墨造型的锤炼中,展示了他的思想内蕴和人格魅力。山水人物的拙朴表现,远较花鸟为难,弄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成为造作之败笔。李伟作品的“画眼”,就是拙朴之趣。他的“拙”的内涵,必然是“秀”。看他的作品的拙朴,使我们想起了童年,想起了久违的自然,使视觉感官享受到一种由衷的美,何以达到如此造诣,除了天份之外,恐怕就是他对描述本体的洞悟以及童心般的挚爱吧!

在他的画笔下,草原上的骑手,马背上的少女,经幡飘摇的庙宇,面如刀刻的生灵,都是富有生命力和想象力的灵魂之舞。在他最为人称道的一些大气磅礴的作品中,传奇般的诗韵,厚实的人物描写,体现着一种融通人物血脉、历史血脉和艺术血脉的情感根系。犹如是跟随着鹰的翅膀飞扬在遍地牧场的高原之上,使人在如歌的爱意里胸襟浩瀚。

李伟的画风严格说来经历了不断纵深的变革,从学生时代他就具有水墨淋漓的表现天赋,那一时期他的画作常常是舒心的、温柔敦厚的,作品用浓厚的诗意装饰着清新流畅的形象和谐的风景人物画,有一种对生活的感恩之美。这些作品有一种特殊的思乡气息,画面纯净,表现细腻,色调柔和,完全是一种既亲切又淡静的娓娓动听的诗篇。我可以想象他这时的创作状态是多么的从容不迫。

从故土乡音中一下子转向大野洪荒的高原草地、山谷河滩,李伟跨出的这一步,他一路孤独地向新的画风靠近,终于在踉跄的艺术之路上确定了逐鹿画坛的创作雄力。关于这一段转型,李伟认为:品味和追求东方神韵,用个性鲜明的表达方式和表现语言展现自己内心的高度和精神的海拔,是一个艺术家必须感觉和体验的创作境界。

因而,在他大量的描写藏区风情人物的作品中,他很少去摹仿同类作品,更不屑于画那些千篇一律的广告似的面孔,他就像一个声音沙哑的民间歌手,总是用极简单的旋律就唱出了心头的呐喊。他的画作中沉淀着厚重的情感,有萧萧路途上的沉思,有滚滚红尘中的寻觅,有冥冥之中的遐想,因而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的有一种仁慈的东西在画面中闪烁。这让我想起一位俄罗斯作家的艺术情结:“祝福大地,祝福水,祝福树木,祝福鲜花,祝福天空,祝福香味,祝福人们,祝福野兽,祝福女人身上永恒的仁慈和永恒的美。”

他懂得中国画的本质因素在于“缘情言志”,表达主观内蕴,一形一色、一笔一墨都有其内在的哲理情致意蕴,在传统的经典作品中纯粹为了画好看,为了赏心悦目的东西很少,这与西方重视视觉,反映强调形式美因素有着巨大的反差。所以李伟在锤炼平实、拙朴的笔墨语言时,虽然也吸收了一些平面构成、装饰性等形式要素,但却用的极有分寸,即使用了,也经过分解和过滤,使其与过滤笔墨因素相融,使其具有内在的精神意蕴,使其经得起咀嚼和回味。李伟的创作是很节制的,这并不是说他有意地收敛着激情,而是他懂得在通往花园的小径上布满了荆棘。以他对藏族风情的洞察力,他完全有直面艺术与生活的视角和触角,因而不急于使自己的作品过早地变得自由不羁。所以当有的论者认为他的作品过于老实时,他并不刻意一反常态,倒是更加自觉地引导画笔去采撷书骨、乐韵、诗魂、神采。

在我与他的接触中,总能发现他把绘画当作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精神自省,他常常沉浸于对古代文明与现代艺术的反思与碰撞中。为此他不惜舍弃一切生活中的喧哗和豪华,重归寂静和宽容,这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传神地透露出宁静淳朴、庄重和谐的格调。

西藏风情人物绘画题材,眼下依然是众多画家竞相介入的领域,仿佛这是可以轻易获奖的特殊表现内容,而李伟并非如此因因相袭,对他来说,他现在的创作仍然处在艺术的过滤阶段,他不愿被任何程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装入某种套路中。我曾经向他征询过这方面的意见,并且和他一样认为任何题材的画作都不能搞成批量的流水作业。近期的画风更加准确地融通了他所追求的东方韵味,他所画的藏家女子神态各异,每一瞬间的细微的笔墨都让人深感生命的美丽,而往往做大背景的牦牛、草地、雪山、帐篷都以令人神魂颠倒的墨块呈现出一种自然与人性的妥协精神,而这正是我心目中李伟能够和他的画作合为一体的重心。

在引起美术界广泛关注的“甘肃十二人中国画作品广州邀请展”上,李伟作为甘肃代表性画家中的一员,他的人物画作品倍受评论家的赞誉和精评:“李伟的人物画,以朴

实纯正见长，善于用块面结构来协调画面的布局，那种大块的笔墨和粗线条的勾勒来显示力与美的对抗。早期李伟人物画的创作，是对西部自然环境的追求、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恶劣的自然状态下的心理表述。胡杨林中、陇东场景，一派安详、自然与纯朴、热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有一种寻根式的追问和体验生活纵深



【图解】

李伟国画

过程。近年来，李伟的表述方式是在以往的情境中提炼感受纯度，对于人物的刻画极具理性的思辨。营造一种冷寂、荒寒景象，反映了当代藏民族的生活现实和文化现实空间，从理想主义激情转向当下的生存体验，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转换的过程，是李伟人物画创作的当下状态。”

李伟的艺术穴位也许注定就是音乐的、诗性的和蒙太奇般眩目的，甚至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镜头的质感，他仿佛与笔下的人物神遇，并找到了自己的心灵所居之地：在阳光倾注的牧场上，藏家女子是镶嵌在时间中的花瓣，她们静静地被高原的大风抚摸；有时她们也像一团精美的火焰，让无边的风雪在阳光中显得不必冷峻；他们是画家笔底的清泉和雪水，以诗意的节奏浮现在画面上；她们的神情也一如这雪域高原上的魔幻色彩，让一切交了好运的灵魂来到她们面前接受美的检阅。所以读《轻风》使人清醒，读《清露》使人圣洁，读《秋阳》使人温润，读《草地》使人梦幻，一切尘埃都最终落定于艺术的旨趣中。

普鲁斯特说：“唯一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唯一真实的乐园是失去的乐园。”李伟以他的画作，为我们将逝去的岁月和失落的乐园拉回到心弦之上，在笔墨深处打磨着人与自然的凝视与对话。在那一幅幅充满着情感意象的作品里，我已经听见李伟发自肺腑的审美召唤：远方不远，高原不高，真正的画家通往艺术圣地的道路，当以自己的灵魂和精神为尺度，超越自我，方能驶过荒原。

【作者简介】

兰干武

书法报社《书画天地》总编

中国书协会员

评论二则

之一：青峰俊彦向清贵

兰干武

与王青彦先生认识有多少年，我一下子记不起来，感觉已经很久很久了。每逢过年过节，他总会来信、来电或者来短信问候。

青彦兄的字，每次看到都有很多新的东西。最让我吃惊的是，他是一位藏族同胞。对书法却爱得发狂。他取法广泛，碑帖兼修，成绩斐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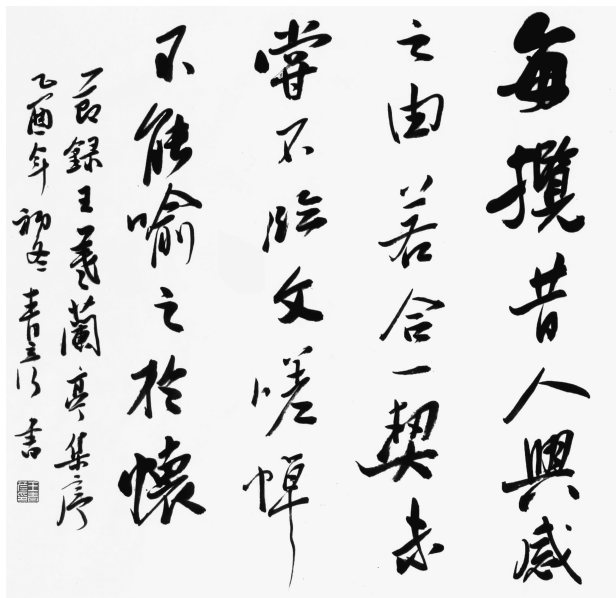
青彦兄现为中书协会员，甘肃省书协副主席、行书委员会主任，陇南市书协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库专家，兰州城市学院特聘教授，陇南市美术馆副馆长等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骄人成就，自然离不开他30多年来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求索。同时，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青彦的书法作品，至少有下面几个特点。

首先是有一股清气。这一点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当代很多作者对书法的清与浊不太在意，或是认识不到，创作的时候往往有一股浊气，令人生厌。虽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排斥那些粗头乱服，但是粗头乱服的内里还是有一股清气，至少给人感觉是非常干净的

线条，字里行间很干净，不是那种浑浊恶俗。傅山虽然有“宁拙勿巧”即四宁四勿之说，实际上他还是比较重视文人氣息的，其作品也是非常雅的。如果没有清气，一浑浊，写的东西也就谈不上雅了。

第二，线质锤炼得到位。他的作品有碑学、帖学的吸收，所以他的线质是非常有张力的。线条是书法的生命，如果线条没有经过严格的长时间训练，在笔法上不到位，那线条的生命和张力是



【图解】

王青彦书法

无法体现的。他的线条有文有质,雅中有质朴的气息。

第三,气息高古。青彦兄的审美取向还是继承了传统中庸的思想,不激不励。结字虽然有创新,有个性,有激情四射的时候,但总体还是中规中矩,不像有些人太随意,任笔为体,信笔涂鸦。他在法度上把握得很好,所以他下笔有由,有来处,高古的气息也就漫溢在字里行间。

第四,有一股书卷气。虽然青彦兄生活在边塞,但他喜欢读书,不断地加强自身文化修养。从地域上讲,在西北高原的气候影响下,他的作品当更多呈现苍茫的气息,但恰恰不然,他的作品有一股难得的书卷气。书卷气在当代人的作品中是非常稀罕的,是非常珍贵的,大家都那么爱钱,只要“东西”,不要“文武”,那还有读书人的样子,何谈书卷气。

总而言之,青彦兄的书法创作,路子正,吸收广,法度把握得好,心手双畅,随心所欲不愈规。如果一定要提点建议,我个人认为,他以后的路该往哪里走呢,还是要在以上四个方面继续做文章,争取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深,更远,以期走向“清贵”,且清且贵,有王者风,可矣。

之二:在跨界与愉悦中不断锤炼与塑造自我

马国俊

马国俊

国家一级美术师

甘肃画院原院长

甘肃陇南的王青彦先生,是一位不断跨域文化界别,朝着自己的艺术理想而不断努力奋斗的坚守者和爬行者。他的跨界与跨越,要大于别人,难于别人,更惊险于别人。但实践证明他的跨界成功了,不过坚守跨界的成功还有待于继续适应与努力。

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具有相对完整的书法经典语言体系的深入体验与运用,在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苏东坡等经典行书书法语言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修与吸收,保证了书法语言的纯正与精美。在书法审美上,他在关注碑学审美体系的同时,能紧切书法展览所赋予的时代意识与时代观念,并用书法语言进行和谐与自然的表现,保证了作品充满着强烈的表现性,并自然融入时代所认同的评价体系,成为一名优秀的、能够代表时代审美气象的书法创作者。

先生的书法体验过程,始终同书法的发展是同步的。这也使得先生的书法行为不断地得到社会不同阶段的考量与认同。一方面说明了先生在书法领域所获得的成果和拥有影响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先生在特定的地域特定身份上,对社会作出的相应贡献。

王青彦先生的书法表现上,更能看到传承与流变的过程、痕迹与影子。这里有传统书法经典的传承与流变,有时代审美的直接吸收与流变创新,有民族文化互补中所焕发的活泼生机。

先生的书法,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跨越、艺术表现形式的跨越和书法本体语言的深度跨越,所有这些跨越都包含着对原有文化元素的继承和未来元素的流变与创新。先生的所有跨越,源自于先生在艺术生命体验中的跨界创造,但愿先生将所有的跨界创造,最终完全归结于书法传承与创新的结点上,流变出书法形态的精彩与内心深处的快乐,成为一名由舞者、歌者、说者,转化为模者、写者、书者、创者,最终走向一名用汉字书写升华到艺术层面的快乐书写者和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者。

【作者简介】

钱墨君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中国书协会员

序言二则

钱墨君

之一：《巍石峥嵘》代前言——世嵘的从艺精神永不朽

2016年5月2日，与我相知相交20多年的好友李世嵘先生走完了他63岁的人生之路仙逝了。我为痛失这样一位人品、艺品极佳的老朋友感到十分惋惜与怀念……

世嵘先生是属于刻苦自学、转益多师而成才的书画篆刻艺术家。他先后师从书画名家雷于天、顾子惠、何裕、杨立强、付嘉仪等先生，他以自幼酷爱文化艺术的“初心”，牢记“求真、求善、求美”之艺术“使命”，真诚求索、潜心读书、锲而不舍而成绩斐然，终有所成。

世嵘先生在篆刻艺术上，虽身处较偏僻的西部高原历史文化名城兰州，却胸怀大中华之境界，如他所自述的“自幼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我，从小就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日积月累地用手中刻刀，将祖国山河胜迹之美名，镌刻在一方方印石上，于朱白文字之间表达我对艺术的热爱。”从1990年至1999年近10年间，他先后别开生面地创作出版了《长江三峡印谱》《长江印谱》《黄河印谱》《江河颂篆刻集》《万里长城印谱》，为甘肃篆刻艺术的繁荣发展增光添彩。这数百方篆刻艺术作品还先后被河南省翰园碑林、河北鄂州莲花山碑林全部刻石向广大游客展示。由此佐证：李世嵘先生无愧是一位能在“方寸之间”表现大题材的著名陇上篆刻家。

“人至无求品自高。”而我更从内心十分敬佩的是，世嵘先生是一个敬业、尊师、热爱家乡、深知敬畏、有责任敢担当的人！他不但自费为其恩师雷于天、顾子惠、狄水池、何裕等书画界老先生编辑出刊作品集或纪念册，同时还为他敬仰的先贤——清代书画家唐琰、朱克敏以及当代陇上书法家魏振皆热心搜罗、精心编辑书画资料书籍并免费赠送爱好人士，他的这一善举曾获得甘肃地方文史专家邓明先生的高度赞扬。更可喜的是，世嵘先生2009年被聘为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后，更以极大的热情，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联合其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省文史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先后编辑出版了《陇右遗墨》《铁笔朱痕》《山左风流——丁希农书法作品集》和《斯文在兹——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及清代、近现代名人手札册页遗墨选》（上下）等宣传陇原本

土文化艺术的书籍,它不仅填补了我省书画文史资料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也为今人研究陇原书画艺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而受到业内人士和社会大众的好评与称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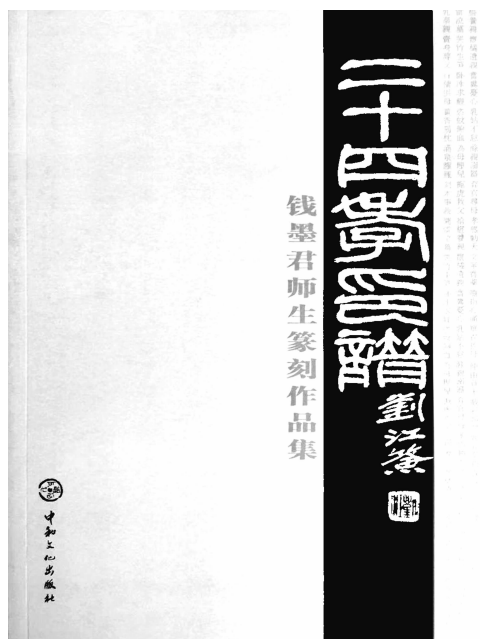
世嵘先生在绘画艺术上,走的是水墨写意一路,山水、花鸟俱精到,他十分推崇金陵画派大家钱松喦,但受影响最深的无疑是陇上画家杨立强先生。他的作品笔墨简练,韵味清润,境界很高,其深厚的笔墨功底得益于他的书法功夫。世嵘先生对书法艺术下过很深的功夫,甲骨、金文、小篆、隶书、汉简、章草、行草、漆书以及瓦当文、古泉文、汉砖文等都有涉猎。他勤学苦练,博取邓石如、吴昌硕、齐白石、刘自桢、丁希农、金农、罗振玉等众师之长,由于印人之缘,尤以篆书用功最勤。从其创作的篆书作品中的篆法、笔法、章法,不难看出受吴昌硕、刘自桢、齐白石的影响较深,其篆法笔划厚重开张、恣肆奔放而不失法度,方圆自主。我同时认为,世嵘先生似乎对陇上清代书画大家唐琰更是崇拜仰慕有加,故自觉遵循唐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以是知师无定在,性善则是”之教诲,做人从艺,身体力行,真诚求索,不断进取,超越自我,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艺精神,此册《李世嵘鸡毫篆书楹联选辑》即是明证。他用先贤唐琰喜爱的鸡毫毛笔,以欢畅的创作心态,篆写出了展现艺术新境界、新高度的这些“绝笔”篆书楹联作品,实现了著名艺术评论家孙克先生对他的“待以时日,人书俱老,必将大成”的希冀。

世嵘先生的从艺精神永不朽!今撰写此文,对收录世嵘先生发病瘫痪前数月内完成的这些鸡毫篆书楹联作品鼓与呼,是为表示我对仙逝老友의敬佩与怀念,并告慰世嵘老友在天之灵。

之二:《二十四孝印谱》序

“尊老、爱老、敬老”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特色体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把孝道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认为“孝为德之本”,是天经地义的做人准则。

正因为如此,自唐代编撰《晋书》起,在历代正史之中也都设有《孝友传》《孝义传》或《孝行传》,对各时期的孝子、孝女予以表彰。此外,在民间传说乃至宗教神话中也流传着大量的孝行故事。例如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变文(唐代盛行的一种讲唱形式)中就有《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舜子至孝变文》《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和唐人曲词《天下传孝十二时》、传统故事集《孝子传》等。在此基础上,不知何时何人取材于这些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道的故事,编撰成了《二十四孝》,“摭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概,系以诗,用训童蒙”,成为当时专门用来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但从其中讲述的人物背景来看,上至先秦、下迄赵宋,既有王侯将相,也不乏平民百姓,而且绝大部分



【图解】

《二十四孝印谱》书影

序与跋

【注释】

①：据《中国印学年表》（韩天衡著）载：1976（丙辰）年，台湾印人梁乃予（意古楼主）辑自刻印成《二十四孝印谱》一册并出版。《篆刻大词典》载：梁乃予（1926—2001），现代篆刻家，别署意古楼主，福建福州人。居台湾，擅篆刻，为台北中国篆刻学会理事。

在历史上却有其人，所述孝行虽有不少的夸张修饰却大多有据可凭，故《二十四孝》的编撰者当为宋元时期之人。从流传至今的古代美术作品中，存有南宋赵孟坚的《二十四孝书画合璧》和元代王克孝的《二十四孝图》等可为之佐证。然《二十四孝》有多种版本，各书所载不尽相同，这可从甘肃出土的宋元时期孝道故事画像砖中得到印证。到了清代，在《二十四孝》的基础上形成了《百孝图》，如清同治十一年刻制有《百孝图》书。更有甚者，甘肃肃州胡文炳竟于光绪己卯（1879）年撰著有《二百四十孝图》一书。此书因在鲁迅未出世之前已经删去了他在儿时“反感”“害怕”的“郭巨埋儿”，而获得了鲁迅先生的赞扬：“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思，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是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朝花夕拾后记》）

以书画艺术来宣扬、表现传统经典的艺术作品历来甚多，对于《二十四孝》也无例外。可笔者在学习、研究中国篆刻史“年表”、“印谱”时却发现：用篆刻艺术来反映《二十四孝》却十分罕见，似乎是个“空白”^①。于是乎，壬辰龙年春月间，为督促、激励学弟邹紫楠、张大愚、杨强、魏树明对篆刻艺术的深入学习，嘱他们分别创作二十四孝组印，并考虑结集出版。因其不论从篆刻艺术史的角度看，还是面对当下现实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上都具有一定意义。四位学弟依据自己的文学、艺术之心得，精心设计印稿，游刃方寸中，耕石抒心怀，某些作品曾几易其稿、反复推敲、重刻，“乐此不疲”了一年又余光景而终成《二十四孝印谱》作品。纵观印谱，四位学弟创作的作品精彩纷呈、风貌艺趣各异：

“涌泉跃鲤”（阿楠）、“戏彩娱亲”（杨强）印古韵盎然；“鹿乳奉亲”（大愚）、“卧冰求鲤”（杨强）印构思巧妙；“卖身葬父”（大愚）、“扇枕温衾”（杨强）印绵密虚灵；“扇枕温衾”（大愚）、“黄香扇枕”（阿楠）印工秀婉约；“拾葚异器”（大愚）、“戏彩娱亲”（大愚）、“鹿乳奉亲”（杨强）印浑厚含雅；“文帝尝药”（阿楠）、“哭竹生笋”（杨强）印刚健秀劲。印式或古玺、或汉白、或瓦当、或封泥、或无边、或四灵印式或朱白相间；此外，树明的朱文线描式图像肖形，犹如精美的插图自有风貌，尤其阿楠的边款有图有文，构图与线条简洁明快，别有一番艺趣韵味……在这些铁笔朱痕、玄色边款面前，我想读者在翻阅欣赏之时，结合各自的人生经历、审美学养，见仁见智自有一番萦绕佳兴的高雅神游。当然，无须讳言，印谱中尚有一些作品还有待从文字、章法上进一步认识和提高。

古贤云：“不随时俯仰，自得古风流。”在当今印坛，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所谓的不断“创新”、张扬“个性”的旗帜下，无视篆刻艺术传统的印人，矫揉造作、奇异怪诞、胡镌乱刻的劣作还大行其道，并在“名家”、“大家”的盛誉光环之下，模仿、追随者比比皆是。由此我感到，四位学弟能在理解、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追求、完善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貌是十分必要和可贵的。

我知道在二十四孝故事中，存在有不少违背科学的迷信传统和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及愚忠愚孝的宿命成分，读者自有能力分辨是非曲直，批判地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正遭受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严重侵蚀和极大冲击，“古为今用”的回归，对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倡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伦理观念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这也是我全力策划和推动邹紫楠、张大愚、杨强、魏树明四位学弟热情奉献这本印谱的希望所在。

序跋四则

小 米

之一：《润物无声》序

严凤腾先生要出一本画集，他再三叮嘱，要我写点什么。按说，我于国画是门外汉，怎么轮也轮不到我来说三道四。可我这个人天生耳朵软，只好勉为其难，先答应下来。古人有话，说是“千金一诺”。虽答应了，我却久久无从下笔。想来想去，不妨从这“无从下笔”之处，说一点零零碎碎，以践一诺。

无论是严凤腾先生擅长的国画，还是我所专攻的文学，终归都属艺术创作。艺术是相通的。艺术创作当然也有艺术创作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创作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愉悦的，而不是人们经常说的“苦差事”。如果我们的作品连自己也不能愉悦，又怎么能谈得上去愉悦别人，甚至感染别人，感动别人呢？好的艺术品，首先陶冶的是作者自己。

话又说回来，一件作品，我们创作它的过程，是愉快的，我想，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但是，在它成为作品之若干年后，如果我们还那么喜爱它，放不下它，至少，对于作者来说，它们就是好的，就是难以割舍或不能舍弃的。把它们集结起来，出一本书，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岁月对历史的一个交代，哪怕它是不被别人看重的，但它，是被自己所看重的，这也就够了。

总结自己，不是一个艺术的过程，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过程，是真正的“苦差事”。要不总结自己，我们就仿佛在漆黑的夜里走路，仿佛在“摸着石头过河”，于艺术上的探索与进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如果连自己也看不清，认不准，又怎么能够看得清人生、社会、历史呢？他又怎么可以从事艺术工作呢？

即使一个普通人，也是需要经常地总结一下自己的。只有总结了，才知道得失成败，才能在以后的生涯里，有所侧重，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也只有总结了，我们才可以把“这些东西”在心理上“放下”，更进一步地，轻装前进。

我想，这些道理，严凤腾先生是知道的。他已经这么做了。

一件艺术品，不可能叫所有的人都满意，这是因为阅读者的修养有不同，审美趣味也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本就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一本书同样是这样。人的一生，更是这样。要做一件什么事，只要自己觉得是有必要的，值得的，也就是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小米，原名刘长江
中国作协会员

别人想说什么,要说什么,都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我在这里说什么,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还是打住。

权为序。

之二:《小米诗选》后记

一直拿不定主意。

终于选出来了,也定下来了。

有新作,也有旧作。以新作为主。这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就像当初一样,依然还是满怀着期盼的。

旧作是历史。新作对于我而言,还是历史,自己的历史。诗歌是诗人的心灵史。编一本自己的书,是在自己过去的心情里畅游了一次。

一本诗集的出版,对于作者,它仅仅有着记录或者纪念的意义。

编一本选集,注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对于旧作来说,因为总有偏爱,总有难以割舍的;即使新作,也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自己情感的考验。

从1986年在《飞天》发表第一首诗到今天出版第一本诗集,已有整整20年了。人的一生,没有几个20年。但是,20年前的梦想,依然还是新的。

在诗人的眼里,世界,应该永远是新的。诗人所要寻找的,也一直是新鲜的未被别人发现的那一点点精神的光亮。

可以说,我比20年前更加自信了,所以,我还要继续。

之三:跋《孙念祖国画集》

12年前,汪曾祺先生曾为丛书《当代才子书》写过一篇序,题目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先生早已作古,这句话,我却从看到的那一刻算起,就不敢忘。我至今还是一个浅陋的人,不知这句话是不是汪先生的发明,但他那样的大家在“才子”这个名词面前都如此惴惴,何况我辈!孙念祖先生长于人物、山水,工于花鸟,从艺一生,写意一生,我从未见他夸夸其谈,张扬恣肆,也从不曾发现他在后生小辈面前端架子、做姿态,足见其为人、为艺之谦和。孙念祖先生揣在心里的,也许,一直就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的态度。这是从事艺术事业首先的、也应该是常有的态度。说白了,其实就是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态度。

艺术事业,养人性情。孙念祖先生长期浸润其间,自然获益匪浅。我一直想,我们从事文艺工作,并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也不是为了因此获取多大的经济效益。当然,如果有了这些衍生物,那也是好的,是不必遮掩亦无须拒绝的。但以此来招摇、炫耀,作为资本之一种,就显得俗了,浅了,低了也小了。这是我们应该时刻警惕的。这一点,我觉得,孙念祖先生做得是很不错的,是够得上前辈这样一个称呼的。我们喜欢文艺,哪怕只是爱好,也是好的。它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见识,愉悦我们的身心。它更能够让我们从“看得懂”成长到“看得惯”,再上升到“看不见”。郑板桥有“难得糊涂”之名句,要知道,这糊涂,是明白之后的糊涂,它是一种境界,不是一种状态。

物质养身,艺术养心。长于艺术,就能够将心比心,先由自己,推及别人;它还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更能让我们“众人皆为,而我不为”,从而达到

“风不止，树愈静”的境界。

从艺跟务农、做工、从政、经商、钻研学术等等，是一样的，并无高下贵贱之分。它只是做人的一条途径。但无论哪一条途径，都不是必需的途径。要人容己，先要容人。要别人看得起自己，自己先要看得起别人，这才是做人最要紧的。

技法与声名，自然次要。

就文艺事业来说，孙念祖先生是我的前辈；就文县这个地域来说，他又是我的朋友。虽然接触并不多，但在与他交往的印象中，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随和的人。他虽然当过官，但没有官架子；在艺术方面，虽是科班出身，却又不为理论所累，更不因此局限。他的画，大多取材于家乡风物，表达他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他的人物，在意境的营造上，或开阔、高远，显得超然、洒脱，显示了作者胸襟的宽广；或形态逼真、惟妙惟肖，善于从平常普通的场景中挖掘、提炼，既注重情趣，又表达了他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他的山水意境深远，韵味绵长，且在构图上，时见突兀之处，我觉得，这就是他为人的证明，是他泰然、澄澈、洞察，是“胸中有丘壑”的体现。他的花鸟艳丽多姿，表现出来的，又是他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绚烂。

愿孙念祖先生艺术生命长青！

之四：序《王祥林诗集》

王祥林要出诗集了，嘱我为他写序，不好推辞。

原因是，我与王祥林都毕业于甘肃成县师范学校，他只比我低一级，是校友；毕业后，我们又先后分文县马营学校当教师，是同事；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后，他也调到县纪委，在同一幢办公楼的六楼上班，几乎天天碰面。

王祥林此前不写作，或者是，我不知道此前他是不是也喜欢文学，很突然的一天，他来我的办公室，问了些关于文学的事儿就走了。我也是因此才知道，他也不动声色地，搞起文学创作来了。奇怪的是我们此后见面，仍然不谈文学，不谈诗歌。我埋头写我的，他埋头写他自己的。私底下的交往也较少。我们都不是高谈阔论的人。我们都不是喜欢卖弄的人。我们也不是拉帮结派的人。在这个用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时代，在这个常常用官位高低来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县城小环境之中，文学真正成了寂寞的事业，既无卖弄的土壤，也无卖弄的必要，更无卖弄的意识。我们只是不约而同地，默默写着自己的，仅此而已。

业余从事文学写作，王祥林比我迟得多。我后来才知道，他写散文诗，也写诗。他的散文诗在省内外许多报刊发表过，我读得虽然多一些，却也只是零散地，顺手一阅。我这个人，读书的面一直比较窄。说真的，王祥林的诗，只听说在许多征文大赛中获过这样那样的奖，也发表过一些，但我读得并不多。但无论如何，他能选择文学，就应得到我的尊重，他能在文学作者普遍被世人不齿时，反其道而行之，爱上了文学，且热衷于写作，就应该得到师长兄长的呵护，这是最基本的。他终于有了成果了，他终于要出版自己的诗集和散文诗集了，我除了举双手赞同，似乎再无别的选择。

我跟王祥林年龄虽然差不多，但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他却比我短许多，好像也就10年左右吧，他取得的成绩，却已能够让人刮目。他的勤奋，自不必说；他的才气，亦于此亦见。忝居兄长，除了对他大加赞赏外，我还能说什么（前转第45页）

【作者简介】

张文轩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文轩诗选

兰州中医药大学和平图书馆落成志庆
辟恶生香羽陵远，追狐获籍岂虚传！
斯文孔孟天难绝，秘术扁仓存眼前。
时代鼎新宜抖擞，石渠开阔好回旋，
学人蜂拥和平镇，一夜春风奏管弦。

赠甘肃省档案馆

金简玉书盈厦厅，既非子集亦非经。
暴阳染襍冒寒暑，别类分门伴月星。
明智昏庸异筹画，兴亡成败震雷霆。
何须匍匐求龟筮，鉴古知今分外灵。

赠董子彪君

太史皇请话五凉，说来老少乃同乡。
吾悲设帐云烟散，君好记言绅带长。
惯览遗文弘大义，近闻妙略运朱堂。
有缘同卜荒陬宅，电讯何如晤语强！

大通河

西天搅风雪，点点化昆仑。
聚细终成大，初清后不浑。
穿山顽石裂，润物颂声跟。
志涌黄河浪，高歌出浩门。

连连树

双柳相望驿道边，虬枝眉叶绕云烟。
各伸一臂虚空过，固结千秋血气连。
县设浩门雄往古，地生灵瑞壮今天。
披红鸣炮年年祭，乌鹊栖迟不枉旋。

张克复诗词选

兰州两山绿化成果有感

曾道兰山树一棵，喜今绿韵舞婆娑。
藏幽万壑云兴雨，茏翠千峰风引波。
若不年年栽草木，岂闻处处踏青歌？
改良生态美环境，天地与人谐亦和。

九州台上看兰州两山绿化成果

九州台上久徘徊，四面青山排闥来。
可知亿万芳蕤树，竟是人工劬力栽。

赞兰州两山绿化人

可爱兰州绿化人，荒山播绿献终身。
揩冰抬水多艰苦，汗滴浇来处处春。

读史有感兰州生态变化

史载明前南北山，茂林荫翳草芊芊。
晴天万树排高浪，雨日千峰裹冷烟。
斧锯逞狂青岭秃，旱魔肆虐黑风旋。
改良环境初见效，绿化兰州年复年！

西江月·兰州绿化上水工程

水是造林生命，曾经抬雪揩冰。勇
牵龙伯上高陵，滋育芳林茂盛。
管网纵延横亘，到申再返南京。献
身绿化总关情，改善兰州环境。

清平乐·中川西山造林

荒丘土岗，郁郁起林莽。小树当儿
细抓养，心血凝成碧浪。
山杏侧柏樗材，云杉沙枣刺槐。放
眼葱茏一片，莲花转下春来。

柳梢青·兰州两山

纔沐甘霖，青山如洗，林木森森。
万壑千梁，娇花嫩草，浥浥香侵。
赏心漫上高岑。云生处，苔径润
浸。轻霭流光，松杉送爽，快意高吟。

西江月·森林

林是生灵之苑，孕育物种千千。无
林哪有猴和猿？人类最初伊甸。
制造新鲜空气，蓄涵万道清泉。

张克复
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森林关乎地人天，植树福荫永远。

张化麒诗六首

乘船游于泰国湄南河上

湄南河上踏波行，两岸画屏神庙精。
高唱长江东逝水，他乡更起故园情。

过马来西亚马六甲城谒郑和庙

天朝船队下西洋，贸易外交功绩煌。
马六甲城留胜迹，“忠贞足式”国威扬。

新加坡一隅

栉比丽楼高入云，国家剧院喜迎宾。
三楼头顶“天船舰”，鱼尾雄狮铸国魂。

乙酉秋随王仲保馆长

访湖北、武汉、重庆文史馆

飞天千佛听编钟，荆楚陇原根脉同。
三峡一湖重庆美，甘渝文史共兴隆。

丁亥夏随刘醒初馆长赴陇南采风
龙江万象蕴奇观，文县天池雾里船。
白马锅庄情谊暖，草堂西狭颂千年。

丁酉夏随李佩芬副馆长赴银川

参加书画联展

贺兰山下一明珠，回族风情满丽都。
两馆画书联展览，切磋技艺绘新图。

王得诚诗选

五台览胜

众星捧月喻名山，古寺连环供佛禅。
翠柏参天承雨露，苍松昂首望玉盘。
白塔巍巍瞰世界，铜屋灿灿耀云天。
无梁宝殿宏兼巧，有意帝碑博又专。
文殊道场多皇侍，壁画梵图万众观。
历代寺群气势伟，沙门盛誉震瀛寰！

戊戌重九登香山

重九登香山，寻观枫叶红。
双清议政事，孤殿考群臣。
禅寺虔僧愿，镜湖情侣心。
黄花生雅趣，菊酒逸精神。
索道巅亭望，京都胜霄宫。

瞻大同古城华严寺

千年古寺赞华严，几度兴衰几度艰。
木塔凌霄观巧斗，百吨铜室灿光天。
殿宇宏伟释尊笑，樟像芳馨信众欢。
盛世修复钵磬继，今方敬拜仰慈颜。

谒邹平范文正公祠

幼髻失怙罹磨难，随母朱门身且安。
断齑划粥常善济，窖金赠寺更慈捐。
洞烛读史英雄志，僧舍诵经君子肝。
戍边御寇关山固，入相治国黎众欢。
朝堂除弊布新政，贬地通和负铁肩。
先忧后乐平生愿，感世雄文万古传！

观四川内江隆昌古镇石牌坊群随感
牌坊鳞次蔚为观，旌表孝贞节烈坚。
敕赐褒旨极勉励，民着崇誉倍慈谦。
升平人瑞倡尊老，善顺睦和尚敬贤。
勤政廉明绅庶荐，美名盛德玉额镌。
凤冠霞帔固荣耀，寡泪苦愁腹内酸。
若是彼时能自主，砸笼破网翱云天！

王长顺诗二首

拜访薛起珠先生

事业名山报国忠，艺坛帙卷乘好风。
雍容气度青松格，养性修身孝义崇。

袁第锐老师仙逝

噩耗传来心倍伤，长宵泪洒月无光。
松筠节励真君子，坟典博通云汉章。

张化麒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王得诚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甘肃省书协会员

王长顺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风雅撷珍

齐培礼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王仕海
甘肃省作协会员

修史裁诗尊国手，设坛授业历寒霜。
恩师化鹤归华表，叹我忧葵塞草黄。

齐培礼诗词选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吟

华诞庆典七十春，锦绣河山万象新。
经济腾飞千业顺，科技发展五洲惊。
强军富庶国昌运，扫黑除恶世安宁。
举国欢歌圆国梦，扬帆起航再远征。

赏石佛沟鲁冰花感怀

爱住深山地，花开火炬生。
云游星火闪，风动卉香身。
蜂蝶纷争至，不知返回辰。
人怨来之晚，夜夜梦花迎。

石门沟咏

极目石门沟，风光别有天。
悬崖飞白练，山谷响清泉。
火圈池哥舞，红霞染锦川。
登上南山顶，潇洒一醉仙。

鹧鸪天·新春友朋聚会感怀

时至阳春天气爽，友朋聚会满华堂。
雪染鬓端真情在，知己难忘旧时光。

追往事，话沧桑。驱云伏虎正方刚。
青春融进山河壮，一片丹心献兴邦。

长相思·解放军助民抢收

小麦黄，青稞黄，风吹麦浪似海洋，
藏胞愁断肠。
军号响，惊梦香，半夜部队进村庄，
挥镰抢收忙。

诉衷情·父母心

千辛万苦为儿忙，勤俭节衣粮。
送读完婚，勤勉去争光。

学圣贤，孝忠良，愤图强。齐家治国，
重任担当，黎庶安康。

王仕海诗选

过江油李白故居

诗仙今何在，江油留古迹。
不为权折腰，愿做青莲居。
脚踏好河山，举步问大地。
白鹿今在否，我辈尚可骑。

谒勉县诸葛武侯祠

定军山下草青青，城西祠堂有翠微。
常记三顾定局计，犹忆六出壮军行。
横扫南夷平后患，欲定北疆建奇绩。
千古智慧留遗憾，虽失街亭有异名。

竹 颂

一

植入园中势如虹，扎根荒野亦青青。
胸怀风流高格调，不与俗世争时名。

二

风流流兮雨沙沙，万杆挺起似剑侠。
布下千军万马阵，任尔黑烟与黄沙。

菊 颂

一

早浸霜露晚披纱，日照东篱染秋霞。
笑饮西风真君子，锦绣一簇玉无暇。

二

日行东南气走寒，百花皆隐你占先。
不把四时分弱盛，独将西风伴露餐。

品 梅

春日刚到等梅开，四季风雨任他来。
雪中一枝寒蕊放，方知香艳冰骨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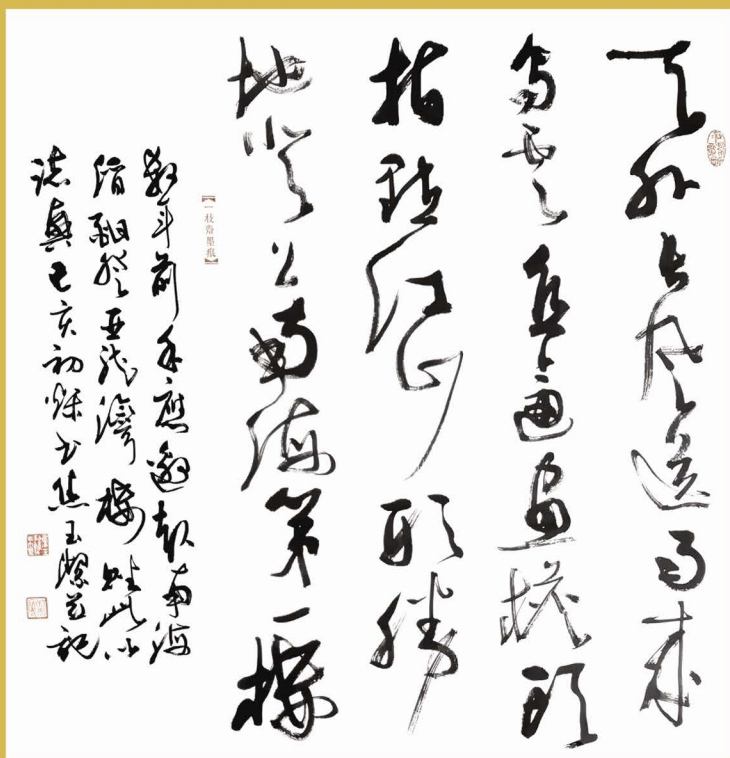
秋 雁

朝闻南山雁阵鸣，青山遮影过湖心。
塞北江南任尔往，秋风乱了湖心亭。

周玉兰国画作品欣赏

周玉兰，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协会员，甘肃省美协顾问，民革中央画院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擅画花鸟，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大型书画展中展出并获奖，百余幅作品及论文在《美术》《鉴赏》《中国书画报》《人民日报》《香港书画报》《澳门月刊》《甘肃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发表。艺术业绩多次被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报道。作品曾在全国第八届美展、中国第四届艺术节、全国第二届中国花鸟画展、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书画家提名展等大展中入展或获奖，曾获国家文化部第三届全国金鼎奖全国书法美术大赛金奖和甘肃省委、省政府敦煌文艺奖等奖励，多幅作品被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友人及机构收藏。





焦玉洁·书法